

卷首语

中国公民的大多数是农民。就是原先的城里人，往上数一辈或几辈，就有农村的背景。“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中国人最有诗意和温情的生活方式永远离不开乡村田园背景。然而，近年来极其快速的城镇化节奏已经让很多乡村消失。“回不去的故乡”已经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同“乡愁”。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新型城镇化“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以往的文件中很少见到这样令人刻骨铭心又充满人文精神的语言。它生动而尖锐地指出了过去城镇化摧毁“乡愁”的弊端，也点明了生态环境和人文精神在新型城镇化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许多人读了这段文字都眼睛一亮，心灵震撼。只可惜这种上升到理性和政策高度的共识还是来得晚了一点。

对故土的眷恋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土生土长的农民，最眷恋的是那陪伴自己一生的“一亩二分地”；远离故土的游子，最记挂的是那令人魂牵梦绕的“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每一个人都不会忘记生我养我的那一个乡村，而每一个乡村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有自己的历史和故事，有给她的儿女难以割舍的情怀和印记。但是，近十多年来，许多具有个性和特色的乡村正在“新圈地运动”和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在一座座塔吊竖起和一幢幢高楼崛起的过程中，迅速而无以挽回地消失。南通也不例外之中。

我们现在所做的事，譬如农村文化遗产调查和编辑名录，编辑出版包括地方名镇名人在内的江海文化丛书，今年计划召开的古镇村保护研讨会等，就是想拉住“正在过河和已经过河的牛尾巴”，让南通的乡村还能保留一点自己的特色和个性，让南通人还能够“记得住乡愁”。虽然，能不能做到和能够做到哪一步，我们心里都无数，但我们还是要努力去做。

江海文化研究

主办：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

南通日报社

南通广播电视台

编辑：《江海文化研究》编辑部

地址：南通市建设路1号

老年大学内

邮编：226001

电话：0513-85512323

13806291885

电子信箱：2925817828@qq.com

陈小平信箱：

1134663682@qq.com

电话：13809088108

目 录

工作研究

1 对南通保护“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情况的调查和建议

尤世玮 钱 炜

6 国术家陆景机之墓亟待保护

王兴相

特 稿

8 珠算“入遗”三感

施景铃

10 深深的记忆

张慎一

学术探讨

12 江海文化在海门

邹仁岳

16 青墩文化的魅力值得永远探究

王其银

20 我心中的名人顾养谦

文之虚

23 张簪、张謇、朱铭盘与袁世凯的绝交书

姜光斗

27 白水荡边悲逆旅 黄泥口畔辨真墓

李克东

32 张菊生书李村墓表

一 婷

34 海门民间文艺一览

盛永康

38 如皋两支杨氏的血脉与文脉

秦镜泽 潘 健

江海文化人

46 从王个簪弟子到国际海事专家

倪怡中 李龙渊

54 明代余西诗人曹大同

徐振辉

文史钩沉

59 才高命薄的吴肇嘉

周思璋

61 郑板桥石刻作品现身如皋始末

鞠九江

65 弘一法师与通如名人的因缘

苇 叶

69 无愧于民国第一县的《皋农》杂志

侯求学

民俗民风

76 记录一册故事 留存一方文化

朱今更

《江海文化研究》

编辑委员会

顾 问:李明勋 姜光斗

主 任:李 炎

编 委:

施景铃 沈启鹏 周建忠

徐仁祥 顾 华 陈 亮

吴声和 羌怡芳 陈冬梅

黄鹤群 尤世玮 王建明

陈鸿庆 沈玉成

主 编:沈玉成

副主编:陈小平

封面题字:冯骥才

封面设计:沈 梁

封面篆刻:李夏荣

封面图片:

西寺正殿

陈小平摄

对南通保护“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情况的调查和建议

尤世玮 钱 炜

2009年1月2日,国务院发出“国函[2009]2号”批复,“同意将江苏省南通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此,南通市成为我国第117座历史文化名城。

为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南通市作了近三十年不懈的努力。回顾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历程,有三个“不能忘却”:一是不能忘却我们的前人所奠定的基础。二是不能忘却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理念的更新。三是不能忘却全市上下长期以来锲而不舍的努力。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提高了南通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了南通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增强了广大市民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在南通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五年之际,我们就南通保护“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情况进行了调查,形成以下报告。

一、保护文化遗产、搞好名城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

1.认真编制各项保护规划。自2009年起,先后制定了《南通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当年即得到省政府批准;先后制定了寺街、西南营、濠南地区、唐闸地区四个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规划;制订了“南通1895协调区规划”和市区各级文保单位和历史建筑保护规划。嗣后,为了推进历史文化保护项目的实施,完成了“油脂厂地块保护性规划”、“唐闸河东街沿街修建性保护规划”、“寺街、西南营历史文化街区修建性设计”及“城市绿谷一期、二期实施方案”。与此同时,市规划局新设名城保护处,成为职能机构。

2.修缮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5年来,“城市绿谷”、“唐闸红楼、大达轮船公司、伶工学社、总商会、钟楼渔楼、文峰塔等一批文保单位和历史建筑得到修缮保护,并对外开放。西寺地块改造保护工程正在实施。并于2012年上半年完成了南通市各级文保单位、历史建筑的测绘与建档工作,为日后的正常修缮及遇到不可抗拒破坏后重建、迁建及复建等提供了重要基础;最近,还把关于唐闸的规划综合,编制了《南通·1895》(唐闸地区)保护利用规划整合研究。

3.启动唐闸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经过对原唐家闸老镇 93 公顷范围“地毯式”的普查,对唐闸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估。再通过专家研究和论证,市政府组织协调班子,由主要负责人挂帅,启动唐闸近代工业城镇“申遗”的工作,聘请知名院校专业团队编制“申遗”文本,从基础工作入手,有条不紊地推进,取得了初步成果;

4.完成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成功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后,我市完成了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新发现了二百多处的文物,并纳入了整体保护的范畴;

5.新增一批全国、省级文保单位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我市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后,保护意识倍增,保护力度加大。2012 年,经省政府批准,文峰塔、通崇海泰总商会旧址成为省文保单位。2013 年,经国务院批准,我市又晋升 4 处国保单位,分别是南通大生纱厂(单独列序号,大生三厂新增并入);海安韩紫石公馆;如皋公立师范学堂旧址,狼山广教禅寺。到目前为止,我市已有国保单位 10 处,省保单位 26 处,市保单位 53 处。与此同时,海门市余东镇新增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如皋白蒲镇,如东栟茶镇,通州余西村等 3 处,新增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其中,栟茶镇已通过住建部、国家文物局的评审,正等待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6.挖掘发现了一批市内名人故居、优秀建筑资源。五年来,我市通过充分挖掘,新发现了一批市内名人故居、优秀建筑资源。2011 年第一批 40 处历史建筑挂牌保护,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和肯定。2013 年又发现一批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其中 32 处已作为第二批上报待批。第五批市级文保单位共 20 处,已做好前期调查、评估等各项工作,报市政府。

7.保护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取得进展。目前,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9 项(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板鹁风筝制作技艺、梅庵派古琴艺术、南通仿真绣、海门山歌、童子戏、跳马伏、季德胜蛇药制药技艺、南通色织土布技艺);有 40 项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 67 项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有 3 人成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9 人成为省级非遗传承人,76 人成为市级非遗传承人。建成 987 平方米的南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位于狼山风景区民博园东区)和占地 30 亩的“非遗工坊”(位于民博园西区),成为“非遗”基地和旅游新景点。

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存在问题和不足

五年来,我市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一定成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反映在观念认识、管理机制和实施投入等几个方面。

1.观念认识偏差。这主要是指没有真正认清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发展战略,没有充分认识历史文化名城的作用是能增强文化软实力。具体表现在:一是有的人认为,“名城的牌子到手了,可以歇口气了”,“其实有了名城的牌子反而束缚我们的手脚!”——这是只要荣誉,不讲义务和责任,等等。二是对南通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和现状的无知,也不了解保护什么和怎样保护,体现了认识的片面性和工作的简单化。例如,有的人认为,“破破烂烂的房子有什么好保护?”“不把人员全部撤出就不好保护!”三是“急功近利”。有的人认为,保护历史文化名

城,“首先要想好怎样利用才能保护,否则划不来”。须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基础是保护,而保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保护的基础上才谈得上科学利用。投入是为了保护,产出(回报)要从总体上、长远上评估,不能仅从局部去衡量。

2.管理机制不顺。这主要是指,没有确立“上下一盘棋”的格局,法制意识、规划意识、大局意识、协调意识淡薄。表现在:

(1)狼山附近的新港镇是一座有着光荣抗日斗争传统的集镇,是省政府批准的我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已经明确的保护地块。2009年突然被夷为平地,而嗣后制定的修复方案完全是房地产开发项目。(芦泾港街道也有同样情况)——这是典型的违法违规行为。

(2)唐闸河东街是唐闸近代工业城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划尚在完善过程中即被拓宽改造,拆除了不少有代表性的建筑,以至于如今为“申遗”还得重新修建。——这是局部利益驱使下的盲目行为。

(3)南公园被卖给民营企业后其历史建筑千龄观和与众堂于2011年3月5日凌晨被偷偷摸摸拆除,然后侵占濠河水面,填河建造私人会所。——这是职能部门监管不力所造成。

(4)唐闸东工房、新工房动迁后,一度无人管理,以致受到严重破坏。——这是工作缺乏计划性,部门之间衔接不协调的缘故。

(5)唐闸南工房拆建后,实际上已不是历史建筑了。对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则还是历史建筑。但对历史建筑拆除后重建,则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历史建筑,有人称之为“假古董”。

(6)寺街历史街区保护工作推进缓慢,虽有诸多复杂原因,但根本问题还是制定的方案有待进一步从实际出发,顺乎民意,保住历史文化的根脉。

3.资金投入不足。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如何选准实施的主体、加大实施部门的密切配合以及加大对保护工程的资金投入,显得特别重要。这里有一个问题,名城保护的主体由企业担当,企业是要讲自身经济效益的,而名城保护主要是讲社会效益,这对矛盾将如何处理?名城的“商业化保护”,这个提法本身就容易发生误导,导致保护工作偏离正确的轨道。而要引入商业化机制,造血功能如何增强也需探索。

三、对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建设的建议

1.要建立高效协调的领导体制和机制——借鉴学习外地的成功经验。五年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所取得成绩,主要归功于我市加强了统一领导。因此,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就要坚持成功的做法,建立高效协调的领导体制和机制。

学习外地的成功经验,应当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或领导小组,请市主要领导同志牵头,委员会(领导小组)包括相关职能部门和有关地区主要负责人。下设办公室(要有相当级别的领导担任专职人员,可放在市规划局名城处,由市文广新局文物处配合)和专家咨询委员会(或小组)。但凡开会研究重大问题之前,要请专家充分论证,办公室事先协调,委员会(领导小组)研究确定后方案向全社会公示,再吸收市民的意见加以完善。一经确定,不论哪个部门和哪个地

区,都要认真执行,协调配合。这样的体制和机制可以把局部的、人为的因素弱化,有利于实现“上下一盘棋”、部门地区间协调配合、全力推进的新局面。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建设是整体的长远的工作,每个时期应当有保护的重点(包括项目和地段),不宜全面开花;保护的关键在保持街区、建筑的原真性,切忌大拆大建。少数必须“拆”了整理的,“拆”了就要重建,建了就要管好。如是,资金的问题也能通过统筹得到较好的解决。

2. 保护起点要高,要有创意——以唐闸近代工业城镇为例。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仅体现在经常性的修缮维护,更要在此基础上科学评估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通过积极的建设使这些价值发挥到极致。唐家闸近代工业城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就是符合这一原则的举措。

张謇先生从 1895 年在唐家闸创办大生纱厂起,花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建成了体系完整的中国最早的民营资本集团,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国务院在批复中指出我市“近代城市建设特色突出”,唐家闸就突出体现了南通近代城市建设的特色。是南通市历史文化最大的资源。通过近十几年对唐闸的普查和研究,将唐闸近代工业城镇放在世界同时期工业遗存的整体中进行横向比较,其价值不断提升,如今市政府正式启动唐闸“申遗”这是顺理成章的重大决策。我们觉得,聘请著名高校著名学术团队做前期申报文本准备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发挥本市人才、资源优势也不可或缺,尤其是根据“申遗”程序,大量工作还需要我市自己去完成。因此综合各方意见,建议如下:

(1)时空界限宜进一步明确。似以上世纪 80 年代唐闸状况为参照最宜,包括“一河”(通畅运河唐闸段)“两岸”(河西片和河东片),北从北哨,南至十里坊,东起唐闸公园,西到疏航桥。原先的划定范围偏小,不能完整反映当年情况。

(2)唐闸近代城镇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不仅包括工厂企业,而且包括与之关联的仓储码头、工房住宅、商业市场、学校医院、社会设施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体现其内部结构和社会功能。

(3)唐闸工业城镇是活态的,与一些地方的工业废墟遗址完全不同。许多工厂至今仍在生产,且流传有序。远至十九世纪末,近到改革开放之后,在不同时代都有遗存。对此,应当在突出近代工业遗存的前提下,也保护好各个时期的工业遗存,即使是企业不再生产当年的产品或变更了厂名,亦可通过在厂门口设置沿革牌进行介绍(其他机构设施同样如此),这样能使人们通过一个个“单体”了解唐闸整体百年历史。这是活态保护利用的思路。

(4)在唐闸整体保护的基础上,可结合实际考虑如何利用的问题。现在提出了“创意产业”的概念,并在油脂厂原厂区起步“1895 工程”,开始多方探索新路,都是有益的。其实,对唐闸而言,最大的“创意产业”就是为了解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典型的融参观、体验、旅游、研究为一体的“世界文化遗产——南通唐闸近代工业城镇旅游会展产业”。可以按照当年的产业链走向,设计参观、体验路线,闲置的车间、仓库,可举办展览、可设计互动游戏、可播放 3D 电影……在适当的地点设置茶座、饭店、有表演场所,还可在商店购到有南通特色的粮油副食品、民间工艺品等。工房修

缮好了,原住民可入住,现在仍在开工的企业照样开工……唐闸今后如能“申遗”成功,呈现给世界的将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方。

3.历史街区的保护应与改善民生相结合,充分发挥原住民的作用——以寺街历史街区为例。

寺街历史街区自唐宋以来逐步形成,是南通老城历史最久、文脉最盛的地区。这里出现过名宦廉吏、文人墨客、革命家、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这里有成片的明清民居,有寺庙、学校,有名木古树。这里是南通城的缩影,体现了“南通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历史遗存丰富……”(国务院批复),体现了南通城的传统风貌。综合各方意见,对寺街的保护与改造建议如下:

(1)寺街历史街区的保护,主要分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两方面:有形的一是街区的构成,以街巷走向和连接呈现的街区“肌理”,街巷中的设施如水井、牌坊等等。另一是成片的建筑,有些本身是文保单位,有些则已成为文物。无形的则是这里的老居民世代形成的生活习惯、民情风俗、邻里关系以及家族的文化遗产。这两方面都不能偏废,只有兼顾好了,才算是真正的保护。

(2)目前寺街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进展缓慢,主要是在保护的指导思想上比较重视有形的而忽视了无形的所致。其实不少住户不愿搬走,并不完全是因为“要价太高”,而确实是对寺街这块自己的“衣胞之地”难分难舍,这本身是文化的因素在起决定作用,这不能轻易用人为的力量去解决。可借鉴外地的一些经验,以自愿为原则,愿搬走即搬走,愿留下便留下!

(3)要制订具体不同的政策,不搞“一刀切”,但要“切几刀”。愿意迁出的住户由政府给予优惠安置政策和补偿或安排(因为寺街街区毕竟是“黄金宝地”,人们生活、交通、上学有诸多便利),对部分公房住户可试行产权置换后,与其他愿意搬走的私房户享受同等待遇,避免安置上的矛盾。对愿意留下的住户,则要向他们提出自我修缮住房的标准和要求(如屋面、围墙、天井按古建筑要求,拆除违法的建筑等),派专人上门指导,视进度和是否符合规定而给予奖励或补贴。这样做,将能调动原住民保护自己家园的积极性,大大减轻政府的压力。

(4)在这基础上,政府可腾出人力财力,着重改善住户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修缮迁走人员的住房,将街区范围内的各种管线(水、电、煤气、互联网、排污、消防)合理布排、铺设,并把终端引入每家每户,使老街区的居民也能享受到新建小区居民的生活条件,这不仅保护了历史街区,也改善了民生。

(5)保护历史街区有两个积极性总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但要调动原住民积极性,要靠妥善的政策和过细的宣传(包括政策条款、保护详规乃至每家每户的修缮方案等),还要做为民解困的过细工作。

(6)寺街历史街区的保护工程量大,工作较为艰巨,可以在总体政策及规划指导下,分地段实施。但切忌将原属历史街区保护范围的街巷以其它名目进行局部拆除。

国术家陆景机之墓亟待保护

王兴相

通州区张芝山镇八字桥村 26 组有一座不很醒目的故国术家陆师凯景机之墓，陷于杂草丛中，除了其后人在清明节期间有些祭扫活动之外，几乎无人前来瞻仰、祭拜。鲜为人知的是，陆景机是追随并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国同盟会会员，是全国著名的国术大师霍元甲的第十名入门弟子，被中国近代倡导“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政治家张謇称之为爱国青年武将，并聘其为南通巡警教练所教习。

陆师凯，以字景机行于世。1881 年出生于南通县南兴乡大明村（现属张芝山镇八字桥村）。他性格刚强坚韧，从小好读书，爱拳术。他 7 岁入学，便利用读书之暇，朝夕研练拳术，练就一身本领。人们称他为“坐地八百斤”，能“飞檐走壁”。他还拜全国著名的国术大师霍元甲为师。霍元甲见他年青志高，武艺出众，功底深厚，欣然收他为入门弟子。

1899 年，陆景机来到苏州参加了清代最后一次武秀才考试，荣获第一名。后因科举制度废除，他便随其叔父陆同一（字永孚）进入苏州武备学堂，后又投身于江宁将备学堂学习。期间，他结识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赵声（又名赵毓华、字伯先），在其影响下，1906 年陆景机参加了中国同盟会。他精通武艺，熟娴韬略，既有义侠之气，又有刚肠热血，积极追随并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成为清末南通著名的爱国青年武将。

1907 年（光绪三十二年），赵声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于广东主持军务。陆景机接到其召唤南下的书信，为实现自己的民主革命理想，他慨然从命。到达广州不久，适逢钦廉变起，他被为命前驱，与赵声率军前往，深入瘴疠，屡濒于危而不顾，军心感奋，锐利无前，历经大小战斗，所至则胜。大吏以“韬略熟娴、果敢从戎、胆识俱优、身先士卒”十六字奏奖之。而他不显其战绩，不言其战功。是年冬，他因病告假回归故里。

时任全国农商总长的状元公张謇正在南通筹建巡警教练所。他得悉陆景机是南通人士，刚从粤东旋归故里，是个出色的武备、将备人才，武艺精湛，又熟谙战阵攻守诸术，觉得人才难得，即聘其为南通巡警教练所教习。陆景机得到张謇之聘，十

分庆幸地说：“张公知我而聘我，将可大展我之学矣。”他便着手做教学准备，编撰了一部比较系统的中国拳术学教科书——《拳术学教范》，后来被列为国粹体育丛书。因南通巡警教练所校舍未竣，陆景机待命之际，便只身从南通溯江而上，对历史上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结合民主革命的发展形势，写成了《陆景机行军记》。

1909年(宣统元年)初，陆景机尚未来得及到巡警教练所赴任，广东赵声又来急书，命他速赴粤，有重任招之。陆景机接书后，家事稍作安排，教习之事也作了些交代，即只身赴粤，后被任命为督练参谋。可是不久，陆景机忽患牙疳，西医误投刀圭，竟一病不起，于宣统元年三月初二巳酉时卒，年仅29岁。陆景机不死于血战的疆场，而客死异乡庸医之手，实为可惜。张謇闻之，为南通、为国家失去一位年轻将才，也深感痛惜，数日难眠。事后，张謇特地撰写了《陆景机事略》碑刻，称之为“人也刚，学也儒雅”，给予高度评价。

为了缅怀陆景机，时任金陵陆军步兵队第十三师第十团官员陆同一，和陆景机胞弟陆师通(字景云，时任省立四中体育教员)，将其遗稿《拳术学教范》、《陆景机行军记》，经江苏省教学会审定，由商务书馆出版印行。张謇还特地为陆景机的遗著题写了书名。陆景机逝世当年，其亲属在原南兴乡大明村陆景机的墓地上立了一座“故国术家陆师凯景机纪念碑”。纪念碑的碑石上还镌刻着南通徐治文撰写的《陆景机先生墓志铭》。后因年久失修，加上无人管理，纪念碑被毁。上世纪80年代，陆景机的儿子胜樑、女儿雪瑛将墓地修葺一新，重立墓碑，但新立的墓碑十分简陋，且陷于杂草丛中。笔者认为，陆景机先生是位国术家，是南通难得的一位武备、将备人才，又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是位杰出的中国民主革命者，应该恢复其原来的纪念碑，除刻上原来的墓志铭外，还应刻上张謇亲笔写的《陆景机先生事略》，并将这一纪念碑列入文物保护项目，指派相关单位加以管理。

笔者还用心保留着张謇撰写的《陆景机先生事略》的墨迹(复印件)，经张謇研究会的同志鉴定，确认是张謇的真迹，而且是第一次发现，被列入新修订的“张謇全集”。同时，笔者还保留着张謇为陆景机先生撰写的墓志铭墨稿、陆景机像、“故国术家陆师凯景机纪念碑”的字迹等等。若能恢复这一纪念碑，并列入文物保护项目，笔者所保留的也可供一用。

(通讯地址:通州区党史办,电话:86522160)

珠算“人遗”三感

施景铃

2013年12月4日,中国珠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消息传来,作为“中国珠算博物馆”所在地的南通人都感到十分欣喜,我亦不例外,欣喜之余感叹有三:

一是感叹我中华民族非凡的创造力。和火药、指南针、造纸、活字印刷是闻名世界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一样,具有1800多年历史的珠算,可谓源远流长。从上古时期的垒石记数,结绳记事,到殷商甲骨文中十进制记数法的产生,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数学家们的不断改革创新,直至唐宋元明的明代前期,商业贸易已十分兴旺,珠算应用越来越广泛,研究随之深入,不但四则运算已形成口诀为指导的独立运算体系,而且在算盘上进行开平方、开立方的运算技术也相当成熟。可以说算盘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它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它不仅在中国广为流传,还传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它还是我国各行各业广为使用的计算方法和计算工具。珠算是历代中国人有关自然界和宇宙中数的知识和实践,是中华文明赖以成长的重要智慧。这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其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认同,将进一步理解珠算的成就及其与自然和宇宙的关联,增强对中华民族科学文化创造力的尊重,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和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二是感慨:“沧海桑田越千年,知识爆炸弹指间”。真不敢想象,千百年来上到天文历算,下到农田水利,大到国家经济发展,小到百姓家庭生活,人们都离不开的珠算,在改革开放仅仅三四十年后,一夜之间竟成明日黄花而远离了人们的视线。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中珠算被取消。如今,“三下五去二,二一添作五”等家喻户晓的口诀,许多学生浑然不知,也成为我们这些老者往日的记忆。真难想象,一百多年前的清代,除珠算外,还有西方传入的笔算、纳伯尔筹算和尺算,统称为“四算”,而据当时的数学家们评价,还是珠算应用起来最便捷。更使人难忘的是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但你知道吗,当时原子弹的许多数据竟都是算盘高手演算出来的。影片《横空出世》中便有这样一个场面:在一所大学的食堂大厅,数百名算盘高手在演算原子弹的数据。为什么要搞珠声阵阵的人海战术?因为当年全中国只有一台计算机,更无研制计算机的技术。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

后,苏联专家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有关设备,中断了援助,也使我国原子弹计划一下子搁浅。这件事恰恰激发了我国科学家群体的爱国精神和顽强意志,也证明了珠算这一优秀传统文化在高科技领域仍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成万上亿个数据,科学工作者们经常用算盘拨到深夜,他们用算盘解决了许多数学难题,从而创造了世界奇迹。除此之外,我国核潜艇的试制阶段,其成千上万个数据也都是靠算盘和计算尺一个一个地演算出来的。如今,算盘已进了博物馆,珠算亦已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产,但令人欣慰的是,当今的电子计算机领域,中国超级计算机运算速度重返世界之巅,由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天河二号”以每秒 33.86 千万亿次的浮点夺得全球第一,比第二名的美国快近一倍。从古到今,再次证实了中华民族的创造伟力。

三是感想。珠算申遗成功,使我国入遗项目达到了 38 项,使中国成为目前世界上拥有“非遗”数量最多的国家。然而,“入遗”并非目的,在人们感叹“一手好字被电脑废了,一个好算盘让计算机废了”的电子信息时代,如何认识珠算的文化价值,珠算在当今时代还有什么功能,“入遗”的珠算应该如何保护和传承,应该引起社会、学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关注。

首先,要让大家认识到珠算不仅仅以其独特的传统结构和算法口诀,为人们提供了快捷便利的计算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也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演变,风土人情、生产方式、文化理念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即便是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像珠算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还是需要保护的。珠算不但显示了一种非常奥妙的中国人的数学计算方式,它还是一种思维的方式,一种智慧的、创造的形式,是对我中华文明的一种肯定。

其次,要成立相关的组织和社会团体,如中国珠算协会、中国南通珠算文化研究会等组织,应开展各项活动,在技艺传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中国珠算文化的传承,挖掘梳理研究珠算文化的内涵,比如珠算及珠算文化的发展历史,珠算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的历史和作用等。

再则,要以创新的思维,找到珠算文化在当今时代的价值,并培育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了解珠算、熟悉珠算、运用珠算,这是最好的保护和传承。可喜的是,我们南通市捷足先登,经教育局批准建立了“南通少儿珠心算学校”,以“游戏中学习珠心算,娱乐中开发脑潜能”为宗旨,开展少儿的珠心算教育教学活动。

第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财富。所以在“非遗”的保护方面,适度推进国际间的合作和交流也是十分需要的。据悉美国早在 1973 年就把珠算当成新文化引进教学课堂,1977 年成立了珠算教育中心;马来西亚 2005 年在首都吉隆坡召开了“跟我学珠心算教育运动大会”,国家前总理马哈蒂尔主持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广泛承认“珠心算”有助于孩子们开启心智,理解数及位的意义和计算结构。

南通是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亲手缔造的教育之乡,是全国第一个博物苑的诞生地,如今中国珠算博物馆又落地南通,在中国珠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时,让我们进一步做好“珠算”等“非遗”的保护、传承,为我们“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南通增添新的光彩。

深深的记忆

张慎一

以前我总是讲：“我是一个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年。”现在我要说：“我是一个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老人。”我今年 74 岁了，退休十三年了，上班时忙于工作，现在可以静下心来，想想过去，想想现在，再想想在人生道路的最后阶段该做些什么，该留下些什么。这勾起我一段段深深的回忆……

首先让我记忆最深的地方是唐闸。上世纪五十年代，那里有用我祖父名字命名的“敬孺中学”（现市二中）和“新新旅馆”（我祖母娘家开的旅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敬孺中学”曾让父母一齐去任教，但我父母没肯去，因为有“敬孺”二字。

叔祖父张敬礼让我记忆最深的有两件事。1960 年我还在南通师专学习，他每次遇到我总有一句话必讲：“学习成绩怎样？不要总想着张家过去的的生活。”1961 年我毕业了，分配到淮阴工作，当他知道我要去淮阴的时候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中说：“好，这个地方好，在甜水里泡过，还要在苦水里再泡一下。”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另一件事，1962 年我探亲回家，和南京的同学一起走，从淮阴先到南京。当时叔祖父是江苏省纺工厅厅长，我特地到他家去看望了他。临走时，他一定要给我 50 元。我说现在我每月有 34 元工资了。他说，这不是给你的，是给你母亲的。

父亲张遂吾（张缵武）在我印象中最深的也有两件事。父亲是大生三厂厂长办公室秘书，在我学生时代，他每年都要到南通纺工局上班几个月，当时只知道是在写“大生纺织史”，一直到“文革”前还没写好。直到 1989 年，我在启东政协开会，统战部一位同志交给我一本《大生系统企业史》。该书“后记”提到了我父亲和大婶（任副厂长的黄稚松）二人，我才知道这么多年里，他们为编写大生系统企业史而努力工作着。另一件事是，1967 年一天上午，父亲突然回家，母亲问他怎么没有写信就回来了，父亲说来不及。当天晚上，他们俩把“张氏家谱”及两幅唐伯虎的画烧了。父亲说，“家谱”是“变天账”，画是“封资修”，万一造反派来抄家还了得？

二姑妈张柔武是南通师范音乐老师。初中期间，我喜爱音乐，本想考“南艺”音乐班，每周日，我都要去她家练钢琴，她会指导我。由于后来民乐部分成绩差没能考上。叔叔张绪武给我的印象更深。1984 年，我从南通调到启东“盖天力”工作。1985 年我接到启东政协通知，让我参加会议。政协主席陈启贤当时在会上宣布我为第七

届政协委员。会后陈主席告诉我,接到张绪武副市长来信,建议让我参加政协,因为张氏后代在启东只有我一人。我是七、八两届政协委员,九、十两届政协常委,还是工商联常委。

记不清哪年“清明”节,我和母亲一齐去上坟,正巧张绪武叔叔(当时他是江苏省副省长)也在那里,还有南通市的部分领导。上坟结束了,我们准备回家,叔叔把我母亲叫住,让母亲一齐和市领导留影。母亲说:“你们领导拍照,我是老百姓,不拍,不拍。”叔叔跟领导讲:“这是我二嫂。”后来就一齐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留影。

点点滴滴的往事,留在我记忆中,倏忽之间,已经半个世纪了。现在回想起这一切,我想,人的一生是平坦的,也是坎坷的,但我坚守一个底线——真诚。

写于 2013 年 10 月

江海文化在海门

邹仁岳

一、什么是江海文化

江海文化作为南通市的地域文化已经提出和研究了十多年，并积累了很多成果，但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定义。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提出的江海文化是以行政区划来确定的，这当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也有局限性。行政区域的划分是人为的，而文化的起源、形成、发展和传播更有自然和社会的原因，是不受行政区域限制的。一个区域可能有多种文化存在，反之，同一种区域文化可以跨越多个行政区域。

我认为，江海文化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形态，凡是大江大河的入海口都有江海文化的积淀。它是在沧海桑田、江海变迁的自然演变的过程中，在人类长期的顺应自然、改造自然、适应环境、创造环境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各种物质和精神的文化积淀和文化创造。它具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必须在大江入海口；二是必须经过长期的沧桑演变过程；三是必须经历各个时期人类的迁徙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国长江口，无疑是中国江海文化的最重要的区域。从广义的角度讲，它包括长江入海口的南北两侧，其南侧最早可追溯到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北侧可追溯到青墩文化，这是江海文明的起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江海文化大区域内部，出现了各个不同的小区域文化，如上海称之为海派文化，而海派文化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上海开埠以后形成的都市文化。而在长江口北侧，则更多地保留了江海文化的基本元素和特征。

二、南通江海文化的特点

南通作为江海交汇，五方杂处的地区，它的文化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多个板块的组合。其北部是海安，它成陆较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出现青墩文化，后来消失了，但在汉代又开始成陆。其中部是通如地区，它是在古代胡逗洲和扶海洲的基础上涨连成的土地，并延续至今。东南部是海启地区，这原是古代东布洲的区域，东布洲自元代中叶以来，逐渐坍没，至清初所剩无几，将海门裁县为乡并入通州。但清中期以后又大规模复涨而形成的一片新生的土地。

2. 多元文化的融合。北部的海安长期以来受到其北侧的江淮文化的影响，江淮

文化的特点保留较多;中部的通如地区文化源比较复杂,但更多的受到扬泰文化的影响;东南部的海启地区(也包括上海崇明岛)则成为江南吴文化在江北的分支。

3.多个阶段的断合,就是中断与结合。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片地区的江口变迁,沧海桑田不断地演绎,远古的青墩文化中断了,但后来海安的文化又崛起了;海门的古代文化也曾中断,但后来随着土地的复涨海门文化又复兴了,并走向新的繁荣。也有一些分支的文化似断非断,如通东地区。

因此,南通地区具备江海文化的基本要素,将区域文化定名为江海文化是确切的。同时,海门作为南通江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和地位,如果放在江海文化大区域的背景下考量,海门的江海文化更具典型性,它位于江口南北的接合部和江海文化的中心点,其上接江北的传统文化,下承江南的优秀文化,具有江海文化独有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发展前景。

三、江海文化在海门的形成和发展

1.海门江海文化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早期(孕育)。从唐代江口沙洲的出现到东布洲的形成,直至后周显德五年(958)海门建县,这是海门江海文化的孕育期。东布洲形成后,成为煮海烧盐的地方,最早的居民是朝廷流放于此的犯人,从事海盐生产,这是海门最早的移民,也成为后来海门的第一批原住民。这个时期的文化应该说是很苍白的,除了流传的劳动号子和一些民间习俗外,几乎没有文化艺术的生产。这个时期最大的闪光点,是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兵败后避祸于白水荡(白水荡在今吕四附近),为海门的早期文化抹上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第二阶段:中期(发展——衰落)。从公元985年到1672年,历700多年,这是海门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后周显德五年(958)海门建县,但没过几年,后周被宋朝取代,但此时海门仍是一个沙岛,与大陆阻隔,如同现在的崇明岛。北宋中叶,海门与大陆涨连,朝廷在此设盐场,名余庆场,后又设吕四场,盐业文化得以兴盛。元代余庆场分为余东、余中、余西三场,随着盐业的兴盛,场署城镇建设规制完备。运盐河的开掘、范公堤的堆筑使海门经济稳定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兴旺、商业的繁荣和小集镇的兴起,而范公堤和运盐河也成为海门古代文明的重要标记。同时,由于北方的战乱和灾荒,大批移民不断到此开发定居,人口不断增多,文化教育也随之繁荣,以崔桐、张成、彭大翱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使海门文化进入鼎盛时期,以《东洲集》为代表的诗文书赋大量产生。王安石、沈起、文天祥等名人更为海门文化增添耀眼的光芒。由于倭寇的侵犯,海门位于长江口抗倭第一线,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多次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至今有多处抗倭遗址。然而,自元代中叶起,海门土地开始坍削,尤其是明代中后期,土地加剧沦于大江,县治被迫四迁,人口大量流失,最终于康熙十一年(1672)撤县为乡,并入通州,海门古代文化中断。

第三阶段:后期(复兴)。清雍正、乾隆年间,海门土地复涨,大小沙洲相连形成新的广袤平原,乾隆三十三年(1768)复建海门厅。以陈朝玉为代表的垦荒群体自崇明来海,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围垦高潮,农耕文化迅速发展。土地的不断扩大和人口的不断增多,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市场。自嘉庆年起,以镇江为代表的苏商群

体,以宁波、绍兴为代表的浙商群体,来自皖南的徽商群体相继进入海门,海门各地的小集镇迅速形成,星罗棋布;而来此经营者大多是徽商等外地商人,海门县城茅家镇的两条大街的店号几乎全是宁波、徽州、镇江等地商人所开,茅家镇成为海门最繁荣的商业城镇。海门海关的建立标志着海门对外贸易的发展。清咸丰年间太平军进军江南,江南陷于长年战乱之中,大批江南难民逃至海门。同崇明人来海垦荒不同,这时期进入海门的有大量的富有阶层、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带来了江南的优秀文化,使海门的文化教育事业在清后期出现高潮,各类人才相继涌现,张謇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第四阶段:近期,清末至民国。近代以来,以张謇为代表的实业救国理念深入海门人心,近代工商业和近代农业迅速发展。大生三厂、颐生酒厂、大储栈等实体使海门较早进入近代化,青龙港的开埠使海门在苏北地区最早接轨上海。通海垦牧公司的成功创立,拉开了中国近代沿海开发的序幕,使海门成为中国近代垦牧第一滩,并成为苏北大规模围垦开发的发端地。可以说,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江海地区,围垦文化在海门最为典型,最为丰富,沿革时间最长,底蕴最为深厚,积累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财富最为明显。张謇的“父实业母教育”的理念使海门的近代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海门后来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崛起与那个时代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2.海门江海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1)海门江海文化受自然环境变迁的影响。千百年来海门地域反复演绎沧海桑田,自然灾害尤其风潮灾害年复一年,在这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家园,一代代与大自然抗争,创造了许多既适应自然又改造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积淀了丰厚的精神财富。

(2)海门的江海文化是人类活动自身规律所决定的。海门本无真正意义上的原住民,一代代移民来此开拓。人口来源主要四种成份:一是古代来自各地从事煮盐的盐民;二是因战争动乱来自大江南北的难民;三是主动来此开发的崇明和江南的农民;四是从江南各地来此经商的商民。他们来自大江南北,千百年来,他们互相融合,从而形成具有海门自身特点的地域文化。

(3)海门的江海文化是其独有的地域条件所决定的。首先,江口沙洲的形成和扩展为移民北上开垦和吴文化的北上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其二清末战争使江南人口北迁,知识分子及其他各类社会群体进入海门,改变了海门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第三,资本主义的萌芽较早出现在海门,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传播;第四,海门与上海亲近的地缘关系,使海门较早地吸收了西方文化。

所以我觉得,海门处于江海文化的中心区域,南北文化在此融合最为丰富,最为紧密,更具有江海文化的兼容性、活跃性和创造力,从而形成了海门文化的精神特质。

四、海门江海文化的精神特质

1.敢于开拓。开拓精神是海门人世代积淀下来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直把陈朝玉作为开拓者的代表,这当然不错,但是当时到海门来的还有千千万万

的开拓者,多是极其普通的人。今年,我到陈朝玉的开发地三角沙(现万年)调查,随意问一个农民:“你祖上是从哪来的?”他说“是崇明过来的。”并说,当时他的先祖从崇明过来开垦时,是将老祖宗的“骨殖髻”一起背过来的。我就想:海门人的开拓精神更具有悲壮的色彩,可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当时来海的拓荒者更有一去不回头的勇气和决心。近代的海门人北上苏北沿海拓荒,当代海门人走出国门闯荡正是这种精神的传承。

2.团结凝聚。到海门来开发的,多是分散于四方的贫苦农民,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必然会团结一心,才成大事。海门没有传统的宗族势力,没有大家族的聚居,更没有宗族间的争斗,有的是各个姓氏间的团结与和谐。海门人有句俗话,就是做起事来大家“一蓬风”,“一蓬风”是向着江海扬帆起航的情景,也是海门人团结一心追江赶海的生动写照。我的外婆家原来居住在海门宋季港的江边,那里年年要遭受风灾水患,严重时整片的土地坍入长江。据我母亲讲,她小时候就看到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安排人拿着锣,轮流在江堤上巡守,一旦发现险情,巡查人就拼命敲锣,附近的人听到锣声,就从四面八方赶来抢险或者及时转移。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海门人千百年来生活的常态。沙土是松散的,而人心是凝聚的,正是有了这种团结的精神和力量,海门才得以巩固和发展。

3.思想解放。海门人不保守,不受清规戒律的制约,敢于扬弃,善于接受新生事物,这也是移民文化的特征。这种优秀传统,在当代海门人的行为中也体现得非常充分,海门的各项事业的建设之所以都走在苏中苏北前列,和海门人的这种传统精神是分不开的。

4.善于经营。在长江口北侧,海门最早形成经商群体,各地的经商理念、经商模式和先进思想在这里融合提炼,形成了海门人经营活动的前瞻性和灵活性,善于抓机遇,敢于闯市场,在当代海门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海门本地,也有沙地与通东地区之分,两者之间在生活方式民俗习惯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沙地与通东文化的异同另文阐述),但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却是一致的。海门的精神文化财富是沙地人和通东人所共有的。

青墩文化的魅力值得永远探究

王其银

我研究青墩文化缘自偶然。

当年在南京读书,有空常到中山门内的南京博物院看展览。一次在玉器陈列馆看到几枚精美的玉器标着“江苏海安沙岗青墩遗址出土”的字样,心里顿时吃了一惊,暗自思量,家乡居然还有个青墩遗址,且出土了这么精美的玉器,有机会定要到遗址所在地去看看……

学校毕业后分在基层工作,整天忙于琐事,并未能有机会及时到近在咫尺的青墩去,直到十多年后某日头脑里突然闪现南京博物院玉器馆看到的几枚玉器,才下决心到青墩走了一趟。

去了很失望。遗址在沙岗青墩什么地方不知道,再三向人打听,才找到发掘地点,且发掘现场早已被泥土回填,上面种着庄稼,什么标志也没有。

回来后感慨良多,向周围的人诉说,没人知道海安还有个青墩遗址。后来想起来应该到博物馆去转转,兴许能看到点青墩出土的东西,然而也没有(事实上有几件,但当时没陈列,主要是无人关注青墩遗址)。

在博物馆我碰上了谭伟老师。谭老师是做学问的人,喜欢篆刻、书画,也能用指墨作画。我问他博物馆怎么没有青墩出土的东西,他说有几样,但没地方陈列。我又问他有没有关于青墩遗址当年考古发掘的资料,他说有份刊在《考古学报》上的发掘报告的复印件,如想看可以借你一阅。

于是我把那份复印件借了回来,不看则已,看了非常惊讶,原来青墩遗址当年出土了 1000 多件文物——只可惜,出土文物大多被南京博物院和南通博物苑收藏了。

仔细研读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后,我对海安拥有青墩新石器遗址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又为青墩遗址“养在深闺无人识”而感到惋惜,于是写了篇《探寻青墩遗址的光华》刊发在《江海晚报》上。文章发表后引起许多人注意,南通有位老干部特意把刊载文章的报纸寄给海安当时的县委书记秦厚德,并在信中希望海安能保护利用好青墩遗址。

秦书记看了信和报纸,当即与沙岗乡和青墩村联系,要求乡里村里保护好遗

址,同时要村里想办法在遗址上建个标志,让人们知道遗址的所在。

于是青墩遗址标志亭建了起来,而看了那篇文章后专程到青墩探访的人也越来越多,渐渐地在海安乃至南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青墩遗址。

时隔不久,改革开放的浪潮将各地的经济建设迅速推至一定阶段,这时人们发现,振兴地方经济,特别是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的竞争,说到底还是文化底蕴的竞争。于是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文化品牌,千方百计想构建与众不同的东西——海安同样如此,苦于一直找不到自己鲜明的特色。

2002年,我调县委宣传部兼史志部门工作,开始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历史文化和地方史研究,在深思熟虑之后我向县委县政府负责人提出打造青墩文化品牌的建议,并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向新任县委书记张爱军建言举办青墩文化艺术节,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肯定。

为了在更大范围之内宣传介绍青墩文化,我开始广泛联络考古专家学者,请他们帮助呼吁提升青墩遗址的保护利用等级,并撰写研究青墩文化的理论文章。这期间,我先后拜访过十几位专家学者,如南通博物苑的邱丰(他最早到青墩遗址调查)和徐治亚研究员,南京博物院的梁白泉、纪仲庆、张敏所长,江苏省社科院的吴功正先生,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之恒教授,南京艺术学院的殷志强教授,还有海南大学数学系的耿济教授等,他们有的参加过当年的考古发掘,有的是在考古领域很有建树的专家学者。经过同他们广泛的接触,我进一步加深了对青墩遗址保护利用的紧迫性的认识。在约请专家学者撰写理论文章后开始仔细研读他们的文章,并对考古发掘报告反复研究,碰到专业术语不懂的就向他们请教。张之恒、张敏先生则把他们在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介绍给我,这使我很快沉浸到考古学研究领域。

为了弄清青墩遗址与周围遗址的关系,我在四五年时间里,断断续续地把浙江河姆渡遗址、苏南良渚文化遗址、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以及江淮东部地区的姜堰单塘河遗址、天目山遗址和高邮龙虬庄遗址、连云港桃花涧遗址等都跑了个遍。在对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商周时代遗址都作了一定的研究之后,我开始撰写研究文章,并着手编写研究青墩文化的书籍,经过10多年艰苦努力,先后出版了《青墩文化》、《青墩遗址》、《江海文明之源》、《苏中探古之门》、《东方易学之祖》、《青墩考古》、《鹿鸣青墩》、《凤仪青墩》、《龙腾青墩》以及近期出版的《青墩文化研究荟萃》等10多本青墩文化研究书籍,而本人也在这过程中撰写了不少有一定影响和研究深度的学术文章。

我撰写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是关于遗址文化命名方面的研究文章。因为青墩遗址的历史地位重新被认识之后,仍有不少人认为只能称“青墩遗址”,不能称“青墩文化”。而我在编写有关专著的过程中,认真研究比较了江淮东部地区几个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同时对照夏鼐、张忠培先生关于遗址文化命名的三个条件^①,鲜明地提出江淮东部地区的原始文化应以“青墩文化”命名,并撰写了论证文章在考古学术权威刊物《东南文化》上发表,引起考古界的广泛重视,进而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目前提“青墩文化”已是很平常的事了,但是在10多年前,提“青墩文化”就被

人说道,甚至文博圈内有些人也不以为然,但历史证明我和我的同仁做对了。特别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之恒先生将“青墩文化”写进大学教材之后,那些人终于无话可说了。

此外,关于青墩麋鹿角刻纹的研究,我也做了拾遗补缺的工作。麋鹿角刻纹在考古发掘报告中被误读,是件很遗憾的事情,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并尽所能作了更正,希望能引起考古专家和易学家们的正视。

为了回顾总结这一艰难的探索过程,同时也为了更深入更系统地研究青墩文化,我于2012年将本人10多年的研究成果汇编成册,冠名《青墩部落的踪迹》出版发行,进而在更深层次上推进青墩文化的研究。

关于麋鹿角刻纹被误读的更正,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之恒曾说这样一番话,他说:“考古发掘报告的执笔人是纪仲庆,其主要内容则是参与考古发掘的几个人分工撰写完成的。考古发掘报告发表后引起易学家的关注,主要是就麋鹿角刻纹为易卦初始符号吸引了人们的眼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易学家张政烺先生首先在论文中引用,后来易学家孙振声、徐锡台等人也曾引用过。但是很遗憾,考古发掘报告中对青墩遗址出土的麋鹿角刻纹并没有准确完整的报告,有的甚至作了错误的表述,这是30多年后王其银先生在仔细研究实物图片,并对照考古发掘报告的陈述发现的。”

“王其银的发现,在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青墩考古》中作了明确的阐述。我以为这是对30多年前青墩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出现错讹的最重要的更正——且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更正的同时,还对该麋鹿角刻纹的涵义作了有益的探索——其探索,对刻纹的涵义有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是很令人鼓舞的。”

我的《青墩部落的踪迹》出版时,曾将书稿寄给张之恒先生请他审阅,他欣然为我的书作序,并在序言中这样褒誉我,说作者“对青墩文化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青墩遗址在江淮东部地区的历史地位,青墩陶器研究,青墩玉、石器研究,青墩文化内涵研究,青墩地域文化乃至青墩文化传承研究,他都有独到的见解与认识。尤其是对青墩文化内涵的研究,他在正确把握夏鼐、张忠培先生提出的遗址文化命名三原则的基础上,对照江淮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实际,鲜明地提出青墩遗址的文化遗存可以代表江淮东部地区的原始文化,这是很有见地的”。

关于我在青墩陶器、青墩玉、石器方面的研究,张之恒先生则认为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比如青墩遗址出土的红陶鬶、二流壶、灰陶高足杯与贾湖遗址出土的文物相联系,引发关于青墩出土陶器中存在酒器的探索研究;青墩出土刻纹玉瑗、玉璧、玉琮与盐城青墩镇、泗阳青墩遗址相考量,进而引发‘青墩部落’在江淮之间曾经大范围迁徙乃至存在‘部落酋长国’的猜想等,这都是很有意义的研究”。

当然,坦率说,我在青墩地域文化和青墩文化传承上也确实作了一些有益的探析,比如对全新世海侵后青墩部落的迁徙、江海平原的成陆、江淮东部地区人口的变迁,尤其是蚩尤部落与黄帝部落争战后残部的去向等进行了有历史依据的探讨,这对研究江淮文化、长江中下游文化乃至青墩文化与华夏文明起源的关系有许多重要的影响,已引起不少读者的关注。

我不是科班出身的考古学研究者,只是本着对家乡的热爱,孜孜不倦地探索,在青墩文化研究和青墩遗址保护利用方面做了一些应做的工作。需要指出的是,青墩文化研究虽然经过 40 年积淀,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还远远没有穷尽,到目前为止,对麋鹿角刻纹的研究,对玉、石器的研究,对稻作文化东传日本、韩国的研究等,都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在有些领域,比如青墩遗址出土骨角器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空白,因此对青墩文化的研究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没什么可研究的了”,而是仍有许多课题需要探索,需要破解。

可以预期,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墩文明在江淮东部地区乃至长江流域的远古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

青墩文化研究方兴未艾!

注:①遗址文化命名三原则:(1)反映古代居民的活动具有一定的规模以及遗存情况较好;(2)遗存在年代及地域上具有质的相对稳定性,而不是那些过渡性遗存;(3)考古工作具有一定的质量及规模……三者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

(通讯地址:海安县委宣传部 联系电话:13485153240)

我心中的名人顾养谦

文之虚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有“三不朽”的名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明朝的南通籍名将顾养谦，是完全当得起这“三不朽”的名言的。

首先，顾养谦具有崇高的品德。他精忠报国，以天下为己任；他建功不求赏，推恩给部下；他关心民生，为民请命，到处兴修水利，爱民如子；他淡泊于名利，分财给士兵、百姓及家人。

其次，顾养谦一生创建了不朽的功业。他变剿为抚，稳定“建州黠酋”努尔哈赤；他援朝抗倭，靖边防乱，使辽东一带承平四十年；他文韬武略二十年，百粤遥传一日平；他智勇双全抚辽东，萧瑟三关夜无盗；他纂史修志，关心家乡建设。

再次，顾养谦一生立言甚多。除《抚辽奏议》20卷、《督府奏议》8卷外，还有《益卿诗文全集》20卷。他工诗善吟，被称为一代诗宗。他文笔优美，散文成就也很高。

此外，顾养谦在书法与园林艺术方面，也有极高的素养。他精于行书、草书、篆书，风格铄利遒劲，气势恢宏博大。乾隆时的著名诗人与书法名家赵怀玉曾作诗赞扬道：

晴窗遗墨今更披，想见兴到濡笔时。

微吟每以陶谢法，独草岂徒旭素师。

说他的诗继承了晋、宋间著名山水田园诗人陶渊明和谢灵运的传统，说他的草书不仅继承了唐代草圣张旭、怀素的技巧，还融入了其他著名书法家的技巧。可见顾养谦在这两方面成就之高。至于顾养谦所构建的“山楼水榭，胜甲一城”的珠媚园，它的美学品位在当时更是首屈一指的。

可是，谁能相信，这样一位文武全才、功勋盖世、品德崇高的杰出人物，《明史》居然没有为他立传，因为修《明史》是在清朝，顾养谦曾经抗击过清太祖努尔哈赤，犯了满清最大的忌讳，在文字狱极其残酷的清代，史臣们又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冒灭族之险去为他立传呢？然而，既要编写史书，又怎能完全消除这位文武全才、功勋盖世、品德崇高的杰出人物的身影呢？实际上，在《明史》与《清史稿》中，仍有好多处不得不写到顾养谦的事迹，细心的读者可以去查阅。

现将《明史》中出现的 12 次,摘录如下:

(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丙辰,蓟辽总督顾养谦兼理朝鲜事,召宋应昌、李如松还。是年,赈江北、湖广、河南、浙江、山东饥。——《明史·卷二十》

(万历)十三年,以尚宝少卿徐贞明兼御史,领垦田使。贞明为给事中,尝请兴西北水利如南人圩田之制,引水成田。工部覆议:“畿辅诸郡邑,以上流十五河之水泄於猫儿一湾,海口又极束隘,故所在横流。必多开支河,挑浚海口,而后水势可平,疏浚可施。然役大费繁,而今以民劳财匱,方务省事,请罢其议。”乃已。后贞明滴官,著《潞水客谭》一书,论水利当兴者十四条。时巡抚张国彦、副使顾养谦方开水利於蓟、永有效,於是给事中王敬民荐贞明,特召还,赐敕勘水利。——《明史·卷八十八》

惠、潮地相接,山险木深。贼首蓝一清、赖元爵与其党马祖冒、黄民太、曾廷凤、黄鸣时、曾万璋、李仲山、卓子望、叶景清、曾仕龙等各据险结砦,连地八百余里,党数万人。正茂议大征。会金莺等已灭,诸贼颇惧。廷凤、万璋并遣子入学,祖昌、景清亦佯乞降。正茂知其诈,征兵四万,令参将李诚立、沈思学、王诏,游击王瑞等分将之,元勋居中节制,监司陈奎、唐九德、顾养谦、吴一介监其军,数道并进。贼败,乃凭险自守。官军遍搜深箐邃谷间。而元勋偕九德,追亡至南岭。一日夜驰至养谦所,击破李坑,生得子望等。明年破乌禽嶂。仕龙阻高山,元勋佯饮酒高会,忽进兵击擒之。先后获大贼首六十一人,次贼首六百余人,破大小巢七百余所,擒斩一万二千有奇。帝为宣捷,告郊庙,进元勋署都督同知,世荫百户。元勋复讨斩余贼千三百有奇,抚定降者,巨寇皆靖。——《明史·卷二百十二》

王家屏家居时,朝鲜用兵。贻书经略顾养谦曰:“昔卫为狄灭,齐桓率诸侯城楚丘,《春秋》高其义;未闻遂与狄仇,连诸侯兵以伐之也。今第以保会稽之耻,激厉朝鲜,以城楚丘之功,奖率将吏,无为主而为客,则善矣。”养谦不能用,朝鲜兵数年无功。——《明史·卷二百十七》

赵参鲁,字宗传,鄞人……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申严海禁,戮奸商通倭者。迁大理卿。召为刑部左侍郎,改兵部,旋改吏部。日本封贡议起,参鲁持不可。总督顾养谦不怿,争于朝,且言参鲁熟倭情,宜任。——《明史·卷二百二十一》

谭纶见而美之曰:“我历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已而顺天巡抚张国彦、副使顾养谦行之蓟州、永平、丰润、玉田,皆有效。及是贞明还朝,御史苏瓚、徐待力言其说可行,而给事中王敬民又特疏论荐,帝乃进贞明少卿,赐之敕,令往会抚按诸臣勘议。——《明史·卷二百二十三》

吴弘济,字春阳,秀水人。希范同年进士。由蒲圻知县擢御史。连劾福建巡抚司汝济、大理卿吴定、戎政侍郎郝杰、蓟辽总督顾养谦,不纳。——《明史·卷二百三十一》

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帝辄祭告郊庙,受廷臣贺,蟒衣金缙岁赐稠叠。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其始锐意封拜,师出必捷,威振绝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军赏、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赂,为之左右。每一奏捷,内自阁部,外自督抚而下,大者进官荫子,小亦增俸

赉金。恩施优渥，震耀当世。而其战功率在塞外，易为缘饰。若敌入内地，则以坚壁清野为词，拥兵观望；甚或掩败为功，杀良民冒级。阁部共为蒙蔽，督抚、监司稍忤意，辄排去之，不得举其法。先后巡按陈登云、许守恩廉得其杀降冒功状，拟论奏之，为巡抚李松、顾养谦所沮止。既而物议沸腾，御史朱应穀、给事中任应徵、佥事李文章抨击。事颇有迹，卒赖奥援，反诘责言者。及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相继谢政，成梁失内主，遂以去位。——《明史·卷二百三十八》

(万历)二十年召授五军三营参将。会朝鲜用师，(刘)綎请率川兵五千赴援，诏以副总兵从征。至则倭已弃王京遁，綎趋尚州乌岭。岭亘七十里，峭壁通一线，倭拒险。别将查大受、祖承训等间道逾槐山，出乌岭后。倭大惊，遂移驻釜山浦。綎及承训等进屯大邱、忠州，以金罗水兵布釜山海口，朝鲜略定。未几，倭遣小西飞纳款，遂犯咸安、晋州，逼全罗。提督李如松急遣李平胡、查大受屯南原，祖承训、李宁屯咸阳，綎屯陕川，扼之。倭果分犯，诸将并有斩获。倭乃从釜山移西生浦，送王子归朝鲜。帝命撤如松大军还，止留綎及游击吴惟忠合七千六百人，分扼要口。总督顾养谦力主尽撤，綎、惟忠亦先后还。——《明史·卷二百四十七》

沈有容，字士弘，宣城人。佥事宠之孙也。幼走马击剑，好兵略。举万历七年武乡试。蓟辽总督梁梦龙见而异之，用为昌平千总。复受知总督张佳胤，调蓟镇东路，辖南兵后营。十二年秋，朵颜长昂以三千骑犯刘家口。有容夜半率健卒二十九人迎击，身中二矢，斩首六级，寇退乃还，由是知名。辽东巡抚顾养谦召隶麾下，俾练火器。十四年从李成梁出塞，抵可可毋林，斩馘多。明年再出，亦有功。成梁攻北关，有容陷阵，马再易再毙，卒拔其城。录功，世荫千户。迁都司佥书，守浮屠谷。——《明史·卷二百七十》

程嘉燧，字孟阳，休宁人，侨居嘉定。工诗善画。与通州顾养谦善。友人劝诣之，乃渡江寓古寺，与酒人欢饮三日夜，赋《咏古》五章，不见养谦而返。崇禎中，常熟钱谦益以侍郎罢归，筑耦耕堂，邀嘉燧读书其中。阅十年返休宁，遂卒，年七十有九。谦益最重其诗，称曰松圆诗老。——《明史·卷二百八十八》

七月，倭从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时师久暴露，闻撤，势难久羁。应昌请留刘綎川兵，吴惟忠、骆尚志等南兵，合蓟、辽兵共万六千，(刘)綎听分布庆尚之大丘，月饷五万两，资之户兵二部。先是，发帑给军费，已累百万。廷臣言虚内实外非长策，请以所留川兵命綎训练，兵饷令本国自办。于是诏撤惟忠等兵，止留(刘)綎兵防守。谕朝鲜世子临海君[王聿]居全庆，以顾养谦为经略。——《明史·卷三百二十》

直至今日，南通人对这位先贤仍不太重视，《南通市志》虽为他写了约四百字左右的传，但仍嫌过于简单，且仅属客观叙述，未能作出较高的评价。恐怕在一般民众心目中，更没有顾养谦这样一位人物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南通，对于历史上杰出人物必须十分重视。有些城市在历史上并没有杰出人物，仍要千方计寻找关系，甚至“借用”别处的名人为自己张目；而我们却将这样重要的文化资源闲置在一旁，这岂不是太可惜了？

张謇、张謇、朱铭盘 与袁世凯的绝交书

姜光斗

光绪三年(1877)张謇与朱铭盘一起被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聘为幕僚,两人交往甚密。第二年袁世凯才投奔至吴长庆幕下,吴长庆让袁世凯在营中读书,并拜张謇、朱铭盘为师。开始时,袁世凯伪装谦恭、勤奋,读书尚算认真。光绪八年,朱铭盘与张謇、张謇兄弟随吴长庆驻军朝鲜,共掌机要,吴长庆对他们都以师长礼节对待。光绪十年,朱铭盘随吴军调金州(今旅顺),而袁世凯留守朝鲜。此后袁世凯对朱铭盘、张謇、张謇等人渐露骄态。因此朱铭盘与张謇、张謇联名写信给袁世凯,与之绝交。此信由朱铭盘执笔,指出袁世凯的错误有十三处之多。全信如下:

别后仅奉一书,固知司马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筱公内调金州,以东事付司马,并举副营而与之。窃想司马读书虽浅,更事虽少,而筱公以三代世交,肫然相信,由食客而委员,由委员而营务处,由营务处而管带副营,首尾不过三载。今筱公处万不得已之境,仅挈千五百人退守辽海,而以中东全局,为司马立功名富贵之机。溯往念来,当必有感知遇之恩深,临事之惧者。及先后见诸行事,及所行函牍,不禁惊疑骇笑,而为司马悲恨于无穷也。司马初来,能为激昂慷慨之谈,且谦抑自下,颇知向学,以为是有造之士。此仆等贸然相交之始。迨司马因铭盘一言之微,而得会办营务处之号,委札裁下,銜灯煌煌然,迎谒东抚,言行不掩,心已稍稍异之。然犹以少年气盛,不耐职事,需以岁月,或有进境也。东援事起,适际无人,謇遂与司马偕行,彼时司马意气益张,然遇事尚能奋厉,不顾情面,节而取之,兹犹足多。曾不意一旦反复,夸诞谬戾,至于今日所闻见者也!凡诸事无据,如自上申报以弋虚名,诡设同文馆以移物听等事,尚不足以折司马之心,姑不说。请即仆等所躬被者论之,一营务处常事耳,南北两洋漕河沿海道府州县往往有营务处之名也,仆等与司马虽非旧识,要是贫贱之交,而往春初见,虽翊翊作公孙子阳见马文渊之状,一再规讽,不少愧悔,此一可笑。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此二可笑。謇司筱公支应所,司马既有领款,应具领结,謇因司马问领结格式,遵即开写,辄斥为何物支应所,敢尔诞妄,不知所谓诞妄者何在?勿论公事矣,謇于司马平昔交情如何,而出此面孔,此三可笑。顾此犹寻常世态也,司马今贵人,不足以为轻重,更即有关于司马品行心术者论之。司马所谓营务处,分统三营之营务处也,会办

朝鲜防务,孝亭会办也,公牍具在,文理昭然。而司马札封称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将不屑于此间欤?则不应受事;将以此愚瞽东人欤?则东人不尽无知;将窃借北洋以欺人欤?则人不可欺。言官劾左宝贵者,列其妄称钦差钦命字样,不知司马此举与左宝贵何异?此其一。营务处是差事,而官则同知,五品耳,于镇将用札,于州县用札,等而上之,将道员兼营务者,于实缺提镇亦当用札耶?在司马之意,岂不谓关防颁自北洋,使用北洋体制,彼州县检簿之印,无一不颁自礼部,将亦与礼部一体耶?事例乖谬,此其一。既为孝亭会办,同见国王,便当孝亭居左,一应公事,便当会孝亭前銜。而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怨沸,司马将谓势力可以慑人,权诈可以处事耶?不学无术,此其一。内地职官,惟实缺出则张盖,若营务处营官,从未见有用之者。乾嘉间册使东临,国王迓以肩舆,曾被诏旨申飭,事载朝鲜大事考例。而司马居然乘舆张盖,制五色马旗,呵殿出入,平时建兵船黄龙大旗,不知自处何地?置孝亭何地?置国家体制于何地也?此其一。副营是筱公三十载坐营,方檄司马接管之日,歎歎嗟叹,遍谓宾客:“慰廷是三世交情,吾所识拔,必不负吾,必不改吾章程。”而司马接管后,初次来函,便较论海防教练各费,吞吐其辞,意谓筱公曾藉以冒领浮支,使之惊觉恐惧乎?不知海防费二千两,金州朝鲜各得其半,系有明文。教练费早于去冬十月截止,鼎铛有耳,岂不闻之?且筱公故人旧部,从者实多,用度日绌,而其津贴司马,动二三百四五百不等,即司马到营之始,仆役口粮,亦照差官发给,今恩谊所在略不顾,义利之辨略不省,此其一。筱公以副营畀司马,有举贤自代、衣钵相传之意,受人知者,虽其人之一事一物,亦须顾惜。而司马自矜家世,辄哗然谓其区区何足奇,便统此六营,亦玷先人。夫子孙当思祖父所以荣当世而福后人者,兢业已绍其休,不应蹈君家公路、本初四世三公之陋说。且由司马之说,则令叔祖端敏公、令堂叔文诚公进士也,尊公及令堂叔子九观察举人也,司马何以并不能博一秀才,玷有先于此大于此者,何不此之耻,而谩为夸说,使人转笑筱公付托之非,易一人而如此耶?司马谓此尚有良心乎?此其一。贩烟者有诛,宿娼有禁,司马所曾律以杀人刑人者。而烟膏鬻自三军府,则躬与之,不知何以对所杀所刑之人而无愧?此其一。教练所建营会办朝鲜防务,司马所得预者,军事耳。此外朝鲜一切政事,岂应越俎?而尹泰骏之被褫归第,李祖渊之解去兵符,司马公然为之关说;张敬夫所购湖桑,必不值一万四千金,此种弊窦,人人可晓,司马公然为之主持。司马今日方谓,凭我一言,何事不办?以此自鸣得意,曾不顾有识之嗤于其后,此其一。筱公于北洋,三十余年之旧部也,孝亭亦三十余年之旧部。司马于北洋,辗转因缘而窃承其呼吸者,载年余耳。司马尝为仆等说李某忌文诚公先公事,愤恨不已,今何以裁得其一札,公牍私函,便一则曰稟北洋,再则曰禀北洋,岂昔所谓怨者,今已修好耶?抑挟北洋之虚实,以笼罩一切耶?抑前所云者,不过因李某方冒天下之不韪,而姑借此说以附清议之末耶?是皆不可。况北洋未必能吞噬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亦未必尽如司马皈心委命于北洋。不能愚人,而徒自露其先后不侔之迹,此其一。茅少笙、纪雨农,此二人者,司马曾亲为仆等言其轻躁贪鄙贩货挟妓之状,且述二人酗酒辱骂筱公语,斥其病狂丧心,当时司马诚知人,诚能于筱公有昔贤待府主之义,今何以比而暱之,所闻司马之议论,且如出茅纪二人之口,此其一。

仆等与司马相识,今三年矣,以司马往日之为人,疑其不应如此;以司马今日之行事,恐其不止如此。试为溯其源,则司马胸中既恃家世,又谓二十许人作营务处副官,姓名见知于能办洋务之宰相,是旷古未有之事。又有虚僑者浮儉者圆熟者庸恶陋劣者左之右之,颂功述德,务求合乎司马之所乐,而司马亦遂志得意满,趾高气扬,而不顾蹈于不义。试为穷其流,则司马既与尹泰骏等换帖矣,必益联络朝鲜之中使外务衙门,张皇体面,高掌远蹠,使孝亭不安而退,必用兼并之术,扬此抑彼,轻此重彼,使筱公旧人互相不安而退,必借北洋以干预朝鲜一切用人行政之权,必交欢闵氏。俾国王专奏力荐,希图防务商务之柄,必以取重于国王者,因取重于北洋,希作海关道。凡此之说,未免近于逆臆。然欲檄总兵刘朝贵为提调,分明是闹标,分明是制郭春华,是何体制?而饰其辞曰:以符体制。此次国王来函,无一不称曰袁会办,而孝亭转似在牵连得书之例。此得谓司马心思力量手眼之所搆耶?今仆等与司马隔若秦越,亦何乐哓哓,然窃念当时交,实不忍徒引闾于知人之咎,而坐视其沈迷,故痛切言之。冀大声疾呼,以寤司马。或者谓司马见此训,必大怒大骂,必来见筱公辞差,必以讯并入浮言之例,哀禀北洋,以籍将来之口,而益坚北洋之信。或谓司马虽大怒大骂,然必故事含宏,谦词谢过,指天誓日,以明无他。是二者,意司马必不出此,亦不必出此。司马诚试思所说有虚者否?有不是者否?愿司马息心静气,一月不出门,将前劝读之《呻吟语》、《近思录》、《格言联璧》诸书,字字细看,事事引镜,勿谓天下人皆愚,勿谓天下人皆弱,脚踏实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祖令堂叔及尊公之令名,以副筱公之知遇,则一切吉祥善事随其后。此讯不照平日称谓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能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自当刺刺,听不听司马自酌之。

——《桂之华轩文集补遗·与张季直昆弟致袁慰廷函》

此信一开始即揭露了袁世凯辜负了吴长庆的重托,骄横跋扈,实在可笑至极。接着,逐一举出他十三个方面的错误:

一、营务处管事是普通职务,到处都有,而袁世凯任此职后开始骄横,很不应该。

二、对张謇称呼不断变化,开始称老师,称先生,后来称某翁、某兄,愈来愈狂妄自大,愈来愈对人不敬。

三、张謇在支应所管理钱物,袁世凯领取钱物,不办手续,不出领条。张謇要求他办好手续,而袁世凯竟痛骂:“何物支应所,敢尔诞妄?”信中责问他“诞妄者何在?”并且说,即使不论公事,张謇平时跟你交情如何,而居然摆出这副面孔,真是太可笑了。

四、袁世凯妄自尊大,自称“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总理营务处”,信中责问他,你是嫌职位小吗?那当时就不该接受任命。你想以此来欺骗朝鲜人吗?那么,朝鲜人是不可欺的。前些时,左宝贵妄称钦差钦命字样,遭到监察官的弹劾,你难道也要步左宝贵的后尘吗?

五、营务处不过五品官阶,对于部下镇将,对于下属州县当然可以用札(按指上级对下级的行文格式),对于上级,也用这种格式行文,实属乖谬。

六、不尊重朝鲜国王与官员,信中指责他“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怨沸”,真是不学无术。

七、袁世凯作威作福,擅用仪仗,信中指责他“居然乘舆张盖,制五色马旗,呵殿出入,平时建兵船黄龙大旗,不知自处何地?置孝亭何地?置国家体制于何地?”

八、吴长庆为了三世交情,特意赏识提拔袁世凯,并且说:“必不负吾,必不改吾章程。”而袁世凯却忘恩负义,诬蔑吴长庆贪污公款。信中指出,吴长庆不仅军费开支大,而且还津贴故人旧部。信中指出,他津贴你袁世凯,“动二三百四五百不等,即司马到营之始,仆役口粮,亦照差官发给,今恩谊所在略不顾,义利之辨略不省”。

九、袁世凯自矜家世,夸口说任营副区区何足奇,甚至说玷污先人。信中指责他,你的先人能考中进士、举人,你却连秀才都不是,这才是对你祖先最大的玷污。

十、刑法规定贩鸦片者诛,并禁止宿娼。而你却亲自参与贩卖鸦片。信中指责他,“司马所曾律以杀人刑人者,而烟膏鬻自三军府,则躬与之,不知何以对所杀所刑之人而无愧?”

十一、袁世凯所管,仅是朝鲜的军事。而袁却越俎代庖,去管朝鲜政事。信中指责他:“司马今日方谓,凭我一言,何事不办?以此自鸣得意,曾不顾有识之嗤于其后”。

十二、处理事情,前后矛盾。对从前极为不满的人,为什么现在又如此尊敬?

十三、茅少笙、纪雨农这两人,过去袁世凯曾揭发他们轻躁、贪鄙、贩货、挟妓,并且描述二人酗酒辱骂吴长庆的话,斥责他们丧心病狂,而现在你袁世凯跟两个人为什么又如此亲密?并且指出你袁世凯对吴长庆的议论,简直如出茅纪二人之口。

信的最后揭露袁世凯如此骄纵跋扈的根源是,“既恃家世,又谓二十许人作营务处副官,姓名见知于能办洋务之宰相,是旷古未有之事。”并指出他受周围恶劣小人的包围。并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你如果能从此洗心革面,认识错误,我们仍像从前那样待你;如仍执迷不悟,那就表示绝交了。

前人对这封绝交书评价很高。沈宝熙在《绝交书》墨迹后评论道:“重睹是书当无异读陈琳之檄矣。书辞咄咄逼人,深刻处类申、韩法家言。诚为一时名笔,可传也……”的确,朱铭盘的这封信写得既尖刻泼辣,又深沉有力,更可见朱铭盘文章的功力。《桂之华轩文集·诗集》前有章炳麟篆书题《朱曼君先生像赞》说:“海陵之彦,唯君阔步。训辞深厚,翰音飞翥……”而他与张謇、张謇又多么有先见之明啊!由此可见这三人都是见识超群的俊杰之士啊!

(通讯地址:南通市板桥南村东 8-104,手机:18951307511)

白水荡边悲逆旅 黄泥口畔辨真墓

——骆宾王墓真伪小考

李克东

目前已知的骆宾王(公元619年~?年)墓有两处,一处在骆宾王的家乡浙江义乌上枫塘,一处在江苏南通狼山。

这两处骆墓哪一处是真身墓葬,一直是史学界、文学界以至旅游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现在,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明晰的结论了呢?

《中国名胜词典》记载:“骆宾王墓,在浙江义乌县城东15公里枫塘。墓前石碑为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重建。”这恐怕是仅有的以确凿的口气肯定骆宾王墓所在的典籍。可是,我们也可以用确凿的口气肯定,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若说义乌骆墓是骆宾王的衣冠冢,那还可以;若说是骆宾王的真身墓葬,那是谬说。

义乌骆墓建于何时?何人所建?是真身墓葬还是衣冠冢,鄙人在此做一个粗略的考证。

据《骆氏宗谱》记载,骆宾王墓在明朝弘治年间和清朝乾隆年间经过了两次重修。但是,何时初建,又是何人所建,《骆氏宗谱》语焉不详。从《骆氏宗谱》记录明朝年间重修骆墓的文字来看,骆宾王墓初建时的规模是十分宏大的,非民间力量所能为。其中有一句话值得注意:墓园“八百年完整如故”。意思是从初建到这第一次重建,虽历经八百年,骆墓依然保持着完整而宏大的规模。若依此话,从明弘治年(1488~1505)往前推八百年,正好是武后称帝的后期。此时,对凡是参与扬州起义的人一直在严厉的追捕中,即使亲戚朋友也受牵连,被抓到也要砍头。骆氏家属四散奔逃作鸟兽散,绝无能力建那么大一个墓。那么是谁建造了骆墓呢?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的朝廷。

鄙人认为,“八百年”只是个约数,建造骆墓应该是在后武周时期。公元705年,82岁的武后退位。11月,武后去世。唐中宗李显复位后,立即为李敬业的祖父李世勣重修墓葬,实际上就是为李敬业平反。为李敬业平反,就不排除为骆宾王平反。按年龄推算,骆宾王当时年龄比武后还要大几岁,再加上日复一日担惊受怕,年复一年颠沛流离,此时早已作古;在武后的连年追捕下,骆宾王尸骨无存。为骆宾王平反的方法,就是在骆宾王的家乡为骆宾王修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墓园。

骆宾王是距义乌城东一里路的骆家塘村人（也有骆宾王祖上早年从骆家塘移居上枫塘的说法），为什么墓葬却建在远离老家三十里的上枫塘呢？惟一的解释是，建造骆墓的，非骆氏家族，而是朝廷。

朝廷建造的义乌骆墓中是没有骆宾王遗骨的，只是个衣冠冢而已。否则，骆宾王是如何去世、骆家族人是如何迎回骸骨、又是如何安葬的，《骆氏家谱》必定会大书特书，作详尽的记载。然而，这样的记载一点没有，就是明证。

1933年，自称骆宾王四十世孙的骆奉升在他所辑的《骆文忠公墓考》文集中，收录了从明朝到民国以来有关探寻骆宾王墓的文章。其中大多数人认为，南通黄泥口的骆墓应是真骨墓葬，而义乌上枫塘骆墓则是衣冠冢。即使是骆宾王的家乡人，也大多认为“本墓实在崇川（今南通）”。而义乌骆墓则是骆氏后人追思莫措，为衣冠冢以表不朽之举。

我们用排除法排除了浙江义乌骆墓真身墓葬的可能性，那么，是否就可以肯定南通狼山的骆墓是真身墓葬呢？当然不行。我们必须用史实来证明。

要证明南通狼山的骆墓是不是真身墓葬，先要论证一下骆宾王的死因。

骆宾王的死因，历史上有三种不同版本：

（一）“叛将诛杀”说。持此说的有《旧唐书·骆宾王传》、《资治通鉴》等。

（二）“投江溺毙”说。持此说的有《朝野僉载》等。

（三）“逃匿病故”说。持此说的有《骆宾王文集序》、《新唐书·骆宾王传》、《唐才子传》、《中国通史简编》，另外还有胡应麟《补唐书·骆侍御传》，吴之器《骆丞列传》，陈熙晋《续补唐书·骆侍御传》等，

第一说“叛将诛杀”说，据于《旧唐书》与《资治通鉴》所载。“乙丑，敬业至海陵界，阻风，其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骆宾王首来降。”李敬业为部将王那相斩杀，王那相带着 25 颗人头向武则天投降。鉴于骆宾王是这次兵变的要犯，又是讨武檄文的起草者，是朝野最注目的人物，骆宾王是死是活众人瞩目。王那相也许眼看着骆宾王等人投了江，即使没有死，为了邀功，胡乱拿颗人头假充献上。骆宾王仕途不畅，一直为下官，朝廷大员几乎没人认识他，容易蒙混过关。另外朝廷就算知道骆宾王逃亡，为消除政治影响，也会制造舆论，说骆宾王已被杀。所以这第一种说法，是当时官方的说法，其实并不可信。

第二说“投江溺毙”说，据于张鷟（zhuó）（唐朝小说家）的《朝野僉载》卷一：“明堂主簿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后与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水而死，此其讖也。”

张鷟作为与骆宾王同时代的人，比较能接近当时那场大战的史实，不排除有亲历者或道听途说者告诉他，骆宾王等投江，估计都淹死了。

然而，“讖”说只是附会，“投江水”也许是事实，“而死”就有点想当然。投江不一定是死，也可能逃生了。骆宾王是南方人，南方人十有八九会游泳。骆宾王十岁之前住在义乌老家骆家塘，村边就有一口大水塘，不远处是义乌江，骆宾王肯定会游泳，且熟谙水性。所以那天晚上投江，凭借自幼练就的水上功夫，加之又近靠江边，逃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第三说“逃匿病故”说,持此说的最为纷繁。唐郗(qiè)云卿撰《骆宾王文集序》:“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撰《新唐书》:“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元代辛文房撰《唐才子传》:“桴海而去”。范文澜撰《中国通史简编》:“兵败,骆宾王亡命逃窜,不知所终。”

其中,郗云卿的说法最为可取。中宗复位后,郗云卿奉诏搜辑骆宾王遗文。他既然奉皇命行事,应当对骆宾王的下落作过一番详细周密的调查。当时离扬州兵败只有二十二、三年时间,许多当事人尚在,人们的记忆犹新。郗云卿必然从中得到了可靠的线索,因而在《骆宾王文集序》中明确地提出了骆宾王“逃遁”的观点,肯定骆宾王“逃遁”,那就对此前王那相报送京师的所谓李敬业、李敬猷及骆宾王的头颅持完全否定态度,也就否定了此前官方“伏诛”的说法和当时流传的“投江水而死”的传闻。“逃遁”说自然也得到朝廷的认可,才可以在《骆宾王文集序》里堂而皇之地发布。

为何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说骆宾王被杀,宋代《资治通鉴》里也说骆宾王被杀而无视郗云卿的“逃遁”说呢?那可能是根据武则天当政时的官方记录整理出来的。《讨武曌檄》传遍全国,震惊朝野,影响极坏,骆宾王必须死。可以为之佐证的是,扬州兵败后,骆宾王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到底没有再出现过。所以,有唐一代,“诛杀”说一直没有改变。直到宋代,才有了松动,《新唐书》提出了与《资治通鉴》不同的观点:“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

那么,骆宾王“逃遁”后,又去了哪里,结局如何?

我手头有几则材料可以说明。

其一:在启东、崇明一带流传着一个“天后灯杆”的故事。说的是当年李敬业兄弟二人在扬州起兵讨武,武则天派大军从洛阳出发,直奔扬州镇压义兵。二李疏忽大意,被武则天派来的刺客暗杀了。义兵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不战而溃败。骆宾王化了装逃亡。武则天在攻下扬州后,派了很多人各地搜捕骆宾王。

传说当时武后的密探在海陵东部海上的白水荡发现一个貌似骆宾王的和尚。他们搜之未得,武则天知道后大发雷霆,下令增兵白水荡地域,日夜搜索。地方官安排在白水荡一带竖了很多木杆,上面高挂灯笼,用于夜间巡查。同时在东布洲(今吕四)、南布洲(今金沙)和顾俊沙(今崇明)都这样搞了起来。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抓不到骆宾王。武氏的兵丁只好夜夜派专人点灯燃烛,防止骆宾王出来活动。骆宾王到底没有抓到,而这灯杆却成了当时下海渔民夜间归航的航标。当时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些灯杆的用途,还以为是武后对渔民夜航的关心呢,因而称之为“天后灯杆”。在启东、崇明等地,有些地名干脆就叫“灯杆港”,这些地名至今还在。

在启海沙地还有一个“腌荠汤”的传说。相传沙地人爱喝的鲜美腌荠汤,源于唐代诗人骆宾王。当年,骆宾王等人讨武兵败,从扬州逃遁至吕四白水荡。为渡过难关,骆宾王就将生长于沙滩的野菜摊晒拌盐,装于坛中,制成“腌荠”。平时就用腌荠和海鲜烧汤,其鲜美胜过“陆海八珍”。骆宾王还喜欢用腌荠和米做羹,自谓“百岁羹”,笑言“清清腌荠汤,美味百岁羹”。几年后武则天废睿宗正式称帝,骆宾王自感处境艰险,便在吕四海神庙削发为僧。一日,长老询问骆宾王:你见多识广,可晓得

世间食物哪一种味道最美？骆宾王笑而应之：“物无定味，合口者珍。弟子以为腌荠之汤于我为最美！”长老开始还不以为然，待骆宾王下厨用腌荠和豆瓣做出汤来一尝，立即心服口服。从此，善男信女来海神庙烧香吃斋，长老总用腌荠豆瓣汤招待。于是，腌荠豆瓣汤就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沙地一种独具魅力的美味佳肴。至今沙地仍有一句俗话，叫做“三天不吃盐齏汤，脚骨郎里酥汪汪”。

这两个故事既可以作为第三说的佐证，也说明了当时骆宾王确实逃到了白水荡。

其二：《光绪通州直隶州志》记载：“白水荡在旧县，其地麋鹤萃藪，唐骆宾王遁迹于此”。

其三：据清代陈熙晋笺注的《骆临海集笺》（上海古籍出版社 P405）收录的李于涛（康熙十六年秀才）所作《骆宾王遗墓诗》的诗引中说：“涛固英公三十七世孙也。三十五世祖德慕公讳敬业者，起义扬州，讨武氏，不克，一时眷属逃窜几尽。三十四世祖尚菴公讳綱者，偕幕府骆宾王，匿邗之白水荡。久之，宾王客死崇川，尚菴公具衣冠以殓。黄泥一穴，公实卜之，表其墓曰：‘唐文人洛某之墓’。载之家乘最详。”

此文告诉我们，与骆宾王一起逃遁的，还有李敬业的儿子李綱。他们一开始躲在白水荡（今启东吕四一带）。“久之”，是说骆等在此生活了较长时间，后骆客死崇川（今南通）。“具衣冠以殓”，“具”字应作“置办”解。有人忽略了这个“具”字，硬说是“修了个衣冠冢”，就谬之甚远了。黄泥口的墓地，是李綱选定的。说“客死崇川”，又说埋在“黄泥一穴”，那么，黄泥口应当就在崇川。

其三：李素伯（原名李文达，字素伯，以字行。现代诗人、作家）在《海门耆旧传》一书的序文中写道：“余李姓，唐尚庵公于武氏之乱起义扬州，不克，偕骆宾王宵遁海上。中宗复辟，征赴阙。寻归，子孙隶海门。自后代有闻人，至达将二十余世。”

此文告诉我们，李敬业的儿子李綱也参加了扬州起义。“宵遁海上”，此说与李于涛“匿之白水荡”说并无二致，当时，李綱与骆宾王确实成了漏网之鱼。“征赴阙”：李綱受中宗征召，入朝觐见皇帝。由此可知，中宗为李敬业作了彻底平反。此时，李敬业、李敬猷已死，骆宾王也在贫病交加的逃亡途中客死崇川，而李綱还活着。“寻归，子孙隶海门”，不久回到故地，在南通、海门一带繁衍生息。

二李皆直言不讳，自称是唐尚庵公（李敬业之子李綱）的后裔。因为年代久远，又未见李于涛家谱实物，学术界对李于涛其人其文持怀疑态度。然而，李素伯其人其文是无可置疑的，李素伯是南通现代文化名人，李素伯的书画文章现藏于南通博物苑。

其四：明朝正德九年（公元 1514 年）发现了骆宾王墓。事情的经过，《万历通州志》卷八第二十六页作为“遗事”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写：“正德九年，曹某者凿靛池于城东黄泥口，忽得古墓题石，曰骆宾王之墓。启棺见一人，衣冠如新，少倾即灭。曹惊讶，随封以土，取其石而归。籍籍闻诸人，有欲觉之者，曹惧，乃碎其石。”

城东黄泥口，疑是南通城东南的黄泥山之误，或者就在黄泥山附近。

其五：王箴輿的《唐侍御骆宾王墓碑记》记载道：到清乾隆十三年，任职南通的福建人刘名芳居军山（军山就在黄泥山旁）编撰《南通州五山全志》，听到了二百年

前曹某在黄泥口得骆宾王古冢题石的故事,就到黄泥口搜寻,得两断石,上有“唐”及“骆”等字样。就地再挖了数尺,发现一些枯骨。刘名芳请示当时知府董权文,经同意后,把断石及枯骨移葬于狼山南麓。

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以整理出事件的大致轮廓。

公元 683 年,唐高宗病逝,中宗李显继位,武则天临朝称制。

公元 684 年初,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李旦做了傀儡皇帝,武则天大权独揽。

公元 684 年 9 月,骆宾王随李敬业在扬州起兵讨武,旬日之间,招兵十余万。武则天一面追夺李敬业祖上官爵,改回原姓徐氏,并对已经死去的李勣掘墓刨棺;一面命左钤卫大将军李孝逸将兵三十万讨之。

公元 684 年 11 月,起义军与朝廷军队决战于扬州下阿溪,全军溃败。这天晚上,骆宾王与徐敬业等人连夜逃奔润州(今镇江),然后乘船往东,准备入海投高丽。途中遇大风,木船无法东行,徐敬业一行“停舟山畔”。注意,这“山畔”是何山之畔,历来无人追究。从润州往下,长江两岸一马平川,唯有狼山五山。那时的狼山还在长江里,不过在逐渐靠近北岸。据俞继堂《狼山风光》载:“宋朝初年,五山还在江中……狼山登陆在宋咸平、天圣年间(1001—1031)。最后登陆的是军山,时间在清康熙末年。”因为狼山在一步步向北岸登陆,北泓的水域自然相对狭窄,便于泅渡。也只有在“狼山之畔”,才能和狼山东北方向的“白水荡”衔接得上。此时将士哗变,李敬业、李敬猷等被部下王那相杀死,骆宾王与李敬业的儿子李綱等人投水,一些人淹死,骆宾王与李綱逃脱。上岸后,二人往东北方向一路狂奔,最后“亡命于邗之白水荡”(今启东吕四一带)。

公元 690 年,武则天改唐为周,自称大周皇帝。她任用酷吏,先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又杀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的不可胜数,腥风血雨,人人自危。

公元 705 年,宰相张柬之等发动宫廷政变,逼武后退位。中宗李显复位,改周为唐。11 月,武后去世。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与高宗合葬乾陵。后中宗下令重修李勣墓,恢复徐氏李姓。又下令在浙江义乌建骆宾王墓。同年,征召李敬业之子李綱,李綱入朝觐见皇帝。此前,惊魂不定,贫病交加的骆宾王去世,李綱把他葬在黄泥口。入朝见了皇帝后不久,李綱就回到故地,整修黄泥口骆墓,并立了碑。

公元 1514 年(明武宗正德九年),曹某于黄泥口掘得骆墓及碑石。

公元 1748 年(清乾隆十三年),刘名芳到黄泥口搜寻,掘得有“唐”及“骆”等字样的残碑以及一些枯骨,确认为骆宾王墓葬。经当时通州知府董权文同意,刘名芳把断石及枯骨移葬于狼山南麓。

诗曰:白水荡边悲逆旅,黄泥口畔辨真墓。一代诗文称大家,从此长眠狼山麓。

清明时节,再游狼山,翘首南天,极目远眺,但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如血的残阳渐行渐远,骆宾王的故事也已远去。然而,伟大历史人物的文化与精神遗存,必将永远存活于后人的集体记忆里,同时以其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文景观昭示于人间,激励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作者为启东职教中心退休语文教师。通讯地址:江苏省启东工商银行宋萍转)

张菊生书李村墓表

——研究南通乡贤李云良的一份重要史料

一 婷

笔者有幸从友人处看到一本线装装订的《张菊生书李村墓表》，中华民国三十七（19叶恭绰 48）年十二月初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此书的题签者和撰稿人是书画家、佛学家和收藏家叶恭绰先生，抄录者为出版家张菊生（商务创办人张元济）。“李村”就是指南通唐家闸镇的李家桥。唐家闸是“南通模式民族工业”发源地，此镇李家也为发展近代南通实业作出了许多贡献，其中最出名者要数李云良先生。

据南通档案馆信息网在 2010 年刊布的快讯《档案为编写〈百年大生第一镇——唐家闸〉提供素材》，南通档案馆藏有“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南通县党员李云良申请登记表”，上面提供了李云良先生的简历。姜平先生正是根据这份登记表在《李村小筑》一文记有“李云良（1906—1950），李村小筑主人，地方著名人士，曾任大生纺织公司常驻监察、敬孺中学董事，并历任交通大学和中国公学教授、中国招商局局长和国民党中央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详文可见 2010 年 12 月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家闸》）。关于李家的历史，《李村小筑》和《南通市志》均未有详细记载。

《张菊生书李村墓表》由张菊生、叶恭绰两位名人合著，并由商务印书馆精印而成，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但是笔者最看重的是此书的地方文献价值。《张菊生书李村墓表》虽是李村墓文，但却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唐家闸的李云良家史，是研究南通乡贤李云良的重要史料。

笔者将《张菊生书李村墓表》重新整理爬梳，将其相关史料整理如下：第一，民国时期唐家闸李家主要家庭成员的历史生平。李云良的父亲名为李宏琦，生于咸丰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因病死于民国元年七月。李家世代为农，李宏琦幼时勤奋学习，长大后致力于经商，重信义，有侠气，所获钱财均用于助人，为同里所尊重。李云良的母亲太夫人沈氏生于同治四年四月初八日，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仙逝，后与李宏琦合葬于李村墓园。李云程是李云良的大哥，子承父业，扬名商海，但不幸于民国二十九年逝世，时年约 53 岁。李云良自幼聪明，成绩优异，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学士和硕士学位，“从政宦游各地所至有声而于航业财政实业诸端靖献尤多”。李宏琦还有一位女儿李玲珍。

第二,李云良造福乡里的具体活动。他不但热情于地方文化教育的普及工作,先后创办了唐闸生活学校、唐闸图书馆和唐闸大会堂;而且注重发展唐家闸的基础设施。在这些活动中,李云良先生往往直接参与,贡献良多。李云良曾为唐闸图书馆题写“唐闸图书馆藏书”,鼓励乡人爱书读书,但缘于不善书法,他还请同学和同乡顾鼎和代笔(可见南通书法网《墨观·顾鼎和》);他捐钱在唐闸筑桥修路,并亲自督工。

第三,李云良热衷发展地方经济和地方文化的原因。《李村小筑》有记:“李云良先生追崇效法张謇先生,致力于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毋庸置疑,张謇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实业家,是南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第一功臣。南通许多乡贤都受到了他的影响。李云良先生自然也不例外;但是李先生致力地方公益最直接的原因恐怕是受他父母的影响。

首先唐家闸李家有帮助乡人的传统。李云良的父亲李宏琦有菩萨心肠,非常乐于帮助乡人。他曾因帮人而举债,邻里有急难之事相求,他都会答应;有人有言语纠纷,只要有他来调节,都会和好。太夫人沈氏曾对李云良说:“你父亲在世的时候,乐善好施;所以他死的时候,家里无钱可余……你不要忘记你的祖德。”其次是李家的孝道。李云良少年失父,由沈氏抚养成人;因此他十分孝顺母亲,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正如前文所述,沈氏十分鼓励李云良学习他的父亲,发展家乡公益事业。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李村小筑的建造史。《李村小筑》一文曾记:“李村小筑是李云良先生为庆贺其母 80 诞辰而修,建于 1946 年春”。殊不知,太夫人沈氏 70 生辰也就是早在 1935 年,李云良就以提议为母亲修建李村小筑,供沈氏颐养天年。此举遭到沈氏否定,她觉得“造屋事奉她一人不如移资乡间教育事业造福一乡”。于是从次年(1936 年)开始,李云良连二接三的创办了唐闸生活学校、唐闸图书馆和唐闸大会堂。江海大地,孝道昌盛,不少地方名人,因为爱父母,而爱家乡,从而关注家乡的发展。

沈氏太夫人李云良母子致力发展地方事业的事迹使得笔者想起了如皋王岸佛李昌钰母子爱乡的故事。李昌钰博士是国际知名的刑侦专家。他的母亲王岸佛客居他乡多年,但从未忘记故乡,曾经捐款修建了如皋师范附属小学运动场。在她的影响下,李昌钰博士也关心家乡如皋的发展。

百善孝为先。正因为“孝”,李云良热情于乡间公益,并且恳请张菊生叶恭绰合写了《张菊生书李村墓表》,为后人留下了研究南通唐家闸李村家史的第一手资料。

(通讯地址:如皋市如皋中学英语组)

海门民间文艺一览

盛永康

追溯起来,海门民间文艺源远流长、经久不衰。早先,海门由于屡遇风潮,人民难以安居乐业,无奈之下将命运寄托神灵,于是祭神活动相随而来并萌生了原始的傩舞与傩戏。余东于明代洪武年间建有城隍庙戏台,以供演戏谢神。明末清初,海门民间书画得以传播,出现了著名书画家程源、张光监、李潜昭等,尤以“外八怪”著称的个道人丁有煜最突出。清代中叶,江南吴地等大批移民来海,民间文艺日益活跃,海门山歌与通东民歌广泛流行。光绪三十三年,六甲诞生了海门第一个京剧班张洪福京剧班;沙地还首创了民间曲艺“阳签书”,海门民间文艺得以茁壮成长。

民间舞蹈

清代中叶,海门祭神娱乐的民间舞蹈不断丰富起来,如“跳财神”、“踏高跷”、“跑五方”等民间舞蹈流行于各地庙会和喜庆活动之中。“跑五方”原是海门本土祭祀习俗“放施食”的一种仪式,常在丧事等活动中,于殡葬前夜开始,直至次日午后结束。而后的“三七”、“五七”、“六七”、“七七”都举行这种“放施食”仪式;富户还在死者周年、冥寿也举行这种“跑五方”之舞。舞者头戴珍珠装饰材料制成的花帽,身穿红色、黄色服饰,服饰上绣着龙凤、花鸟之类的图案。常用乐器有大小锣鼓、二胡、唢呐、笛子等。演奏乐曲有“四句头”、“寿上星”、“大开门”、“小开门”、“劝君杯”、“过街心”等。

所谓“跑五方”原先是这样的:将五张桌子分别置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桌上分别写着金、木、水、火、土五个大字,奉请东方青灵、南方丹灵、西方皓灵、北方玄灵、中方黄灵五方“童子”,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地手舞足蹈一番,动态地召请鬼魂前来受施。表演“跑五方”时,由领舞决定所舞的“阵图”(指三角阵、四角阵、五角阵、月里偷桃、荷叶包蟹、狮子还桩六个阵图),按传统的“四穿结”编队方式变换阵图,蹦蹦跳跳、翩翩起舞,一招一式武技熟练,穿插队形首尾相顾,节奏分明、有张有弛,直至舞到高潮像“旋风”(俗称鬼头风)一样,以此热闹情景吸引鬼魂前来受施,而且吸引民众围观。

海门民间舞蹈“跑五方”,沿袭至今逾越了七百多年的悠久历史。如今,四甲镇路西村的陶冠洪,是个远近闻名的“跑五方”陶家班子第五代传承人,从艺七十余年,还带有众多徒弟。此陶家班子的传人陶旭展等人,均有宝贵实物留存并还在继

续使用。海门狮山路的姜明田老先生,珍藏着“跑五方”的难得资料约六千多字、照片五十五张、录音两小时三十多分钟。

那时,还出现了个名曰“踏高跷”的海门特色民间舞蹈,平时较为少见,适逢过年过节与庙会期间才能看到。“踏高跷”看似平常,实属一种难度较大的民间舞蹈。它分高跷、中跷与低跷(跑跷)三种,最高的达到三米多,最低的0.7米左右,多数为一米多高。它的表演有群舞和双人舞以及独舞。领舞者称“头跷”,需有高超的技艺才能担纲,除了引领队形的变换外,还要擅长独舞,穿插于队列之间舞动各种主角。群舞者分别担当生、旦、净、末、丑等角色。

1949年的一日,为庆祝海门全境解放,一游行队伍中出现了好几支高跷队,表演“都天出巡”(即出会)、“温元帅出巡”等节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扮演那八仙的一支高跷队了,汉钟离、张果老、吕洞宾、何仙姑等饰演得格外惟妙惟肖,铁拐李身背葫芦、手撑拐杖、独脚翻滚腾挪的舞姿令人拍手叫绝。韩湘子的一支云笛、曹国舅的一对笏板,敲击念唱吹等亦有非凡表演。还有两支中跷队的技艺堪称一流,一支表演《白蛇传》中许仙、白娘子、小青的形象,小生的风雅、青衣的婀娜、武旦的飒爽英姿可谓拿手绝活;另一支表演《西游记》中的唐僧,一副阿弥陀佛的样子,孙悟空抓耳挠腮猴相逼真,沙和尚憨厚老实,尤其是猪八戒挺胸凸肚咧嘴大耳的扮相,加上其丑态百出的逗人表演,观者无不为之捧腹大笑。还有,三四支跑跷队饰演的贪官、师爷、公主、小姐、书童、丫鬟、渔翁、蚌壳精等形象,可谓栩栩如生——诸如此类的“踏高跷”民间舞,将欢庆活动一浪接一浪地推向高潮。

民间曲艺

清代光绪年间,海门的民间唱书艺人,在沙地的民间小调、山歌及民歌等基础上,独创了采用沙地话说唱的“阳签书”形式,将此唱腔贯穿于长篇故事之中。这些沙地唱书艺人,左手拿着一只响铜制的钹子,右手执着一根竹签,以竹签击敲钹子作为伴奏,唱时停击,一句唱完即有声有色地敲击起来,唱、击有序,板眼分明。钹子是圆形的,酷似太阳,加上竹签敲击为书艺伴奏,故得名“阳签书”。当年的这种“阳签书”,广泛流传于海门、启东、崇明、如东、南通、大丰、射阳等流行沙地话的地区。演唱的长篇传统书目有“呼家将”、“双珠凤”、“珍珠塔”、“青龙传”等。值得一提的是,唱那“阳签书”的民间艺人,善于运用自身独特的唱腔发挥创造,经长期实践,逐渐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流派,流传至今。演唱时,只需一只钹子、一根竹签、一把扇子、一块醒木、一身上衫、一人上台即可闯荡江湖、随时随地演出了。可见“阳签书”的适应性特强,既轻便又灵活,大至广场或大剧场,小至茶馆或街头巷尾,皆留下了“阳签书”民间艺人的足迹。曾记得,我在童年时,放学回家就急着蹦蹦跳跳赶往长兴茶馆书场,津津有味地听“阳签书”,书目“三门街”中刘士春等的人物形象,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想当年,海门评弹团团团长蔡翠萍、唱做念都相当高明的评弹艺人潘德祥等,他们从小拜倪省三、李承山等名家为师,包括学唱“阳签书”在内,数十年如一日,成就卓著,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还培养了众多优秀接班人,有人至今还活跃在民间文艺舞台上。海门文广新局的江淑华女士,仍然好好地保留着万言的“阳签书”等文字资

料,潘德祥还珍藏着“阳签书”等录音资料。

民间游艺

海门山歌的传统曲调“闹元宵”中,开头部分十分闹猛地唱着“正月十五闹元宵,家家户户挂红灯……”

旧时沙地的元宵节,孩子们提着七禽六畜图案和各种形状的花灯,总是花灯队伍快乐的尾巴。排头灯、狮子、旱船、花灯被人流挟裹着,从四邻八舍流向南村北埭。擎排头灯的彪形大汉,脸上涂了黑红的油彩,右手擎灯,左手持棍,是位高大威猛、武艺高强的农夫。旱船中的花旦,唱起悠扬缠绵的山歌,让冬夜变得十分温馨。家家户户敞开大门,等待威风的狮子进屋降妖驱魔。接灯人家已准备好彩礼:香烟、糕点、果糖、鞭炮,富户常将一匹红绸缎悬挂梁上。如果是两班花灯偶尔同时进门,两位舞绣球者,就有了一番“明争暗斗”,胜者纵身跃上方桌,腾身而起,披红挂彩。

还有毗邻的两个村子同时出灯,双方领班会有讨价还价划定地界。倘若狭路相逢,只好勇者胜。因此,擎排头灯者必须有一身好功夫和腱子肌,同时他又是舞绣球的高手,一般人舞绣球伸胳膊蹬腿,而他手持绣球打的可是正宗南拳,取得梁上红绸的矫健身姿,并不亚于篮球明星的精彩扣篮。那一夜,他成了姑娘们的梦中情人,她们含蓄的目光会像膏药般贴在他身上。

家家户户的门楼上,左右都挂有红灯。小镇街头巷尾,每一条花廊,每一棵大树,都牵牵连连地缀上花灯,走在大街上,说不清是人比花灯多,还是花灯比人多。

沙地过正月半,人们还一边观灯,一边猜灯谜,相得益彰,妙趣横生。自宋代起,人们将谜面写在丝绢糊的灯笼上,“灯谜”即源于此。猜灯谜的内容,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关爱情方面的。

还有,每逢正月半下午,沙地人家以芦苇、茅草等扎成碗口粗的长草把,日落夜幕降临,人们纷纷将草把点燃,高举挥舞,沿着自家耕作的田埂奔跑,口中高喊:“田财田财,大家发财……”遍地似火龙游走,场景热烈。这“照田财”的游艺,直至月亮升高后才结束。这源于沙地农民驱虫赶兽之需要,并演变为祈求丰稔、希冀富裕的一种游艺形式。

山歌与乐器

明代探花崔桐在修海门县志时有诗道:“山歌悠咽闻清昼,芦笛高低吹暮烟”,如实反映了当时海门的民间山歌与自制的海门芦笛已盛行于民间。

芦笛是海门民间艺人创制的独特器乐。那么极其普通的一段芦苇,打通芦节,挖上几个孔,贴上块薄薄的笛膜(芦衣),吹奏时,凭气息的控制,舌头的翻卷,口风的大小,嘴劲的松紧,手指的滑动,让乐曲随心所欲,变化多端。既有柔情似水的山歌韵律,又有古风浓郁的“三六板”、“老老板”,千般思绪,万种情怀,皆可蓄于盈尺的芦笛中,令人烦心顿解,万虑齐除。但很可惜,民间芦笛盛极一时而走上了自生自灭之路。

“山歌悠咽闻清昼”,说明民间山歌(包括海门山歌在内)在早年就口口相传、代代流传了。尤其是1935年管剑阁、丁仲皋将搜集的海门山歌整理成“江口情歌”,在上海辑成专集,标志着海门山歌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顶点。而改革开放之后的“市

首届山歌会唱”更加值得回眸。

那是 1985 年 8 月,“市首届山歌会唱”举办,50 多名歌手演唱山歌 40 余首,《光明日报》、《新华日报》等先后作了报道和评论。事前,首先抽调陆行白、梁学平、汤炳枢以及本人等组成创作班子,在一段时间内创作出相当多的新作,为山歌会唱作了充分的前期准备。曾记得,本人是由市总工会从市液压件厂借出来的,安排于人武部招待所食宿。那时,同舍住着一位总政歌舞团的创作者(他到手帕厂军人家庭服务中心采风),我趁机与他聊起山歌会唱之事,请他为我的新作指点迷津,使我受益匪浅。在创作就绪的基础上,组建三个代表队(山歌剧团、文化宫、文化馆),将创新和挖掘的各种山歌(独唱、对唱及联唱等)专门进行排练,然后在人民剧场、工人文化宫等娱乐场所,开展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演唱活动。最后,由专家与群众相结合评出一、二、三等奖,为发展山歌事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次荣获一等奖的是“小平同志听仔喜盈盈”。那时,我有幸又一次与陆行白(中国民间文艺家)亲密合作,他作词,我谱曲,歌词中唱道:“你看我现在是:缸里满,瓮里剩,高楼房,澄光新,四季衣,着勿尽,鸡鹅鸭,一大群,电视天线透天心,出门新车响铃铃,新打家具照见人,银行里有钞票存。只要政策勿变一直走仔这条致富路,朝后个日子更称心,好比平地造屋,屋上搭楼,楼上砌塔,塔上穿梯,一层更要高一层!”多姿多彩的叠句特色,既发挥了山歌传统风格,又富有强烈的时代精神。

民间文艺是人的社会活动的历史积淀,是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之一。民间文艺作为百花园中一奇葩,很值得文艺工作者去深入挖掘,让它发扬光大。

(感谢邹仁岳先生、李茂富先生等为本文提供了宝贵资料。)

(通讯地址:海门市平山长兴镇老街)

如皋两支杨氏的血脉与文脉

秦镜泽 潘 健

1999年春,时任白蒲镇人大主席的杨春和同志,将他家收藏了160多年的《杨氏家谱》进行了续修。2002年9月,龙舌老乡杨浙舟先生将该谱复印了两本赠送笔者,一本转赠如皋市档案馆收藏,一本留作自己研读。2013年9月初,杨春和先生借给笔者一部搬经影印本《杨氏族谱》。最近,笔者对这两种杨氏谱牒进行了细读和深究,从中得知,白蒲杨氏和搬经杨氏的祖籍都在苏州阊门,两支始迁祖原本是出生在苏州的叔伯兄弟,其受姓始祖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中大夫杨伯侨。兹就两种谱牒的有关记载试作如下解读。

同祖同宗 血脉相连

清光绪十二年(1886),搬经《杨氏族谱·重修族谱序》云:“明季苏之庆远公兄弟三人,言之公其仲也,长庆伯公留于苏,其后东溪公自苏迁如邑之白蒲镇,遂占皋籍焉。公偕其季弟庆余公由苏迁海陵,留弟居海陵之东隅,公自海陵复转迁如邑之陵上而家焉。”上述引文的大意以及笔者考证的实际情况是:明代洪武初年,苏州阊门有杨氏兄弟三人,老大叫庆伯,其子东溪迁居如皋县白蒲镇;老二庆远之子开宗、老三庆余之子德进迁居海陵(今泰兴县)。后来,老三庆余之子德进留居海陵,老二庆远之子开宗转迁到如皋之西的陵上(今搬经镇林上村)定居。

白蒲《杨氏家谱》:第一世 始祖东溪公,长洲县廩生,自前明洪武年间,公避乱,由苏州阊门迁于如皋白蒲镇之东乡居焉,距镇25里,今其地名杨家园,有桥名杨家桥。配吴氏,生二子:嵩山、荷山。

搬经《杨氏族谱》:第一世 开宗(庆远公裔),配朱氏,生一子:吉成。秀水居士《开宗公像赞》曰:“公笃志诗书,不求闻达,守一经以教子,功不至于怠荒。视富贵如浮云,人尽指为迂阔。所以,超然于名利之外,而终不与同流合污者等也。”

白蒲杨氏和搬经杨氏为同一个受姓始祖。道光十一年(1831),泰兴县廩膳生苏筠在搬经《杨氏族谱序》中曰:“杨氏之族何自昉乎?考周成王弟叔虞其后嗣伯侨封杨侯,因以杨为氏,是姬姓也。”史书记载,杨姓是出自西周公族的姓氏,周成王(公元前1115—前1079年在位)封弟弟叔虞于唐。唐叔虞的儿子燹继位后,因唐地有晋水,就改称晋侯。燹的第十世孙晋武公封次子伯侨于杨,称杨侯。杨伯侨,又名文

实,姓姬,周襄王姬郑元年(公元前 651 年)任中大夫,五年(公元前 647 年)王念其先人功勋,敕封于杨邑(今山西洪洞县东南),称杨侯,救命杨侯太祖,卒谥贤敬,被后世尊为杨氏受姓始祖,史称杨氏正宗。配于氏,封一品敬贤夫人,生三子:逊、近、述。随着时代的推移和时局的变迁,杨伯侨的子孙后代,有的自山西洪洞迁徙到江苏和安徽省境内,散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苏州阊门的杨氏则源出于此。

因杨而名 源远流长

地名,作为表称地点和历史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是地域文化的品牌,亦是刻在人们心灵的碑石。白蒲与搬经两镇以杨氏而得名的地名、桥名以及与此相关的村名、墓名,记述了两镇杨氏的迁徙史和发展史。明代万历年《如皋县志》、1983 年《如皋县地名录》,均载有白蒲与搬经两镇以杨字命名的地名、桥名及村名。

白蒲镇辖区内以杨字命名的有东杨家园、西杨家园、大杨家庄、小杨家庄、杨木桥、杨北桥、杨家桥、杨家坝、杨家码头等,其杨家园之地名,至今已有 600 余年,今有杨家园村。此外,还有“杨将军墓”。相传,明正德年间(1506—1521),白蒲东乡杨姓人家曾出了一名武官,任都指挥同知,掌一方之军政,诰授武功将军。去世后,其子将他的灵柩运回故里,安葬在白蒲之东,碑曰:“杨将军墓”,其墓地周围后来成为草荡。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如皋县志·古迹》载:“杨将军墓,在白蒲镇东荡中。东荡中旧有杨将军墓,跛牂牧其上而鼓掌,则其中隐隐若相应者,天阴雨露则远近闻鼓吹声。今已夷为平陆矣,其异亦息。”道光《如皋县志·艺文》,载有仪征举人、如皋安定书院山长吴铠《东皋咏古·杨将军墓》的诗:

落日荒原衰草平,将军墓上碧纵横。
无碑那辨秦何代,有姓奚嫌霍不名。
在昔弓刀留胜烈,至今铙鼓发遗声。
绝怜赌墅今银子,都付农人雨后耕。

搬经镇辖区内因杨姓而得名的有南杨家岱、北杨家岱、大杨庄、小杨庄、杨家控、陵上,因杨而得名的“陵上”之名至今已有 600 年,今有林上村。林上,本为陵上,是因杨氏始迁祖杨开宗于明初从海陵(泰兴)迁此定居后而得名。清道光十一年(1831),泰兴县廪生苏筠在《杨氏族谱序》中写道:“余居延令^①之东邑接雒水之西隅,尝游其地,有名零(陵)上者,远则飞虹桥于东南插岳寺西北,近则屋舍参差有良田、美池、桑属,自有明之季杨氏庆远公(应为其子开宗)从海陵(泰兴)择夹埧早卜宅于兹而家焉。”咸丰十年(1860),泰兴邑庠生^②鲍世齐在《杨氏重修族谱序》中亦曰:“吾亲杨氏半溪翁、半江翁^③居雒水之西、延令之东,号曰‘零(陵)上’,村则曲水滌洄,宅则茂林环绕,亦胜地也。”光绪十二年(1886),杨氏十三世祖杨锡纯^④在一篇文章中,对“陵上”的来历及其含义专门作了阐述:“予之旧居地名‘陵上’本陵为陵……吾祖庆远公(应为其子开宗)从海陵(泰兴)卜宅于此,相其形势高上,再俾子孙不忘海陵之故址,故名此里曰‘陵上’。”

注:1、延令 泰兴县的别称,旧时县治曾驻延令村。

2、邑庠生 科举制度中府、州、县学生员的别称。庠是古代学校之名。

3、半溪翁 讳逢春(1820—1861),号鹏程,《杨氏族谱》载有《半溪翁赞》。半

江翁,讳冠春(1822—1866),号抡选,《杨氏族谱》有《半江翁赞》。

4、杨锡纯(1819—1896),号玉润,字寿山,从九品,任光绪十二年《杨氏族谱》监修,撰有《重修族谱序》。《杨氏族谱》载有《寿山君赞》。

尊儒重教 文脉相通

儒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千多年来,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都有过极其深远的影响。白蒲杨氏和搬经杨氏,都是耕读世家书香门第,历祖历宗均尊儒重教,十分重视用孔孟之学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培养。

1、用家训之言警示宗族。杨氏《家训十则》第五条:“严教子。读书明理非博士荣,积学待时岂逃人爵。凡有父兄之责者,必延名师益友俾子弟朝夕渐摩学问精进,遇则掇科取第,不遇亦不失为学博。然须因才造就,有不能读者,即令之耕;不能农者,即令之商贾技艺,各执一业皆可资生。切不可听其游荡过日妄想非分,违者定行责罚。”

2、以门联典故激励家人。杨氏门联:才称敏捷、世济经纶。上联典出汉末文学家杨修。杨修(175—209),字德祖,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累世显贵,好学能文,才思敏捷,有智有谋,曾任三国魏武帝曹操主簿,曹操之子曹植引他为羽翼,交往甚密。下联典出明代政治家、文学家杨士奇。杨士奇(1366—1444),名寓,号东里,明江西泰和人,曾在湖广各地做塾师多年。建文初被荐入翰林,充编纂官,历官礼部侍郎、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内阁,长期辅政。与文渊阁大学士杨荣、武英殿大学士杨溥并称“三杨”。著有《东里全集》、《文渊阁书目》、《历代名臣奏议》等。

3、拜著名儒师教导子孙。杨氏之家族,宁愿自己省吃俭用,节衣缩食,而不惜重金让子孙投拜名师宿儒,培养成才。白蒲杨氏九世祖杨近宸,字廷相,国学生,将其四个儿子送至白蒲著名学塾“海粟精庐”^①读书学习深造,拜吴廷瑞为师。吴廷瑞(1758—1827),字晋臣,号玉田,廪贡生,候选训导,幼承家学,具有渊源,书法山谷、诗宗初唐。家素贫,以教授为业,邑中有成就者必公弟子,如沈岱,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举人,官建平县教谕;沈歧,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皆出其门。经塾师教导,杨近宸的四个儿子均学有成就,长子杨药坪,字芷林,邑增生^②,议叙授八品衔,工书法;次子杨焜,字晖如,国学生,例赠征仕郎;三子杨炘,字蓉仙,邑增生;四字杨勋,字筱塘,邑庠生。其中杨炘因品学兼优,深得吴廷瑞厚爱,将他择为佳婿,把独生女许配给他。

据《杨氏家谱》记载,明清时期,白蒲杨氏共出庠生11人、增生3人、廪生2人、贡生^③2人、举人^④2人、副举人^⑤1人。第十世杨药坪,祖孙四代在学业上最为兴盛。杨药坪本人,邑增生,议叙八品衔,其事迹载同治《如皋县志》义行传。子三:长子嗣宗,增生;次子承宗,国学生^⑥,拣选知县;三子景宗,国学生。孙六:其中三孙安治,举人;四孙寅治,国学生;五孙学简,国学生。曾孙五:其中三曾孙崇谦,庠生,如皋师范传习所毕业;四曾孙福谦,如皋师范简易科毕业。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杨药坪的三孙杨安治,他是清同治九年(1870)举人,少年丧父,既孝敬寡母,又苦学成才,终身以

办学为业,教书育人。民国《如皋县志·孝友》载(摘要):杨安治(1836—1908),字磐石,号纯仁,居白蒲,少丧父哀毁如成人几灭性。母沈疾,刲左股作羹进;不愈,刲右股,祷于神:愿减年益母寿,遂得痊。然,母痼疾不时发,发则号泣,绕床侧誓不独存,卧起、饮食、便溺皆躬亲扶抱。家贫甚,尝绝粒不得举火,弟妹相向泣,安治怡然,侍母侧,读书声不辍。年三十余始补县学生,同治庚午举于乡。家居授生徒,资修脯养母,常手筐入市购时物以饫饌,夜侍母,俟睡熟及寝。母偶往宗戚里党家,必亲走迎归。母中岁遭寒疾长卧床蓐,安治忧惧不知所为,夜刺血表奏北辰,又刲肱肉和药疗之,母时年七十余矣。晚岁,馆于如城中因家焉,布衣儒官,不问世事。官吏登庐数请谒,偶一接之,足迹不入官署也。性喜购书,潜心经史,尤邃于《易》,以洗心录为明心之学,终身诵之,颜所居之室曰:“惩室轩”。年七十有三卒,门人私谥“孝诚先生”。著有《易说》。新中国成立后,白蒲杨氏出了一位著名教授:十五世杨应弼,1936年生,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1958年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1963年毕业后就职于南京邮电学院(今南京邮电大学),先后发表论文20篇,曾担任江苏省教委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数学组评委,1993年被评为教授,1994年荣获国家邮电部授予的全国邮电系统优秀教师称号。

搬经《杨氏族谱》记载,明清两代,搬经杨氏共出席生3人,国学生8人。明朝杨泰祖孙三人皆庠生:杨泰,讳国柱,庠生,生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卒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在年71岁,《族谱》载有泰公遗像及《赞》:“公学问深醇,德行坚固,补博士弟子员,有宽厚长者度,在昔声名四布,既足为乡闾族党之光。于今思念其人,犹想见文采风流之素,公诚杨氏之伟人也,岂非曩日之君欤!”其子杨章,讳文华,邑庠生;曾孙杨珠,讳万泉,邑庠生。清代杨廷桢立志培养子孙得科名。杨廷桢(1812—1896),号擎夫,七岁丧父,靠寡母陆氏抚育成人,因家境贫寒,无钱入学读书,长大后靠耕种农田、开木行做生意兴家立业,发财致富。他感叹地说:“吾早岁失学窃引为耻,吾必令吾子孙出就名师。”他与妻子袁氏省吃俭用,一心一意培养儿孙读书成才,特聘请著名儒师至家中教导子孙。长子凤嶺,字高峰,号黼卿,业儒,考名授章,国学生;次子华嶺,号小山,国学生;长孙云鹏,试名启元,国学生;次孙云鹄,字琴堂,国学生;三孙云鹤,字健侯,章氏学堂毕业生。曾孙长荣,国学生。十四世杨汝霖(1841—1902),字雨卿,国学生,偕妻张氏于清同治年间从搬经零上(今林上村)迁徙到海安县古庄(今海安镇城港村8组)定居,其曾孙杨盛明夫妇是当代的杰出人才。杨盛明,笔名亮甫,1942年出生,北京轻工业学院本科毕业,1968年12月参加工作,197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福建省南平市政府办公室干事、秘书,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副处长、处长、副主任,福建省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福建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其爱人金昕,1948年出生,上海市人,福州大学土建系研究生毕业,1976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福州大学副教授,福建省工程建设监理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业务经理、法定代表人等职。

注:1、海粟精庐 位于白蒲秀才巷吴家高大门内,门前有联云:“盘根梅里貽安宅,奕叶芸香冠世家。”厅堂内有本宅科第题名匾28人。

2、增生 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明代生员皆有月米,额内者为廩膳生员,

增额者为增广生员。清代则生员于岁科两试在一等前列者,方能补为增生或廪生。廪生有廪米有职责,而增生无之,故增生地位次于廪生。

3、贡生 科举制度中,生员(秀才)一般是隶属于本府、州、县学的,若考选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则不再是本府、州、县学的生员,而称为贡生。意思是以人才贡献给皇帝。清代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和例贡之别。

4、举人 唐制为各地乡贡入京应试之通称,意即应举之人。明清则为乡试(省级)考中者之专称,作为一种出身资格。考中举人就取得了做官资格。举人若会试三科不中进士,可以到吏部注册,取得任国子监丞、翰林院侍诏、知县、直隶州州同等资格。

5、副举人 又称副榜。科举考试中的一种附加榜示,亦称备榜,即于录取正卷外,另取若干名之意。乡试备榜始于元代。清代每正榜五名取中一名,名为副举,不能与举人同赴京师会试,但下一科仍可应乡试。

6、国学生 又称太学生,指在国子监读书的生员,亦是最高级的生员。明清时太学即国子监的俗称。国子监是古代最高学府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学生多由省、府、州、县生员中选拔,亦有捐纳而得者。入监就学者有贡生、监生之分,然通称为国子监生,国子监隶礼部,光绪三十一年(1905)撤。

恩赐粟帛 福寿临门

唐朝诗人李白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诗句,是对古代社会高龄老人现象的真实写照。白蒲《杨氏家谱》、搬经《杨氏族谱》中都有“恩赐粟帛”的记载,所谓恩赐粟帛,是明清时期以皇帝的名义赠送给七十岁以上老人的物品,这既是受赠家庭美满幸福无尚光荣的象征,也是一个国家国泰民安的祥兆。明朝中央政府规定:贫民年八十以上,月给米5斗、酒3斗、肉5斤;九十岁以上,岁加帛1匹、絮1斤;有田者罢给米。清朝中央政府规定:凡军民人等,年七十以上者,免其丁夫杂差,许一丁侍养;八十以上者,赏给绢1匹、棉花10斤、米1石、肉10斤;九十以上者,加倍给予。

《杨氏家谱》和方志记载,明清时期,白蒲杨氏荣膺“恩赐粟帛”者共13人,其中九十岁以上三次荣膺恩赐粟帛的4人。八世杨鼎鑑,生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卒于乾隆五十年(1785),在年73岁,荣膺恩赐粟帛一次;其妻冒氏,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卒于嘉庆十三年(1808),享寿93岁,恩赐粟帛三次。道光《如皋县志·耆寿》载:“杨廷柱,字槐公,号蓑吟,纯谨笃诚,性耽吟咏,常以‘不忮不求、知足知止’八字相励,享年85岁,子杰,别有传。”其媳程氏(杨杰之妻)系嘉兴府批验大使程元豸侄女,性情豪爽,无巾帼气,寿91岁终,事载清《白蒲镇志·寿母》。同治《如皋县志·耆寿》载:“杨春生,南乡农民,年九十,子贵玉、孙学俊、曾孙炳元、元孙祥泰,五世一堂。同治九年知县周际霖^①,详清汇题,奉旨赏给匾额、银缎。”十一世杨超宗(1804—1888),字逸帆,于道光八年(1828)科试为庠生。光绪十四年(1888)他已85岁高龄,正是他考中秀才60年而重游泮水。重游泮水,这是清代科举制度中一种庆祝仪式,以作为曾考中秀才而享高寿的庆典。其妻周氏,享寿81岁,夫妻双双两次荣膺恩赐粟帛。

《杨氏族谱》记载,有清一代,搬经杨氏荣膺恩赐粟帛者13人,其中八十以上两

次荣膺粟帛的4人。六世杨可方,生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卒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在年79岁。配范氏,生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卒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时年78岁,夫妻双双荣膺粟帛。第十世杨松长,号越龙,生于雍正四年(1726),卒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寿81岁,两次恩赐粟帛;其孙继昌,字广义,善治畜牧之病,生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卒于咸丰二年(1852),享年84岁;孙媳张氏,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卒于咸丰七年(1857),享寿87岁,孙子孙媳二人两次恩赐粟帛。《杨氏族谱》载有继昌公遗像,泰兴王度为其撰的《像赞》曰:“公率其性天蒿然心地,效周官之兽医为传家之能事,其善治牛也,既有耕于耕农,其善疗马也,并能识夫骐驎。膝下则儿孙满堂,享年则八十有四,为人正直,一生亲沐皇恩两次。”十三世杨华国(1788—1861),号锦江,原名华春,国学生,他是性情开朗善于养生的有福之人。《族谱》载有《锦江翁行述》:“翁原讳华春,捐名华国,字锦江,雒水之国学生也。其生平为人立心浑厚,处事精明,毫无因陋之习。略有好胜之心,然而有钱能用,无钱能省,遇小人则远之,见君子则亲之。所以,少壮之日本勤俭以治家,既有贤祖贤父贤妻之倚仗;中年以还求清闲以养志,复有贤子贤女贤孙之追随;至于年已杖国^②愈见精神,行且杖朝益加强健,尤人所难得者也。爰举一言以赠之曰:翁可谓有福之人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白蒲地区流传着一首民谣:人生七十古来稀,而今八十不稀奇。九十坐在摇篮里,百岁迎客笑嘻嘻。据白蒲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公室朱克成主任提供的资料显示,自2008年以来,白蒲杨氏百岁老寿星有4位,他们是:黄行村杨准英100岁,姚家园村杨同新102岁,朱家桥村杨满兰104岁,勇敢社区杨怀圣104岁。此外,十四世杨毓芳之妻任隽才,生于1911年,卒于2012年,享寿102岁。又据如皋市长寿研究会吴希林副会长兼秘书长所述:搬经镇也有两位杨氏寿星:周庄村23组杨秀英,生于1907年2月,2002年时年满95岁。东王社区11组杨龙林,生于1914年,今年已100岁。如皋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尊老敬老工作,已出台的惠老政策:80—89岁者,每人每月享受尊老金60元;90—98岁者,每人每月享受尊老金100元;满100岁者,每人赠送电视机、电风扇、取暖器各一台;104岁以上者每人每月420元。其经费概由市、镇两级财政拨付。

注:1、周际霖 贵州贵阳县人,附贡,清同治二年至三年、六年至十二年、光绪元年至三年任如皋知县。

2、杖国 《礼记·王制》:“七十杖于国”,谓七十岁可拄杖行于都邑、国都,后作七十岁的代称。

纂修谱牒 世代相传

谱牒,亦称家谱、族谱、宗谱、家乘,它既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历史形成的基础和源泉,其价值与正史、方志一样,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对研究古代人物、宗族制度、历代移民、尊祖敬宗、追本溯源、团结海内外华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白蒲杨氏和搬经杨氏中的有识之士,由于文化底蕴深厚、高瞻远瞩,历来重视杨氏谱牒的纂修工作。



清道光年白蒲《杨氏家谱》手书本



清宣统年搬经《杨氏族谱》影印本

白蒲《杨氏家谱》，首创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首创者为十一世杨绶组，他根据其祖父所传述，亲笔编纂了近支世系表。杨绶组（1807—1862），字佩之，号惺园，道光三十年（1850）岁贡生，以诗赋称于时，居家孝友简然，尤善培植孤寒。逝世后，里人赠“品端学邃”匾额，乡谥“孝悫先生”。清同治《如皋县志·文苑》有其传。民国年间，十三世杨筱石、杨仲华兄弟俩对《家谱》进行过第二次续修。1999年，十五世杨春和先生第三次续修，共一册，不分卷，自费复印了40本赠送杨氏族人。杨春和，1943年出生，白蒲镇勇敢社区人，中专学历，高级政工师，1961年7月参加工作，197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公社粮站会计、公社会计辅导员、管委会副主任，场北乡、林梓镇党委书记，中共如皋县委第五届侯补委员，中共白蒲区委副书记，新姚乡、白蒲镇人大主席，现任白蒲镇历史文化研究分会会长。1999年春，他在《杨氏家谱·续编》中写道：“先祖迁居以来，星移斗转，弹指600余年，至吾后辈已繁衍十七世，除大部分人仍生活在白蒲地区外，尚有迁居沈阳、福州、南京、溧阳、南通、如东、如城、加力等地。余幼时从先祖口传中聚积点滴家族各支概况，曾有意将家谱延续，奈因公务繁忙，迟迟未能如愿。现受各位前辈之托咐，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整理成续谱，并以此传给我子孙后代，激励我后辈。不管我杨氏家族后辈迁居何方，我们的血脉相连，我们的根永远在如皋市白蒲镇。”

搬经《杨氏族谱》，首创于道光十一年（1831），倡首者为第十世杨永宽，经修、协修、同修者共8人，其中由十三世杨王氏任主修。这是笔者所见60多部谱牒中唯一的由女士任主修的族谱，可见其足智多谋，能力非凡，在杨氏家族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据族谱记载，王氏（1782—1846），系十三世杨唐勋之继配。泰兴县廪生汪麟祥为其撰的《王太孺人传》云：“孺人以境遇弥艰、志气愈锐，妇德日彰。其治家也有道，母仪素著；其教子也有方，更兼内外谨严、朝夕奋勉，由是家声克振、遗业复兴，上足以报宗祖，下足以示子孙，是诚巾幗中所罕有者也。其尤足敬者，杨氏之族亦云旧矣，而族谱失修已经数世。自孺人当日本敬宗睦族之心作源远流长之计，所以罔惜经济主修谱牒，后之复修者孰不睥睨高望，啧啧称羨推孺人为首功哉！嗟！夫孺人特一妇人耳，而其生平小之能定一时之安危，大之有关一家之兴废，近之克树一门之风声，远之足为一族之表率，是其事可传、其节可传，其心愈不可不传也。”其后于咸丰十年（1860）、光绪十二年（1886）、宣统元年（1909）进行过三续修。宣统《族谱》，是一部很完整、较规范、质量较高的谱牒，共6卷、3册，木刻印刷，内有序言、条例、祖宗遗像、像赞、列传、家训、世图、世表、历次修谱人员名录等。取名派字从十六世起依次为：长盛德俊隆 保世久远荣。《族谱》还载有白蒲秀才顾鸿浩撰的《雨卿公行略》。

《杨氏族谱》封面印有“四知堂”三个字,这是杨氏宗族的堂名,典出东汉的大清官杨震。杨震(?—124),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出身名门,少年好学,博览群书,时有“关西孔子杨伯起”之称。他设馆收徒传业 30 年,学生超过 3000 人。年逾五十才出仕,历任县令、刺史、太守、朝廷太仆、太常司徒、太尉等职。他为政清廉,其子孙们吃饭仅有一些蔬菜,有些年长的朋友劝他置备产业留给子孙,杨震不肯,说:“如果后世称我的后代为清白之官的子孙,这就是一份丰厚的遗产。”他的子孙世代任公卿,为朝廷中的高级官员。史书记载:有一次,杨震赴东莱(治所在今山东掖县)就任太守,途经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在任荆州刺史时曾举秀才王密任昌邑县令。王密为感谢杨震对他的荐举之恩,及夜晚,他揣了 10 斤黄金进见杨震,想悄悄送给他。杨震说:“你了解我,我却不了解你,这是为什么呢?”王密说:“深更半夜,别无他人知道,你就收下吧。”杨震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无人得知?”王密十分惭愧,急忙离去。为纪念先祖杨震清廉,杨姓人家遂将堂号定名为“四知堂”。搬经杨氏十七世杨盛明先生,从 2003 年开始,多次从福建回海安、如皋,千方百计寻找《杨氏族谱》,终于在 2008 年找到清宣统元年(1909)第四次续修的《杨氏族谱》,他为寻得杨氏无价珍宝而兴奋不已。此后,他穷追不舍,于 2012 年 4 月到如皋市档案馆查到白蒲《杨氏家谱》,并很快与白蒲杨春和先生取得了联系,二人一见如故,亲密无间,为都是苏州阊门杨氏的后裔而激动万分。2012 年 11 月,杨盛明先生将搬经宣统年《杨氏族谱》自费拍摄成影印本 50 部,分赠给族人。他在《前记》中写道:“这些老谱保存到现在至少百年之久,实为不易。今日吾辈得以目睹,不竟由衷感叹!也许是祖先阴德相助,本人十分有幸,在贤侄德根家寻得老谱,如获至宝。从中我看到了祖先的许多故事,真是受益非浅。为了不辜负祖先遗愿,特不顾技拙,拍照整理编印出这本老族谱汇编,供诸位同姓族人参阅。也望诸君共同努力,尽快重修出版新的如皋《杨氏族谱》。”最近,杨盛明、杨春和、杨应琪(如皋中学高级教师)先生正在精心筹划续修谱牒事宜,力争在二年内将白蒲《杨氏家谱》与搬经《杨氏族谱》编纂成新的如皋《杨氏合谱》,为弘扬杨氏谱牒文化、丰富和充实如皋的地方人文历史资料作出积极贡献。

(通讯地址:如皋市白蒲镇蒲涛路 29 号,电子邮箱:qin88570174@163.com)

从王个簠弟子到国际海事专家

——施壮怀先生写真

倪怡中 李龙渊

最近报载，南通市民顾美英在伦敦接受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颁发给她丈夫杨金国的“2013年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特别勇敢奖奖章”。杨金国生前为南通通常汽渡水手，在一次事故中为抢救乘客生命而英勇牺牲。“海上特别勇敢奖”分为三类，首先为奖章和荣誉证书，其次为奖状、表扬信，每年全世界仅两人获此殊荣。杨金国是获得国际海事组织颁发的“海上特别勇敢奖”奖章的第一位中国人。

但人们也许不知道，曾经担任我国驻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首席常驻代表的也是我们南通人。

南通狼山葵竹山房有一块纪念王个簠的石碑，是王个簠的入室弟子所立，几十位弟子名单中有一个施壮怀。施壮怀青少年时跟随王个簠学画，但他并没有以书画为业，而是考入上海航务学院，当了一名远洋轮船长。1980年，施壮怀被派往伦敦任驻英使馆商务参赞处一等秘书，并担任中国驻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首席常驻代表。王个簠弟子中出了一位远洋轮船长、海事专家，看起来匪夷所思，却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教育理念，不急功近利，送孩子学书习画重在培养兴趣，陶冶性情；一旦孩子有了自己的志向和抉择，父母并不以为忤。施壮怀师从名家，受过良好的书法绘画训练，但他并没有选择书画为业，报考艺术院校，而是根据自己的志向，选择了航海专业，考上了上海航务学院，从此终生从事航海和海事专业，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在姜灶、长兴镇度过青少年时期

施壮怀1932年出生在海门。他的曾外祖父沈燮均在南通鼎鼎大名，是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的股东，当年南通最大的土布商。沈燮均为海门厅岁贡生，初教授乡里，后以经营布业而成巨商，作为一名士大夫投身实业。张謇筹办纱厂时，沈燮均鼎力相助，贡献尤多。张謇评价他说：“通纺之兴，归功于燮均之助。谓与共忧患，屡濒危阻而气不馁、志不折、谋不二者，燮均一人而已。”他去世后，乡谥“惠恣”，以表彰他的忠厚诚实，兴利于民。施壮怀的外祖父沈鹿芬是沈燮均的长子，当年沈燮均热心地方教育，捐资创办通州师范，还在姜灶建立了“沈氏私立两等小学校”，沈燮均嘱咐其子沈鹿芬要办好学校，造福家乡子弟。沈鹿芬的女儿沈雁如毕业于南通女子

师范,嫁给海门人电讯工程师施仲阳,因为丈夫经常在外地做工程,她便带着子女回姜灶港娘家居住。施壮怀是沈雁如和施仲阳的第二个儿子,因为战乱,他的童年和父母辗转流徙于各地,但许多时间是在父母的老家姜灶和长兴镇度过的。姜灶的外祖父家在镇南乡间有一座大宅子,宅子四周有角楼和高耸的围墙,宅子内厅堂相连,庭院深深,水池花圃点缀其中(日寇侵占姜灶时,抗日军民为防日寇占据宅子作据点,一夜之间将宅子拆除)。外祖父家在镇上还有好几间老房,住起来也足够宽敞。老房的天井里有一棵金桔树,到秋天结的果实很大很多;院子里有很多大水缸用来接雨水,外祖父说那是天水,用来做饭和泡茶最好;仓房里大柜储放粮食,柜子比小孩的人还高,比床还大,壮怀和他的兄弟们经常在柜里钻进钻出“躲迷藏”。壮怀长得虎头虎脑,读书也很聪明,因此深得外公喜欢。外公接待客人,谈话,乃至看书、做事,都喜欢壮怀陪在身边。壮怀当然对外公的事情不感兴趣,但外公书房里有很多很多的书,外公不准其他孙儿女进入他的书房,怕弄乱了他的书,壮怀却享受这格外的礼遇,他把外公的书看了个遍,这个偶然的机遇给壮怀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基础,并使他终身受益。

1936年,父亲施仲阳受政府派遣到青岛筹建无线电台,施壮怀随母亲同往,住在市区的观海二路太平山,在那里开始上小学。“七七”事变后,父母亲带着全家回到上海,施壮怀也转到上海萨赛坡路(现淡水路)小学读书。父亲依然东奔西走在各地建电台,只是把信和工资寄回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邮路不通,母亲得不到父亲的工资接济,便带着孩子回到海门长兴镇老家。施壮怀在长兴小学读完6年级转入民办启光中学读初中。为减轻家里负担,读书之余,壮怀还到家中田里干农活,养了2只羊,放学后就去挑羊草。日本鬼子下乡抢走了羊,施壮怀不顾一切去追,居然让他牵了回来而没有受到伤害。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也和家里恢复了联系,经济有了来源,施壮怀考入海门中学读高中。1947年,父亲接全家迁居上海,施壮怀也通过考试,进入上海复兴中学读高二。施壮怀其实没有安定地读过几年书,小学没有读到六年级,初中读的是民办中学,全凭自己的聪明和勤奋,通过考试进入了更高一级的学校。海门长兴镇老家有一个大书柜,放着许多书,有《笔记小说二十种》、《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金圣叹才子书》等许多古典小说名著,施壮怀几乎将这些书都看完。其中有一本《芥子园画谱》引起了很大的兴趣,这本画谱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画的基本技法,浅显明了,适宜于初学者习用。他照谱学画,影摹描画,如痴如醉,在无人指导下,画谱成了他学画的第一位老师,也为他后来正式拜王个簃为师打下了良好的绘画基础。施壮怀的舅舅沈燕谋从南通大生公司离职后在上海的大学里做教授,他有个朋友叫管建模,和王个簃熟悉,他看到在舅舅家玩的施壮怀画画的不错,便把施壮怀介绍到王个簃处学画。王个簃也不是随便收徒弟的,施壮怀画了一幅“三秋图”送过去,王个簃看了看说,勉强可以。于是,施壮怀正式行弟子礼,磕头拜王个簃为师。施壮怀虽没有师从王个簃走上绘画的道路,但他们师生保持了终生的情谊。拜师后仅2年,施壮怀考上了上海航务学院,从此一辈子和海洋海事结缘。但施壮怀只要回到上海,就要去看老师,王个簃在安福路、和明村、高安路的家都曾留下了师生会面、其乐融融的场景。施壮怀带来烟台苹果、国外

的装饰品,送给老师,如果遇到老师生日,施壮怀还会专门到淮海路“哈尔滨”食品店买一只奶油蛋糕。王个簃也一直视施壮怀为自己弟子,他送给施壮怀一幅“紫藤花”,一幅“红薇”,后来还送过一幅小品“绣球花”。这些画至今仍挂在施壮怀的书房里。

驾驶海轮从台风中心安全穿越

施壮怀考入上海复兴中学读高中。南通靠江临海,上海是沿海大城市,一个中学生的航海梦,憧憬着驾驶着大轮船过江入海,走遍世界海洋的每一个角落。施壮怀报考了上海航务学院。上海航务学院的前身是1909年晚清邮传部创办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公学)船政科,是中国高等航海教育的滥觞,1912年由国民政府交通部直辖,校名改为吴淞商船学堂。之后又几经变迁,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9月,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与上海交通大学航业管理系及海关总署税务专科学校海事班合并升格为上海航务学院,设有航海系、轮机系和无线电专修科。1952年,施壮怀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航务学院航海系。毕业后,施壮怀分配到上海海运管理局,从实习生做起,在三副、二副、大副岗位上做了10多年,1965年12月开始担任船长,这一年,施壮怀33岁。他驾驶着数千吨位的大轮船在上海、天津等沿海港口进进出出,仅停靠上海港就达150多次。从温州北到渤海湾的主要港口,不管是狭窄水道还是复杂航区,作为船长的施壮怀自行引领、指挥船舶安全进出,不但对指挥驾驶船只,对航海气象、测绘,船舶避碰、引航规则,船舶机械的保养和修理技术等业务都非常精通。他对自己驾驶的轮船的每一个部件细节,对停靠的码头的每一寸水域都了然于胸,10多年来,他驾驶船只进出各地各种港口数千次,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他的工作成绩得到单位干部群众的一致认可。因此,“文革”的动乱,父亲的“右派”之身,并没有对他产生影响,他在他的轮船驾驶室里兢兢业业地工作,平静地发出各种指令,指挥船舶安全地航行在各个港口之间,和外面喧嚣的世界好象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施壮怀优秀的船长素质和技术管理水平,以及10多年的安全航行记录,上海市海运管理局聘请他担任指导、培养、带教新船长的工作。1968年,为了培养出身好、政治可靠的航运高级人才,海运局有关部门从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船员中选拔船长人选,指定分配给施壮怀带教,跟随他驾船航行,并由他负责教授船舶操纵、航海技术、船运管理等业务课程和知识。他毫无保留地教授自己在长期航海实践中获得的经验、知识和教训,几年来后先后有4位被带教船长成长为合格船长。

1974年,施壮怀担任战斗53号轮船船长。以战斗号命名的海轮是当时我国煤炭运输北煤南运的主要船只,都是数千吨位的大船。那时的气象预报远没有现在这样发达和准确。有一次施壮怀指挥轮船航行在黄海时,突然遭遇16号强台风。瞬间,一排排海浪高达7—10米,打在甲板、舱壁上发出令人惊悸的轰鸣,由于天气预报的偏差,轮船驶入了台风圈。施壮怀知道,在12级台风中,轮船操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倾覆。他沉着冷静地站在驾驶室里,不断发出指令,指挥轮船劈波斩浪前进,并依靠自己平时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扎实的航海知识,根据风力、风速及大气压,绘制

出航行图,确定轮船在台风中的位置,不断调整航向、航速。他在驾驶室里 24 小时没有休息,在他的指挥和全体船员的通力合作下,轮船终于冲出台风圈,转危为安,全船 50 多人,数千吨煤炭,丝毫无损安全抵达上海港。上海市航海学会为了表彰施壮怀并总结这次战胜台风的经验,在 8 月份专门召开了“抗击 1974 年 16 号台风经验交流会”。施壮怀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介绍了他们的成功经验,还撰写了《与 7416 号台风中心遭遇记述》,由上海海运局海务监督室印制后,发放到系统的每一艘船舶和基层单位。

施壮怀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船长,不但爱船如家,精心维护着自己轮船的航行安全,对兄弟轮船遭遇危难也是有求必应,有险必救,显示了一个船长的职业道德和高尚情操。1976 年,施壮怀在战斗 41 号轮当船长,船已驶入长江南水道。这时有一艘 3000 吨轮船在吴淞口外海遭遇强风大浪,发来求救信号。救险如救火,施壮怀没有丝毫犹豫,毅然下令调转船头,全速赶往遇险船只海域救援。普通货轮没有拖带设备,不具备拖救条件,在大风浪中两艘轮船靠近很危险。施壮怀凭借以往工作经验和高超的驾驶技术,指挥轮船逐渐接近遇险船,在距离 100 米左右的时候,命令水手们用缆绳枪将细缆绳发射到遇险船上,牵引出遇险船的钢丝绳,然后把船上粗钢丝绳绑在遇险船的钢丝绳上,让遇险船将粗钢丝绳拖带回船上固定,粗钢丝绳的另一端则缠绕自己船的主桅杆后再固定在缆桩上,这样使用来拖引遇险船的粗钢丝绳非常牢固。即使这样也要避免因拖带时钢丝绳拉直而崩断,施壮怀又命令水手们用铁链将钢丝绳压弯,拖带时两条船航速保持一致,在大风大浪中渐渐地把遇险船拖带出险境,一直拖到长江安全水域。船上 10 多名船员获救了,几千吨货物保住了,一起船毁人亡的海难事故避免了。

任驻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首席代表

“文革”终于结束,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百废待举。象施壮怀这样航海专业毕业,外语基础好,又有数十年航海实践和担任船长经历,几十年安全航行经验的人,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用。1979 年,施壮怀被任命为远洋轮船长,驾驶万吨远洋轮首航加拿大。那次航



施壮怀参加国际海事组织会议

行,遇到气象条件较差,预报也不太准确,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施壮怀利用气象传真图作对比分析,修正航线,绘制出新的航海图,并确定合理的航速,从而保证了航行安全,还大大减轻了船舶设备的损耗,使轮船顺利停靠温哥华港。

1980 年,施壮怀被国家派往英国伦敦,参加联合国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的工

作。1981年,施壮怀被外交部任命为驻英使馆一等秘书。1982年,联合国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改名为国际海事组织,施壮怀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首席常驻代表。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简称 IMO)是负责处理国际海运技术、专业问题的联合国专门机构,总部设在伦敦。



施壮怀拜会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 Srivastava 先生

该组织旨在为促进各国间的航运技术合作,鼓励各国在促进海上安全,提高船舶航行效率,防止和控制船舶对海洋污染方面采取统一的标准,处理有关的法律问题。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由大会选举组成,每两年改选一次。理事会是国际海事组织的执行机构,在大会的领导下负责管理该组织的工作,在两届大会之间履行大会的所有职能。根据最新修订的《国际海事组织公约》规定,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由 A 类、B 类和 C 类共 40 个理事国组成,其中 10 个为航运大国(A 类理事国),10 个为海上贸易大国(B 类理事国),另外 20 个为代表世界主要地理区域的重要海运国家(C 类理事国)。中国于 1973 年恢复在国际海事组织中的成员国地位,从 1989 年第 16 届大会起连续担任该组织的 A 类理事国。理事会主席和理事国任期 2 年。2005 年 11 月 22 日,中国驻英国大使查培新在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第 24 届大会上当选国际海事组织大会主席。同年,国务院批准从 2005 年起,每年 7 月 11 日为中国“航海日”,同时也作为“世界海事日”在我国的实施日期,“航海日”自此成为政府主导、全民参加、全国性的法定活动日。至 2013 年,航海日已分别在上海、山东青岛、江苏太仓举办了三届的航海日纪念活动。2012 年,国际海事组织已有 170 个正式成员和 3 个联系会员。

施壮怀在国际海事组织一干就是 11 年。任职期间,他严格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尊严;他刻苦钻研国际海事组织的各项业务活动,对 10 多个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和涉及范围作了深入了解和学习,他担任航行安全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他提出的意见得到国际同行的尊重;国际海事组织制订一些国际公约,他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为国家争取合法的权益,又能实事求是,结合中国现状,把握问题的实质性分歧,提出合理的修正意见,使外国同行信服。1982 年,施壮怀在国际海事组织工作 2 年后,在一份国内登记表“设想和建议”栏中这样写道:“这两年,我在国际组织与会的实践,感觉到我(国)在航运管理及人才的培养,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可以说我们还停留在 50 年代甚至 40 年代的水平上。以航海驾驶人员为例,我们的专业人员在航海技术上还不是太差,可是在经济管理,法律知识等方面与一些海运先进的国家的专业人员(相比)则要差得多。事实上经济管理和国际航运业务包括法律、保险等基本知识,对一个船长或驾驶员来说其重要性不亚于航海技术。另外我国对一些专题项目的研究重视不够,例如防止海洋污染、监控工作、港口管理和航运的政策性研究,都远远落后于一些先进国家。因此,我们的船队、港口相

对地缺少竞争力,即使把我国的劳务方面的有利条件包括进去也是如此。船队的发展方向,船的配备都不能及时适应国际海运市场的发展,因此难以打开承运第三国货物的局面。在海协的工作方面也缺乏一批既懂外语,又懂技术,包括法律方面知识的人才。如何协调和利用我(国)现有的科研力量,抓住若干项目,突破我(国)所处的被动局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建议由学院和学会先筹建起专题(例如救生、消防、避碰规则、危险品运输等)小组,协调这方面的调研,既能为国家争取合法的权益,又可提高我(国)航海科技水平,培养新生力量。”施壮怀是一个有 10 多年航海实践经验的船长,海事工作的行家里手,英语基础又很扎实,一旦进入国际海事工作领域,就深深觉察到我国海事工作和国外的差距,他很快向国家建言献策,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意见,一个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情怀力透纸背。

施壮怀在国际海事活动中,熟练运用国际公约和规则,维护国家权益,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特别是在海事组织第十二届大会上,推动、促进了第 A500 号(X11)决议案的通过,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中国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对船舶技术不同要求的矛盾,维护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改变了一切由发达国家说了算的局面。因为发达国家往往利用先进的科技制造出先进的船舶和航海仪器,频繁修改海事公约,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他们获取最大权益;而发展中国家的船舶往往性能比较落后,船龄也比较长,在国际航运竞争中处于劣势。“500 号决议”规定海事公约在 5 年内不得修改,船舶、设备可以更新、替代,但要放低、放宽执行公约的标准,不能更改公约,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航运利益。

在朝鲜要求加入国际海事组织的过程中,施壮怀作为中国首席代表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朝鲜与西方国家关系较为紧张,朝鲜政府通过中国政府外交部要求中国代表帮助,外交部指示施壮怀积极做好各方面工作,争取帮助朝鲜早日加入国际海事组织。施壮怀首先以私人名义,找英、法、德、美的代表沟通,缓和气氛,然后再请同为理事的法国代表做一些国家代表的工作。施壮怀考虑到在国际海事组织常驻代表中要想获得三分之二的代表通过比较困难,但有许多国家不派出驻会代表,这些国家一样有表决权,要获得三分之二的通过相对容易。因此,施壮怀建议国际海事组织给各国政府发函征求意见,同时报告我国外交部,由外交部转告朝鲜政府,请他们同各国政府间做好沟通工作。国际海事组织是专业机构,无关政治,果然在政府获得通过比较容易,大多数国家回函同意朝鲜加入。但英国代表仍然发难,只准朝鲜派一个驻会代表,经过施壮怀做工作,后来同意朝鲜派出 3 人。

日本在国际海事组织会议上也居心叵测屡有动作,如日本提出建立海上安全报告(搜救)系统,设事故警报区,把中国大陆海岸线一直到太平洋都划入范围,而这个警报区的总部设在东京。施壮怀代表中国理所当然地反对,并利用他和各国常驻代表的良好关系,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否决了日本的提议。

从 1985 年起,施壮怀连续四年当选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和船舶安全发证公约外交大会副主席。1989 年,他还应日本政府邀请,参加国际海事组织“保持海上安全、保护海洋不受污染”会议,用英文发表“中国海上安全、保护海洋不受污染”专题演讲,阐述了中国政府在这一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受

到与会国代表的赞赏。

因为施壮怀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出色工作及其成就,1990年中国政府提名他为“国际海事奖”候选人。1991年,施壮怀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别津贴”专家,这期间,他还为《中国海商法》的制订作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贡献。



施壮怀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会议

致力于国际船舶安全管理规则的建立和执行

1991年,施壮怀在国际海事组织任职期满,奉召回国。作为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多年来一直关注着世界范围内的海上事故。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国际航运业的发展,带来海上事故频发,造成人员财产的巨大损失和海洋环境的重大污染事故日渐增多。这些海洋事故往往因为责任界限难以界定,造成处理困难而拖宕,从而难以得到遏制。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通过长期对事故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得出了两个80%的结论:造成这些事故的原因80%是因为人为的错误和疏忽;造成这些人为错误和疏忽的根源,又有80%是因为管理的缺失和问题。因此,海上安全委员会提出了“建立、改善船舶安全管理规则”的议案。主要内容有:一、要把改善安全管理责任分层次,逐级落实到船舶管理机构和船舶;二、把这一规则列入“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作为强制性规则,要求航运公司及有关企业组织,在规定的期限内建立相关规则并付诸实施;三、按照规则要求,最终取得多国政府认可的主管机构的审查合格证书。这是国际海事组织提出的一项力图从根本上改善船舶安全和海洋污染的议案,世界各国都响应、推行、实施这个议案。

施壮怀一回到北京,立即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中国航运业要尽快和国际接轨,建立“船舶安全管理(体系)规则”。为了推行这个规则,施壮怀建议先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首先起草一部既符合国际航运规则又适合中国航运实际状况的“中国船舶安全管理规则”;其次要求从有关部门、地方主管局到航运公司、每条船舶的每一个管理人员,都要制订各级各类的安全管理规则,并且要通过国家专业机构的安全管理审核;还要编制教材,集中授课,培养中国的首批国家级安全管理审核专业人员。施壮怀认为《中国船舶安全管理规则》的制订,能使中国的航运安全完全融入国际海运规则中,一旦出现事故或问题,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而使国家航运利益得到合法保护。国家接受了这个建议,交通部委托施壮怀开展这项工作,他也因此成为最早参与我国航运安全管理规则制订的专业人员。

1995年,施壮怀撰写了《〈国际安全管理规则〉的产生背景、发展和主要内容》,这篇近3万字的长文较系统地阐述了《国际安全管理规则》(全称《国际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以下简称ISM规则)的一般性知识、ISM规则产生的背景及其形成和发展、对ISM规则的主要内容和如何具体实施的一些看法、ISM规则与我国建立的安全管理新机制的关系等等。施壮怀把我国建立的航运安全管理规则

和 ISM 规则作了比较研究,他认为我国的安全管理新机制由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监督保障三个体系为基础,形成了安全运作、监督反馈及自我调整、激励四个机制,是国家航运安全生产的纲,是适应我国航运工作发展需要的重大举措,它包含了 ISM 规则的内涵,但是比 ISM 规则更丰富,它包含了 ISM 规则要求的所有基本功能,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府对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指导,实施制度性奖惩和教育机制,开展群众性监督等方面比 ISM 规则要求更为全面和深刻。因此我国的安全管理新机制既符合国际规则要求,履行了国际公约,又符合我国航运安全管理的实际,总结了几十年来的宝贵经验,提出了解决办法的新思路,建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使我国航运安全管理工作走上了一个新台阶。

1996 年,施壮怀又撰写了《安全、防污染管理和操作的强制性国际规定》。他从 ISM 规则及国际海事组织颁布的有关公约中,例举出 6 类条款:1、关于公司在保证安全和保护海洋环境方面的方针声明;2、安全营运、防止污染必需的各种证书、文件并保持其有效性;3、制订应急计划和这些计划的实施;4、船舶的报告制和发生事故或意外时的报告制度;5、配置合格的船员、培训和教育船员及陆上人员以及船长的责任和权力;6、制订船上各项操作规则、须知。他熟谙这些条款,他结合自己实际工作经历和在国际海事组织任职期间接触到的例子,对这些条款作了详尽的讲解。增进海上安全和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环境,需要加强船舶的管理和安全操作,这已是国际上的共识。要做好以上两项工作不仅仅是船舶方面的责任,还必须加强航运公司的管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际海事组织经过多年的酝酿、制订和修改,在 1993 年 11 月通过了 ISM 规则,1994 年 6 月国际海事组织通过修改《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 74 as amended),把 ISM 规则纳入其中一章而使其成为强制性要求,并于 1998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施壮怀认为我国航运企业建立的管理体系要达到或应保证“符合强制性规定及规则”(ISM 规则第 1.2.3.1 段)和“确保船舶的安全营运和环境保护符合有关的国际和船旗国立法的指令和程序 (ISM 规则第 1.4.2 段)”,这是评价一个安全管理制度是否达标的重要衡量标准。很显然国际海事组织所颁布的一些国际公约是“国际立法”、“强制性规定”及各种“规则”中最主要的部分。ISM 规则及一些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和要求涉及面广,为了便于把这些规则和公约中的“强制性要求”和适用中国航运公司和船舶的安全管理规则结合起来,施壮怀用他的学识和经验,从这些国际规则、公约中有关管理性和操作性的条款中归纳出以上 6 类,写成教材,亲自授课,以培训我国航运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员。

施壮怀为交通部安全监督局举办的“《国际安全管理规则》培训班”、“交通部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员培训班”编写教材,讲授课程,为培养我国海运安全管理及海运安全管理体系审核专业人才作出了许多默默无闻的奉献。

(通讯地址:南通市图书馆 电话:85516612)

明代余西诗人曹大同

徐振辉

曹大同是明代嘉靖年间通州余西场人,属曹氏武惠堂迁南通州余西场第十世。生于正德三年(1508),卒于万历九年(1581),享年74岁。字子贞,号于野,又号异庵。岁贡生(每年从各州、府、县选送生员入国子监就读的人),授光禄署丞(从七品),因不喜逢迎,未几弃官归。居南通城南,潜心购金石古文诸书名画,致力辑录类书《艺林华烛》,凡百六十卷,可惜稿未刻而散逸,流传下来的只有《曹于野集》抄本(1939年经畚楼石印本)。余西曹洪江先生搜集了此书,并从《崇川各家诗抄汇存》、《狼山志》、《五山全志》等书中抄录出曹大同诗109首、词6首、赋2首,我始有机会了解这位诗人及其作品。

曹大同一生的主要精力用在辑录类书上,诗集有《玉珠楼稿》,可能是他仕宦期间的作品,也已失传。现在看到的这些诗词应是作于中晚年。曹大同是个饱学之士,诗也很有特色,但他的诗名不显,清代沈德潜、周准编的《明诗别裁集》未收他作品,明代陈继儒编的《皇明诗选》,只选了他《登燕子矶》一首,称其诗笔雄健。

隐者之歌

和曹大同同龄的学者、戊戌(1538)进士、湖广按察使俞宪为《曹于野集》作序,其中说到曹大同“家素饶裕,读书城南别墅,建玉芝楼颇胜”,说明他不是寒士。嘉靖乙未(1535)进士、官至刑部侍郎的陈尧为《玉芝楼集》所作序中称他“不愧山人,山人之文,盖搜奇抉隐,肆力刻精,可名一家者”,可见他是厌倦仕宦、骋怀山林的隐士。所以,他的诗词赋完全可看作隐者之歌。他的《念奴娇·自述》为后人留下一幅自画像:

弘猷远略,笑书生骨相,元非腾跃。壮志平生还自负,不肯甘心漫(音获)落(廓落无用)。酒吐雄谈,诗增奇气,剑淬芙蓉铍。风云未便,黄鹄寄情寥廓。不解蜗角争长,蚁场决胜,隋珠弹燕雀。请看巢许是何人?不受唐虞槌凿。老莱不仕,荣启安贫,奚必皆荣爵!自矜颓老,专却一生烟壑。

诗人有壮志有才情武略,只是“风云未便”,不能仕途腾跃。他曾供职的光禄寺是掌管宿卫侍从、皇室膳食之事,既难酬壮志,又看不惯官场的蜗争蚁斗和奢华靡

费。他向往的是古代的隐士高人。巢父和许由是唐尧时的隐士，老莱子、荣启期是春秋末的隐士。荣启期一次在泰山上鼓琴而歌，孔子问他为何快乐，他说：“吾乐最多。天生万物，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吾得为男，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裸者，吾行年九十矣，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居常以待终，何不乐也？”（见《孔子家语》）所以曹大同归隐以后，淡泊自适于田园、林壑、寺庙之间，云何不乐？何况他不是贫者。尤其是“不受唐虞槌凿”这句很有锋芒，因为唐虞即是千古赞颂的圣君明主尧舜，“槌凿”比喻为施压、塑造。即使贤如尧舜，词作者也不愿做其忠臣顺民，这比对帝王抱有幻想的屈原还要清醒些、强硬些。所以曹大同是个封建社会中铁骨铮铮的硬汉形象，高蹈于消极遁世的一般隐士，而那些半隐半仕或身在山林、心存魏阙的假隐士，更不能望其项背。

隐者有隐者的精神寄托，曹大同的精神寄托是向往自由而长生的神仙世界。神仙是道教的产物。明代的皇帝普遍信奉道教，世宗更为笃信，甚至荒废政务，信方士，服丹药，士大夫也纷纷效尤，可谓一朝狂惑。因此，嘉靖四十五年（1566），时任户部主事的海瑞上疏批评世宗迷信道教。在道教信仰已世俗化的情况下，曹大同由隐慕仙也不足奇怪。不过，他主要是在诗歌天地中的联翩浮想，与服食丹砂、痴迷长生者自有区别。他在《郊居四首》中写道：“畸人原野性，鹤鹭意仙仙。”“葑萝从小隐，魂梦游太初。”都证明他居在山林，梦在仙界，不合于世人。最早写游仙诗的是东晋的郭璞，他的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曹大同的《游仙十首》最为集中地抒发其高洁胸怀和神仙梦想，从而使压抑、怨忿的情绪得到解压宣泄。他以壮丽奇幻的想象描写仙界景物、神仙、动物以及自己的行为感受，视野极为开阔。写景物有金银台、玄圃、丹丘、綵阁、椒庭，神仙有羲和、灵妃、浮丘（生）、王（子）乔、綵女、羽童，动物有玉虬、翠凤、斑麟、赤鲤，行为有焚香、调药、种杏、移梨……这里选录第一首以见一斑：

崑崙九龍窟，峨峨八風台。赤玉靈文下，朱陵真氣來。栖山拾雲菌。臨淵弄珠胎。升降隨長烟，飄飄戲九垓。萬里一瞬息，千歲方嬰孩。綵女上少室，羽童向蓬萊。俯首區中士，天濁堪悲哀。

这首重点写长生之乐，比照下界短命且生于污浊中的士人，为之感到悲哀。十首诗运用好多神话传说和丰富想象，上承《离骚》；追求仙界、忧生避祸的心情，遥接郭璞。只是到了衰颓晚年，陶渊明式的“猛志”淡却了，烟壑之趣也放弃了。

作为隐士，曹大同也有其交往的圈子和敬慕的人物。生活于正德、嘉靖年间的文征明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家、“吴中四才子”之一，为人谦和而耿介。时四方慕求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他辞受界限极严。有里巷贫民拿着饼饵来求书，他欣然纳之；唐王派人送黄金求画，他坚拒不纳，不见其使，信也不肯启封。宁王朱宸濠慕名相聘，托病不赴。授翰林院待诏时不事权贵，尤不肯为藩王、中官作画。从七品官做了一年后即栖息林下，作隐士去了。比他小 38 年的曹大同赞赏他“南国衣初返，东山（东晋谢安隐居地）意独醒”，愿意以他为榜样隐居，“伊昔嗟歧路，于今就范型。”（《奉赠衡山方丈二十韵》）这对他不受最高统治者“槌凿”的傲岸性格深起作用。

陈尧是曹大同的诗友，他为官能体察民情，世称“名臣”。曹大同在赠诗中写道：“高谊激颓风，欢觐失升沉。”（《赠陈大参梧冈》）说他崇高的情谊荡涤自己颓丧之

气,欢乐的相遇把升沉得失之心也丢开。“从天发付,百念俱推荡。”(《摸鱼儿·老况》)

虽是隐者,曹大同仍有忧国忧民之热肠。明代中叶,倭寇侵犯东南沿海甚为猖獗,鞑靼在北方也扰边不休。嘉靖二十六年(1547)倭犯浙东,诗人怒斥当局的腐败无能和因不能为国杀敌而叹息:“军中输黄金,募丁多脆质。虚文肉食鄙,力屈谋亦窒。顾愧悬弧身,少习穰苴(司马穰苴,春秋时齐国大夫,深通兵法)律。咄嗟守枯鱼(比喻身在穷途),块然把漆室(庄周曾为漆园吏)”(《杂诗四首》)。南通狼山倭寇被歼,诗人作诗欢呼:“万镞千锋杀气多,鲸鲵初剪海澄波。凯旋马上纷横吹,乐部新翻水调歌”(《狼山报捷》之二)。他喜和儒将交往,其诗有赠王将军、徐将军、刘督抚、王指挥使等即是佐证。他最憾恨的是人才良莠的颠倒,他借千里马作喻:“驽駘下乘蒙绣黼,尔辈流落江之浒……呜呼,天产真才何代无,悲心伏枥悲穷途”(《题赵子昂画马卷》)。“丈夫处世坎坷复如是,拔剑四顾发上指……君不见汨罗抱石空自沉,楚和双别罪难任”(《行路难二首》之二)。对污浊社会的不满,抒发“金刚怒目”式的愤懑!

雄健之风

曹大同《登燕子矶》,陈继儒评为“诗笔雄健”。诗曰:

百垒苍屏一径通,背岩亭子枕江雄。归云拥树深藏寺,峭岭连城上逼空。万里烟花晴照里,六朝兴废水声中。闲情徒倚虚明界,钟磬萧萧落晚风。

所谓“雄健”,应是雄浑与劲健的融合。司空图《诗品》中的“雄浑”风格,其关键词为“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意为返回虚静,才能达到浑然之境;积蓄正气,笔力方可显出雄豪。“劲健”的关键词为“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意为诗人心神坦荡如同广阔的天空,气势充盈像横贯的长虹。巫峡高耸万丈,飞云伴随轻风。诗人的风格取决于自身的素质、情志和学养,也与时代风尚和环境的影响有关。曹大同诗书万卷饱其学养,山川行旅豁其胸襟,幽居安雅养其情致,尤其是孤傲自负,硬骨铮铮,必然会在诗中鼓荡雄健之风。大凡隐逸诗的风格不外乎柔、淡、远之类,曹大同虽是隐者,诗中也有冲淡、高古、疏野、清奇之气,但雄健是他主要亮色。《登燕子矶》诗凭借遣词造境的语言功力,作出雄健诗的典型之作。此诗中“百垒苍屏”写尽壮美与秀美的群山,“枕江雄”、“上碧空”炼字极有力度,“万户烟花”、“六朝兴废”句更有收揽四野、俯仰百代的气概。

诗人雄健之作甚多,可圈可点的佳句如《渡江行》:“灵源千古凿真宰,日月吞吐相峥嵘。左澗(音从,水声)右射势如煮,平分东南折吴楚。岩鸣谷应万木号,炎方五月不知暑……琉璃横开子午道,芙蓉倒映蓬莱宫。划然长啸气薄斗,潇湘洞庭入我手。侧听沧溟隐隐雷,白龙战争翠蛟吼。”《听琴篇》:“回薄殷雷万壑奔,曲折流泉三峡吐。朝飞夜啼指羞涩,铜瓶滴沥井底汲。俄闻改韵郁清危,烟迷竹冷山魑泣。臃肿华月丽层穹,青山寂历苍江空。远听霜皋哀别鹤,近聆风渚叫离鸿。”《金山》:“四匝水云疑地尽,孤高世界觉天齐。”《静胜轩赋》中也有大气磅礴的意象:“揽少微而效光兮,揭斗柄而酌斟。缩长河约之带兮,砺泰华以施簪。挫万化于方圆兮,抚一瞬于古今。”《明诗别裁集》收诗一千零二十余首,可惜曹大同这类诗未被垂青,真令人有遗

珠之憾。

韵是诗的音响,诗的脚步,雄健诗必然具有黄钟大吕式的音高和起伏的音变。曹大同很善用韵,韵调激越,尤其是古风,常用抑扬顿挫的上声和急促有力的入声,平仄换韵,听觉效果甚佳。如古风《听琴篇》24句,四句一换韵,分别用侵、麌、缉、东、纸、支韵,与琴要传达的情感吻合一致,十分熨贴。

明代弘治年间书法家、诗人祝允明在《枝山文集·朱性父诗序》中批评诗人用韵粗率,“多疲词腐韵,无天然之态”。“疲词”即无表现力的疲软之词,“腐韵”即滥熟的韵部。选词与选韵是密切相关的事,曹大同诗作除少数应酬诗外,极少陈词滥调,诗风激越,这在明代中叶的诗坛上是出类拔萃的。

作为一个隐士,诗却有雄健之风,这在历代诗人中颇为少见,这种诗歌现象值得研究。

模拟之能

对明代诗歌历代评价不高,沈德潜指出:“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明诗别裁集·序》)“前七子”中的李梦阳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后七子”也承其衣钵,所以模仿盛唐成了明诗的主要倾向。“明人惟复不变,遂为叔敖之优孟(比喻一味模仿)”(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因袭模仿是缺乏创造精神的表现,但从另一角度看,模仿拟写也是一种学养积累,是形成自我面目的前提。模拟能力最为人称道的是明初的高启(毛泽东称其为明代最伟大的诗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他为:“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特其模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只是英年寿折,“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

模拟之作古已有之,或袭用旧题,或仿体例格调。如陶潜有《拟挽联辞二首》、《拟古九首》,谢灵运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李白有《拟古十二首》、《效古》,等等。曹大同拟古题诗有《折杨柳》、《短歌行》、《古意》等,拟仿诗作有《游仙》、《拟魏文帝丕芙蓉池》、《拟阮步兵藉咏怀》。

郭璞的《游仙诗》内容主要是求仙、愤世、隐逸和养生,这跟曹大同的思想和追求颇为一致,因此从意象和词汇上有不少可资借鉴。这里作一些粗略比较:

郭 诗

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

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借问蜉蝣辈,宁知松鹤年。

模拟得较为成功的是《城南别业二首 效陶体》:

陶 诗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

曹 诗

灵妃顾我笑,引步登文昌

左拍洪崖肩,右蹑羨门趾。

借问朱门客,容色谁后凋。

托志山泽居,寥寥寡轮鞅。

(《归田园居五首》之二)

江上耸逸峰,遥瞻起怡悦。

(《和郭主簿二首》之二)

此外,《短歌行》与曹操同用旧题,操作“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大同作“置酒华屋,殷忧填腹。人生几何,曜灵飞速。”操作“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大同作“代丝比簧,召我类族。”《杂诗四首》仿曹丕《杂诗二首》,丕诗有“草长鸣何悲,孤雁独南翔。”“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大同诗有“白露涂前墀,草虫发悲吟。感物结中肠,沈忧故难任。”《静胜轩赋》则拟仿屈赋和汉赋,如:“翩黄鹄之翻奋兮,吐骊龙之珠光。彼实混泾渭之浊清兮,乱鳧鸛之短长。”“驾青虬而骖白螭兮,召丰隆导之瑶林。咏九招与九歌兮,又奚惜寡和于余音。”这些词句既模仿《离骚》的意象,更是对屈原伟大人格的效法,显然也有他自己的感受和创新的地方。

从以上比较看,曹大同也像高启那样拟何人像何人,“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究其原因,源于他的学识、才情,诗书盈腹,下笔必然左右逢源。对于屈、陶等诗歌高峰,作者必然尽力蹶踪仰攀,而对于曹操父子的模仿,更是曹氏家族荣耀的向往。

近几年来,明代诗歌研究的学术观念已经有所突破,对复古诗学观和性灵诗学观作了新的评价。学者李圣华提出:“昔贤有云唐诗以情致胜,宋诗以理趣胜。余曰明诗以才韵胜”(《冷斋诗话》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如果用“才韵胜”来评价曹大同的诗,他也是当之无愧的。

(通讯地址:南通市城区富贵园 10 幢 501 室,电话:13651236677)

才高命薄的吴肇嘉

周思璋

1992年出版的《如皋文史》第七辑有一篇沙旦先生写的《对〈清代如皋籍进士情况简表〉的订正》，文中说：“《如皋文史》第三辑54-56页刊载的《清代如皋县籍进士情况简表》其资料来源，无非是县志乘和有关档案，现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之《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对上述‘简表’所列进士逐名对照，发现‘简表’所载未尽相符。兹分述如下。”

所列朱凤台、朱廷宁二人系江苏省靖江县籍；余一元系直隶山海卫籍；顾人骥系顺天府东安籍；戴联奎系顺天府大兴籍；另有黄文元，碑名是黄元文。吴肇嘉，查遍《进士题名录》无此人。

上文所说《清代如皋县籍进士情况简表》系袁采之老先生提供。袁采之名亮工，字采之。（1897-1995）出生于如皋城里一个败落的书香旧家。清末毕业于沙元炳创办之测绘班。民国初年，在县清丈局工作。清丈局结束后，改任小学教员。晚年曾应如皋县图书馆之聘整理古籍。他见闻广博，对近百年来如皋的遗闻轶事了如指掌。上世纪八十年代，如皋县志办公室曾多次派员登门征询历史掌故，他记忆清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县志贡献不小。家中藏有其父袁寿莱（字蓬仙）手录《同案录》，记载“有清一代科岁试之登第者……上自顺治乙酉（1645年），下迄光绪甲辰（1904年），二百六十年间，先后计一百七十案，并系以岁时（疑为“试”字之误？）诗文题。至于典试官之姓氏、资历，靡不翔实。又按邑乘所载乡、会试之中式者，暨五贡三成名者，弁诸册前。”故《清代如皋县籍进士简表》大致可靠；但也有少数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不符之处。据我所知，试释于下：

1、《清代如皋县籍进士情况简表》中之“籍”字欠妥。因表列进士中既有居住如皋的外籍人，也有已迁居外地的如皋籍人；且有以直隶顺天府籍考中举人的。如两位姓朱的是靖江县籍，已迁居如皋，因当时规定各县生员名额有限定，故要回原籍参加县试。到参加乡试时，如皋和靖江同属江苏省，则俱在南京贡院考试。

2、余一元是明朝崇祯十五年以如皋籍考中举人的。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上吊殉国时，余在沙海卫做小官（或作幕僚），曾向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献“乞清灭闯”之计，首先向清朝多尔袞投降。至清顺治三年以山海卫籍参加“丙戌

科”会试，登傅以渐榜中了进士，曾任刑部和礼部主事，晚年住在山海卫。按《清鉴易知录》记载：“顺治三年，乙丑，赐傅以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明清两朝规定，会试在丑、辰、未、戌四个年份的三月举行，殿试则在同年的四月。可能清朝初入中原，大部地区战争未息，“丙戌科”会、殿试改于顺治四年举行。故两处记载相差一年）。

3、据袁采之《清代科举在如皋的实施简述》（载于《如皋文史资料第三辑》）“顺天府是直隶省省会，属首都北京。一般的乡试贡院是本省生员参加考举人的考场；而顺天府乡试贡院则准许在京官员或子弟参加考试，录取名额较多，常号召各省生员前去应乡试，比较容易中选。这种乡试，要有在京的同乡官员出具‘印结’，方得入场……如张謇就是光绪十四年顺天乡试中举的。”但清代顺天府没有东安县，只有文安县。不知是否笔误或印讹？

4、黄文元应为“黄元文”，是《如皋文史资料》排印讹误。

5、有关吴肇嘉则比较特殊。原“进士情况简表”仅有姓名和登科年代，没有曾任官职和家庭住址。同书“举人情况简表”有：“吴肇嘉，光绪十四年戊子。”我因吴与张謇、沙元炳是同时代的人，袁老应当知道他的大致情况，故曾经问过袁老，不料袁也不知其详，我颇为诧异。及至前几年读到《博物苑总 16 辑》，见有顾启先生撰的《范伯子、顾延卿互赠诗篇考》，其中说：“伯子一生倾倒顾延卿与吴肇嘉的学识，推为‘江南北第一流人。’吴原籍如皋，生于通州城东北郊兴仁镇，范病逝之夫人大桥之弟，擅经学、文学、以南菁书院高材，光绪十五年会试中贡士，未及殿试，暴卒于北京寓所，年仅廿余。伯子挽以‘人尽嗟其才，类我类我；天邃夺之命，丧予丧予。’哭之甚哀。”去年又读到姜光斗先生所著《范伯子》，该书 26 页《范吴伉俪情深 悲切悼念难忘》中有“《大桥遗照诗》小序云：‘此所谓大桥，乃吾所居通州城郭之东偏十五里许有所谓新地者，有水桥一区，类如斯图……’”、“吴夫人虽然出身于商贾家庭，但由于受她哥哥吴肇嘉的影响，多才多艺，通书法，兼能吟诗。”两处所记大体相同，但顾文说肇嘉是大桥夫人之弟，姜书又说肇嘉是大桥夫人之兄，不知孰是孰非。

至此，吴肇嘉的家庭和生平大略可知。他原籍如皋，其父亲或祖辈在通州兴仁镇（原名新地）经商，范伯子（当世）的元配夫人吴大桥是吴肇嘉的姐姐（或妹妹）。光绪十五年（1889）吴肇嘉中贡士，未及殿试，暴卒于寓所。当时老百姓对考中贡士的也称为“进士”，以致县志误收。科举时代，青年学子如果想要“扬名”，则必须经历“头悬梁，锥刺股”；“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艰苦历程，跃过县试、乡试、会试、殿试重重关隘。可惜吴肇嘉才高命薄，与“金榜题名”还差一步，英年暴卒于京都。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不知他是否有诗文遗存？如皋人历来安土轻商，不会跑到通州一个小镇去开店。这吴家既能培养儿子读书科考，姑娘嫁给通州知府的范家，可能是一个入了如皋籍的客商。

（通讯处：如皋市如城镇锦绣苑 1104 楼 310 室 邮编：226500）

郑板桥石刻作品现身如皋始末

鞠九江



郑板桥画像

郑板桥的画竹栩栩如生,郑板桥以竹所作的诗句脍炙人口,而郑板桥在民间留有石刻作品则少有人见。家住如皋市如城街道的老干部周绚如对一块郑板桥石刻作品——“壶天”的挖掘和保护过程仍记忆犹新。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1980年春,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如皋县(当时尚未撤县建市)文化工作会议在县人民政府招待所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抢救和挖掘“文革”中免遭浩劫的文化遗产。酷爱文物收藏的该县二等一级伤残军人朱铎坐着轮椅车来到会场。

午餐过后,已近花甲之年、时任招待所副所长的周绚如陪同朱铎(两人系好友)走访与会者。在河北厅108房间,来自西片几个乡的文化站长犹意未尽,闲聊中,他们对“文革”中一件件珍贵文物被蹂躏践踏惋惜不已:“作孽,作孽,真是作孽哟!”

“我侬乡有个农民,家中有块白玉石,石块上面有郑板桥的字迹”正聊在兴头上,来自加力乡(现并入搬经镇)的文化站站长丁邦和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在场人瞬间将目光聚集到他身上。他话锋一转:“只不过这石块被当作踏脚石踩了几十年,不知有没有损坏。”

“真此事?”坐在轮椅上的朱铎半信半疑。

“哪能有假,我亲眼见过!”丁邦和充满自信。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散会后,对书法、石刻颇有研究的周绚如与朱铎一合计,再次找到了丁邦和站长,恳请丁站长陪同他们去这农户家看个究竟。

次日上午,丁邦和陪同周绚如(朱铎因下肢残疾,行走不便,未能同行)蹬车赶往加力乡一户姓李的农家。他们未进李家门,便看到躺在地上的那块面朝下、背朝上的石块,周绚如一阵惊喜。李家主人、年近70岁的李老汉热情接待了他们,并介

绍了此石块的来历：

1947年土改时，我们村上的农民斗地主分田地搞得热火朝天，没几天，村上的一位姓宋大地主家的100多亩土地分给了当地农民。翻身农民喜气洋洋，个个心里乐开了花，当时我家在分得两亩土地的同时又分得了这块石头。我家老小目不识丁，不知道石头上划着啥玩意，起初搬回来时，先将它安置在田头，作为“镇地石”，我祈祷着用这块石头好好压着这来之不易的土地。后来，孩子她妈先用它作“压菜石”腌咸菜（当地人腌咸菜时，放入盐后，习惯于用石头压着菜，使菜浸入盐水中），再后来我把它搬到家门前当作“踏脚石”，这一踏就是33年。

李老汉一边介绍一边将石块翻过身。石块虽历经沧桑，但完好无损，字迹清晰。这是一块罕见的白玉石，长40公分，宽25公分，厚5公分，石块中间自右至左草书“壶天”二字，左侧竖式落款“板桥”，右上方盖着一方长方形篆体印章——“郑燮”。“壶天”二字用隶体参入行楷，体貌疏朗，风格劲峭，堪称“一绝”。周绚如当即取出随身携带的《郑板桥字帖》与石块上的“壶天”、“板桥”进行比较，再反复核对了“郑燮”印章，初步认定是郑板桥真迹。

“请问这宋家后代现住何处？”

李老汉用手一指：“近在眼前，西隔壁的宋老先生，原是这石块的主人，你们去请教他吧！”

李家西邻宋家原是本村地主，其户主宋老先生已是88岁高龄。他满头白发，戴一副老花眼镜，拄一根拐杖，因教过几十年书，当地人习惯称他为“宋老先生”。周绚如说明来意后，宋老先生一下子来了神，他详细介绍了石块的来龙去脉：

这石块原是我家的祖传“宝石”。我家上几代殷实富裕，先辈们很有文化，与名人交往密切。据《宋氏家谱》记载，此石块是乾隆十六年郑板桥赐给我家客厅门前用的“富贵石”。石块上“壶天”二字意为清静幽雅，来源于郑板桥为我祖上题的一副“青菜白盐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对联。后因战乱，对联遗失，而“石块”代代相传。1947年土改时，这石块分给了本村李家。可李家有眼不识泰山，将板桥大师的作品当成了“踏脚石”，这一踩就是几十年，我好心疼啊！几十年来，我数十次趁着黑夜去李家门前抚摸石块，两次偷偷摸摸将石块搬回家，后因恐惧和紧张又送回原处。在历次运动中，石块有惊无险，安然无恙，这是苍天有眼啊……

“长老，你家祖祖辈辈将板桥作品完好无损保存下来，不容易啊！”周绚如不断地赞许。

“是啊，一言难尽哪！”宋老先生似乎遇上了知音，他与周绚如越攀越近乎，知心话儿一一和盘托出。临别时，宋老先生从祖父遗像镜框夹层内取出一张画像，与周绚如窃窃私语：“这是我祖上留下的郑板桥画像，可以送你一张画像翻拍的照片！”

“那太感谢你了！”周绚如兴奋不已，双手接过一张3吋的黑白照片。这是一张老年时期的郑板桥半身画像，光头秃顶，浓眉大眼，高高的鼻梁，额角上爬满了皱纹，留一撮胡须，穿一件长衫便装。“谢谢！谢谢！”周绚如如获至宝，对宋老先生感激不已。

告别宋老先生，周绚如一行又返回李家。一块带有传奇色彩的郑板桥石刻作品

遭受如此冷落，周绚如不免有点隐隐作痛。他决定花钱买下此石块，让沉睡 33 年的“宝石”重见天日。在李家，周绚如与李老汉又侃谈起来。

“李老，这好好的一块石头用作踏脚石，是否有点可惜？”周绚如试探着询问。

“不可惜，作用大着呢！”李老汉揷灭了烟头解释道：“我们这儿是高沙土地区，晴天一脚灰，雨天一脚泥。晴天回家时在石块上轻轻一踩，灰尘掉了，鞋子干净了；雨天回家时在石块上一踩，再在石块边角上擦几下，鞋子上的泥水掉了一大半，你说这石块还有没有用？”

“李老，如果你家门前院内全铺上砖块，岂不比这石头更好？”周绚如眼睛一亮，计上心来。

“好是好，就是手头紧啊，没那么多钱！”李老汉实话实说：“兄弟，不怕你笑话，农村人挣个钱不容易啊！”

“那好，我用 20 元钱换这石块怎么样？”周绚如说。

李老汉屈指细算一笔帐：20 元钱能买 800 块红砖（按当时市场价，5 元钱可买 200 块砖），这块不起眼的小石块可以把家门前全部换成砖地，何乐而不为呢？“好，一言为定！”李老汉爽快答应了。岂知，老汉的小儿子回来后讨价还价，最后以 25 元成交。

夜幕渐渐降临，周绚如小心翼翼用自行车驮着石块返回县城，他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

周绚如私费购买的郑板桥石刻作品并没有归个人所有，他与朱铎商量后决定将石块捐给县人民政府招待所，供客人观赏，从而把爱石之情化成了一腔爱国之情。此消息不翼而飞，短短几个月时间前来欣赏石块者络绎不绝。

一日，一位南方的文物贩子千里迢迢赶至如皋，他看了石块后一阵惊喜，便将周绚如叫到一边，私下塞给他 500 元好处费，言明愿花 10 万元收购此石块。周绚如连连摆手：“再多的钱我也不卖，我已把它捐给了县人民政府招待所！”那人自讨没趣，怏怏而去。

此后不久，为了便于客人欣赏郑板桥的艺术真迹，周绚如在招待所扩建时，将此石块镶嵌在 5 号楼前圆门正上方，使来客即可“举头望‘宝石’”。

宝石为媒，广交友人。此后 20 多年，如皋市人民政府招待所接待中外来客 80 多万人次，不少人在郑板桥石刻作品前摄影留念。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全国政协副主席钱



安置在原如皋招待所 5 号楼圆门上方的郑板桥石刻作品——“壶天”。

伟长、已故园林建筑专家陈从周、著名作家碧野、原上海市电影局局长丁正铎等人在欣赏郑板桥石刻作品的同时，他们对周绚如不遗余力挖掘祖国文化遗产及无私奉献精神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祖国的文化遗产归国家所有，我把它捐给政府无怨

无悔；板桥大师的石刻作品陈列于此，供世人观赏，我很乐意！”每当客人赞许时，周绚如坦然道出心声。

沉睡数十年的郑板桥石刻作品终于重见天日，并登上了大雅之堂，周绚如感到莫大欣慰。他心系石块，与石块结下不解之缘。他自愿担任义务护石员，定期为石块清理灰尘，为“壶天”镶上“金箔”，使其金光闪闪，光彩耀人。与此同时，他与招待所保卫人员制定落实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文物保护措施，从而确保了石块安全。后来，因旧城改造，招待所拆迁，此石块由政府指定的有关部门收藏保管。

(通讯地址：如皋市中山西路 82 号，手机：13003568039)



周绚如(后)与朱铎在郑板桥“壶天”石刻作品前留影纪念。

弘一法师与通如名人的因缘

苇 叶

拜读贵刊第五期《弘一法师与通州乡贤费范九》，笔者觉得还有许多话要说。弘一法师是近代高僧。法师从未来过南通和如皋，但他与几位通如乡贤的因缘颇深，值得我们去重温一下。

民国八年(1919年)，清末状元张謇为祈嗣得应，在狼山修了观音院，并托江易园居士和戏剧名家欧阳予倩力邀弘一法师来通主持狼山观音院。徐半梅在《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有记，张謇曾拖予倩(时在南通创办伶工学校)邀请过弘一。刘质平是弘一的学生，也曾在该校工作过，张謇有可能也托刘去邀请过弘一。张謇盼望弘一来通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南通的佛教事业。圣严在《归程》(第4章第57、58页)中抄录了张謇致江居士书：“狼山观音院可臻精洁胜处，而和尚太恶俗，欲求勤朴诚净之僧或居士主之。狼山亦拟仿焦山例……若弘一、太虚能为之，亦大好事也。试与弘一、太虚言之。”弘一最终未能来通。他在给杨白民的信中道出其中缘由：“南通事俟前途有肫诚敦请，再酌去就，现在无须提及。”

此次邀请虽未成功，但中间人江易园需要介绍下。江易园就是江南硕儒江谦(1876-1942)。他是安徽婺源人，为南通张謇所识，来通创办通州师范学堂；为海安韩国钧所赏，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他曾邀李叔同为南高教员。李叔同出家后，法号弘一；江谦居士一直受益于弘一法师的教诲。弘一大师六十大寿，江居士作诗一首，名曰《寿弘一大师六十甲子》，诗末注语为“癸亥遇师沪上，教读《灵峰宗论》，受益无穷”，以此铭记弘一法师的恩德。

范成法师是如皋籍名僧，他因印经而声名远播。弘一法师对于范成法师的印经活动颇为支持。一是范成法师曾为影印宋版《磻砂藏》前后在北方奔波数年，可谓是重印此经第一功臣。当时厦门有一穷苦小儿为支持印经，捐献出自己省下的一圆钱。弘一法师特意撰写了《记厦门贫儿舍资请宋藏事》。此文录于《影印送磻砂藏经》首册。二是叶恭绰曾在《僧伽六度经》题记中写道：“民国乙亥(1935年)，从子公超自英伦博物院摄影，弘一律学大师依以布写。”关于此事，《弘一大师年谱》中有弘一自记：“此经为敦煌写本，今存英伦博物馆。范成法师获得影印，将刊石置于南通州狼山僧伽大圣道场，属为书写。余以暗短，未由辨其文字，后之贤者，幸审订焉。丙子

(1936年)胜音书并志”。大师愿为《僧伽六度经》书文,并说是“幸审订焉”,足见他对范成法师的支持!据南通广教寺的网上介绍,此寺至今还藏有一部弘一法师手抄的《僧伽六度经》。

通如名人中,与弘一法师交往比较密切的要数费范九居士和常惺法师了。弘一法师曾数次赠书通州名人费范九。费先生为知名居士,对弘一法师在佛学和书法上的造诣非常佩服。王士明先生在《弘一法师与通州乡贤费范九》中记载过一例:1932年,上海邮路已断。弘一法师邮寄手书《雪窦诗》丢失。弘一重写再寄,最终费先生收到两卷《雪窦诗》,并将两本诗卷合订成册,并作序,以示答谢。此事不虚:2004年,上海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一幅弘一作书法镜心《雪窦诗》以近两万元的价格成交。此幅作品落款就是“壬申重书雪窦诗奉范九居士之音”。“壬申”就是1932年。费范九居士在得到弘一的《雪窦诗》还曾赋诗一首。诗名《弘一律师所贻雪窦诗卷沪战佚已重承写寄寻复获得合装纪喜》,印于《淡远楼诗》(1934年冬印本)第2卷第55和56页。诗曰:“沪友书来足慰予,悬心诗轴出兵余。欲求世弭黄巾劫,却喜天旌白业书……长记因缘展卷初。”此诗表达了费范九求得弘一墨宝的喜悦心情。

《淡远楼诗》第2卷第52和53页还刊有费范九的一首长诗《弘一律师邮赠书联集华严经诸佛等慈父人命如电光偈文因用为韵赋谢》。对此诗稍加分析,我们可以获知弘一法师曾为费范九书写过《华严经》,时间大约在1937年。诗中“公(笔者注:指弘一法师)书华严来,笔笔气氛郁;如入舍卫国,参礼十方佛”四句抒发了费范九“赏弘一书经如入佛国”的真感。“雪窦一卷诗,莲宗十祖传(笔者注:指《华严经》)”后有小注:“皆师(笔者注:‘弘一法师’)施品”。如诗直言:“《雪窦诗》和《华严经》都是弘一法师施舍给费范九的作品”,而给费先生留下了“妙缘对春风”的快感!

为何说赠书《华严经》是在1937年呢?《弘一律师邮赠书联集华严经诸佛等慈父人命如电光偈文因用为韵赋谢》中的“时令”可以为证。此诗首句是“昨宵发奇梦,明瑶辉客居”,末句是“望望秋江上,许我乞余光”,小注:“师(笔者注:‘弘一法师’)有秋凉莅沪之说”。“昨宵”、“秋江”和末句小注告知读者赠送《华严经》一事发生在弘一法师即将“秋凉来沪”的日子里。据《弘一法师年谱》,弘一出家后未曾在沪长住。又查《弘一法师在南普陀闭关》等文,弘一法师秋季来沪只有“1937年9月中旬,法师离青岛赴厦门路过上海”,而今为大家熟悉的弘一大师《晚年慈照》就于同年同月摄于上海。

最值得一提的是,《弘一律师邮赠书联集华严经诸佛等慈父人命如电光偈文因用为韵赋谢》展现了南通乡贤费范九对弘一法师的仰慕之情。一方面,诗句数次强调诗者是南通人,如“我生江海中”和“圣迹狼山盛”;另一方面范居士觉得“袈裟是慈服,烦恼得清凉”,希望能够得到弘一法师“余光”的庇佑。

上文曾经提过,弘一法师虽然未能来通主持狼山观音院;但他于观音院是有“后缘”的,“牵线人”就是费范九。为报观音送子之恩,张謇曾将台州人张摩诃寄藏的百余轴观音画像“易故殿宇,建阁三层”。这批珍贵观音像多出自名家之手,有吴道子、贾师古、赵孟頫、仇英和徐渭等等。张謇离世后,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宣扬这批

画作,费范九在征得张謇家人的同意,将画轴密运上海,用上等宣纸珂罗版精印千部,名曰《历朝名画观音宝相》。此书由印光法师作序。费范九又请弘一法师抄写此序。弘一用工楷书写了此序。弘一法师是印光法师的高足。据《印光大师与弘一大师的师徒缘》,“弘一大师多次向印祖写信请教,印祖都给予悉心指导,并指出:‘古往今来,不少人用行书草体写经,我对此绝不赞成。想要断烦恼、了生死、度众生、成佛道,岂可将抄经视为儿戏,由着性子写得游龙舞凤的?’”弘一法师用规整的楷书书写序言,足见他对“通藏观音像”的敬重!印光和弘一两位佛家大师能为《历朝名画观音宝相》书文,费范九功不可没!

1922年7月,费范九的弟弟费师恒死于肺病。作为长兄的费范九邀请国学名师钱基博先生撰写了《南通费生传》,刊于同年10月11日的《南通报》上。1948年正月上海净缘社影印出版了《南通费氏世德录》,撰文和书写者多为知名人士,有梁启超、张謇、钱基博、林纾、徐乃昌和郑孝胥等等。其中钱基博撰《南通费生传》的抄写者就是晋水弘一。此文落款是“苍卜老人书”。唐卢纶有诗云“苍卜花名飘不断,醍醐法味洒何浓”。据《弘一大师与广洽法师的因缘》,弘一大师从诗中受到启示,故于三下厦门后,取院名“苍卜院”,自号“苍卜老人”,目的是自勉书法结缘,能像苍卜花一样,法味酣浓,令人喜见,广植善因。正如弘一所愿,他的书法佳作是费范九笃信佛教的“妙缘”之一!

如果说费范九居士对弘一法师是“远而慕之”,那么常惺法师对弘一法师是“近而友之”。

常惺法师俗姓朱(1896-1939),法名寂祥,字常惺,江苏如皋人。常惺自幼聪慧过人,在同邑自诚长老的帮助下,17岁便毕业于如皋师范;后入华严大学,师从月霞法师;又入常州天宁寺,成为谛闲法师的得意门生。常惺法师对于自己的家乡如皋感情深重。他自署“雉水沙门”,密林(持松法师)给常惺的题字开头便是:“雉水之滨”;而太虚大师在挽联中赞誉常惺是“雉水钟灵”,“雉水”是如皋的古称。常惺法师曾出任北京万寿寺、泰州光孝寺、厦门南普陀寺等名刹的住持和柏林教理院、闽南佛学院的院长,并受圆瑛法师之邀出任中国佛教理事会秘书长。

据《弘一大师年谱》等书文的记载,常惺法师与弘一法师互为敬重。1923年,中国佛学界为《大乘起信论》真伪论辩不休。时年28岁的常惺法师妙语连珠,力排众议,发表了《大乘起信论料闻驳义》,并引起了弘一法师的关注。弘一法师年长常惺16岁,却十分欣赏这位晚辈同仁的才学。次年,他在给好友蔡丐因居士的明信片上写道:“常惺法师之文甚精,乞详览。悬,二月二日”。“之文”就是《大乘起信论料闻驳义》。

十年后,常惺法师已是中国佛教界的高僧。1933年,太虚大师在厦门南普陀寺的住持任满,常惺法师继任南普陀寺第四任住持,并兼任闽南佛学院院长。常惺法师是1932年12月来到厦门的,同时弘一也来到南普陀寺。在欢迎弘一和常惺两位知名法师的大会上,太虚法师高度赞许了他们二位,称“弘一大师在中国僧伽中可说是持戒第一”。因为常惺法师忙于教务,并不常来闽南佛学院,学院学风不静。1934年春,常惺法师和会泉法师商量,诚邀弘一法师来负责整顿校风。言教不如身

教,弘一法师是最佳人选。同年2月,弘一大师如约来到闽南佛学院整顿学风。一方面,弘一法师在常惺法师的支持下,邀请了瑞今法师和广洽法师等名僧来校工作,并提倡“蒙以养正”的教学精神。另一方面,“弘一法师亲自帮助常惺法师拟定办学宗旨与教学计划,要求学僧通过三年修学,做到深信佛菩萨灵感,深信善恶因果报应,深知为何出家及出家后应做何事,进而成为‘品行端方,知见纯正,精勤耐苦,朴实无华’的新一代僧才”。三年来,经两位法师的共同努力,为中国佛教界培养了大量人才。

往事并不如烟,弘一法师与通如名人的友谊将永远是通如地方佛教史的重要一笔!

(通讯地址:如皋市人民医院护理部 许春燕)

无愧于民国第一县的《皋农》杂志

侯求学

1995年一版一印的《如皋县志》记载：“如皋于东晋义熙置县，宋时为中下县，元至元年间升为上等县。民国时为一等县，与湖南邵阳同列为全国最大县。”正是这民国第一县，在民国时期确实也做出了与其第一县身份相适应的事业，比如编辑出版《皋农》杂志。

《皋农》简历

《皋农》，16开本，初由如皋县县立农场编辑出版并发行，编辑部设于如皋掘港如皋县立农场，由如皋城内冒家巷精诚印刷社代印，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夏季出第一期后，因经济困难及人手过少，仅出一期而中辍。民国二十年（1931年）二月出第二期（棉作专号）、三月出第三期（植树专号），以此每月一册。六月下旬，奉江苏省农矿厅训令第4527号，如皋县县立农场改称如皋县农业改良场，故从第七期起，由如皋县农业改良场继续编辑出版并发行，出至二卷十一期，历时二载，出二十三册。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二月，因江苏省实业厅裁并建设厅后，如皋



《皋农》第五期封面



《皋农》第一卷第七期封面



《皋农》第二卷第十期封面



《皋农》第三卷第一期封面

县农业改良场亦奉命结束,交县政府保管,听候改组。在此期间,诸事停顿,《皋农》亦不得不暂时休刊。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月,原如皋县农业改良场改组为如皋县建设局下属的如皋县农业推广所,如皋县农业推广所接续编辑出版发行《皋农》的各项工作。复刊号即为第三卷第一期(总第二十四期),仍由如皋精诚印刷社承印。《皋农》有时也编第X卷第X号,如第二卷第二号;第三卷第二号后,多编为第X卷第X号。《皋农》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一号起改由如皋新生印刷公司承印,个中情由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二月出版的第四卷第十二期末尾的“本刊启事”中就已经说得很明了:“本刊向由精诚印刷社代印,数年以来,尚能如期出版。惟最近两期,于上年十一月及本年一月送印,竟被其搁置五阅月之久,致劳阅者久盼,或函问,殊为抱憾!而本刊的损失,亦颇重大。自五卷起,拟另行设法,一号大概与本期同时送达。事非得已,伏希鉴谅!”在第五卷第三号的末尾,又刊登了一则“如皋县建设局启事”：“查本刊原系农业推广所主编,自本年九月农业推广所并归本局设课办理后,即自第五卷第九号起由本局接续编辑,其第三号至第八号亦由本局补印分送。此启”(标点由笔者试加)。因此,第五卷第三号(总第四十二期)变成了由如皋县建设局实业课出版。而笔者能见到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五号,出版单位已经改为如皋县建设局皋农月刊社,承印单位变成了如皋正大印刷社。1935年,《皋农》杂志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受印刷局过户或结束的影响至愆期甚久,且有一些稿件因印刷局过户而遗失,致劳阅者感不衔接之苦,实际只出到第五卷第七号(总第四十五期)。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一月出版的第六卷第一号(总第四十六期),承印单位为如皋正大印刷社;而笔者所见的第六卷第七号(总第五十二期)的印刷单位就变成了如皋快廉印刷所。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出第六卷第九号(总第五十五期),十一月出第十一号(总第五十六号),不知是印刷错误还是编排错误?从第六卷第一号起,在封面的右上角增加了一排竖排小字“中华邮



《皋农》第四卷第一号封面



《皋农》第四卷第十二号封面



《皋农》第六卷第七号封面

局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笔者所能见到的《皋农》只至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出版的第七卷第二号(总第五十九期),既没能见到创刊号,也没有见到终刊号,实在引以为憾。笔者猜想,在如皋大地上生存了多年的《皋农》,是否也随着日寇铁蹄的到来,而跟国民政府一起远走他乡了呢?

为方便读者查阅,《皋农》在各卷出版发行后,择时编辑了《本刊第X卷总目录》。《本刊第一卷总目录》刊登于第一卷第十二期,《本刊第二卷总目录》刊载于第三卷第一期,《本刊第三卷总目录》刊于第四卷第七号,因本人收藏有限,无从知道其它各卷总目录所刊期号。

从笔者所见到的《皋农》资料显示,《皋农》杂志出过不少专号、特号。如前面说到的民国二十年(1931年)二月所出第二期的棉作专号、三月所出的第三期植树专号,第二卷第一期、第二号为推广专刊,第二卷第十期为改进农村特刊(农村宣传周报特刊),第三卷第三号为二十二年度进行计划专号,第四卷第二号为农产品展览会特辑,第四卷第九号为二十三年度进行计划专号,第四卷第十、十一号合刊与第四卷第十二号分别刊发“一年来之第一推广区”(上、下),亦可视为专号,第五卷第一号为(改)进农村副业计划专号。

刊物特色

《皋农》,作为一份部门工作管理业务刊物,既有时代特色,又有专业特色,而更多的是专业特色。刊物的栏目设置总体上分为:卷头语、特载、论著、演说、计划与方案、报告与调查、统计、法规(章则及规程)、史略、棉作、稻作、麦作、杂谷、肥料、畜牧、养蚕、园艺、养蜂、农具、病虫害、选种、林业(森林)、教育、合作、农村、渔业、所闻、大事记、参考资料、浅说、杂组(文)、歌谣与农谚、文艺、漫画、其他、编完以后等。

先说封面。《皋农》从诞生之时起,给我的印象就是务实。一、二卷时,其封面的体例大致为上部四分之一的版面印刊头,刊头部分又分为左中右三个方格,左边方格为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售价,中间为刊名、期号,印刷单位,右边为小号字“本期要目”。封面的刊头以下部分多为小字密排的类似于刊首语的文章,整个封面显得零乱、拥堵,不醒目。从第三卷第一期起,《皋农》似乎才真正有了自己的面孔,给人的感觉更加清新、明了。虽然仍然保留了民国期刊的总体格调,但封面不再有那些细小的文字,单单只是刊头和“本期要目”上下两个大的部分,字体都明显放大。上半部:顶部正中置孙中山先生椭圆镜像,两侧分别竖排“每月一期”“售洋二分”(第二卷第五期往前为“售洋壹分”);孙中山像下方手书《皋农》刊名,刊名下面是总期号和承印单位,右左横排卷号和期号。用一条横线将上下部分隔开,下半部是“本期要目”,自右至左竖排各要目,要目下边是手书的出版单位,下边一横线,线下出版日期。

《皋农》的创办,初始的目的,是报告如皋县县立农场的一些工作和介绍各种科学的种植方法给一般的农友,所以总体上是一本农业生产与经营指导的业务类、科技类的刊物,几乎没有多少政治性的内容。至1931年5月18日,江苏省农矿厅因“各县农林蚕桑场,成立以来,名称既无限制,事业偏狭,难期普遍”之故,同时希望“推进整个农业”和“应农民之需要”,把原有的农林蚕桑场,改组为各县农业改良

场,如皋县立农场奉令于六月下旬改组为如皋县农业改良场并改季云为场长,七月一日就职视事。改组后的如皋县农业改良场,事业范围扩大了几倍:原仅注重农作,改组后把农业调查事项规划进来,还增设渔业指导所一处,并且在育种方面也可以做一些较高深的事业,如当年开始进行棉作的统系育种工作等等。因此,《皋农》的使命也相应地进行了一些扩展,从内容上来说虽然还不外乎工作动态和良种良法良技的介绍,但是更增加了各种的调查分析等内容。

综观手中各期《皋农》,其内容特色可以概括为:新、实、专、广。

新:指思想新、技术新、形式新、时效性强。思想新。不只是凭借自身的优势占有信息和知识,而是通过杂志,及时传递信息、普及知识。如第五期除了刊登了场长季云的《发展农业与救国》的主题文章外,还发布了这样一份启事,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推进农业的改良和发展:“如皋县各级党部、各区公所、各学校、各民教机构、各乡镇公所公鉴:敝场每月刊行本刊一册,宣传关于农业技术上一切问题,并报告敝场工作,深愿贵处切实联络,共同推进本县农业改良事业,并希随时指教一切,以匡不逮,实为欣事。”(标点为笔者试点)细细展读前后六、七卷几十期杂志,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人们已经相当规模地应用刊物专号特刊、举办大型农产品展览会、兴办农业合作社等方式来推进农业改良。技术新。《皋农》始终坚持科学种田的理念,将当时最先进的种田知识传播到如皋幅员辽阔的农村。如针对螟虫有可能危害本县的情况,在第六期及时登载了《除螟摘要》,指出“螟患不除,秋收歉少:出产减少,米价飞涨;生计艰难,盗贼丛起;赋税短收,国库空虚;经济困难,各事棘手。”《皋农》刊登的《主要杀虫药剂制法述略》、《高粱黑穗病预防法》、《蔬菜类病害防治法》、《蝼蛄的防除法》、《鸡饲良上之注意点》、《食粮防蠹法》、《治蝗》、《地老虎驱除法》等文章,不仅是发现问题,而且及时教给解决问题的方法。形式新。《皋农》杂志登载内容除了一些比较专业、实用的知识文章外,还注重收集、登载一些与各期内容相配合的农谚、歌谣、歌曲等,以增强杂志的趣味性、可读性。如《重农歌》、《养蚕歌》、《十二月除螟歌》、《老牛老牛快起身》、《锄头舞》、《镰刀舞》、《太阳下山红又红》、《养鸡月令歌》、《耕牛歌》等。时效性强。这是月刊的相对优越性。如民国二十年(1931年)七月洪水为灾,《皋农》第七期就发表了《多雨的七月》,九月份针对退水不迅速,加之受了运河溃堤的影响,入秋以后,河水暗涨,中低之田,麦种均不能下田的状况,为民请命,呈请县政府飭令掘港、苴镇、丰利三区区公所,于最短期间迅将沿海各坝及原开已闭之水口一律放开,放水入海,以使低田可以种麦;在第十期杂志上又登载《几件值得我们注意底事》,提醒农友注重兴修水利。此外杂志还及时披露了海盗对沿海农业的侵扰,如第九期首页登载了《海滨居民的危运》,第四卷第五号《本县渔业的厄运—海匪给予渔民的损失》、第四卷第七号《本年五月份海盗骚扰渔船损失情形》等等。

实:指对如皋农业农村情况调查真实、农业推广贴近如皋农村实际、切合如皋农民所需、业务指导实实在在。如《大豫中乡利农信用合作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调查本县稻作归来以后》、《中国蛋业前途的危机》、《十六总渔业合作社成立的经过》、《调查掘苴两区渔行营业状况报告》、《如皋县农村猪只养殖概况》、《本县第七区金

《龟子为害状及其防治法报告》、《长沙镇左近各渔户本年黄花鱼二三汛采捕概况及丰掘两镇鱼行营业状况》、《李堡区丁家所农民编网事业》。如《如皋县农村副业委员会改进养猪事业计划》、《农事推广的经验谈》、《推广优良稻种方法的私议》、《设立渔民补习学校计划及预算》、《新月室读录》。如《本所第一推广区推广棉种记录》、《答农友们的疑问》、《关于除虫菊一答冯群的问题》、《造林可以防止水旱天灾》、《劝种美棉》、《如皋县农业推广所为植桑千农友书》、《棉卷叶虫防治法》、《道路两旁宜植行道树》、《肥田粉不可滥用的理由》。

专：是说这份《皋农》杂志，无论内容涵括多少，始终不离一个农字，始终没有忘记服务农业、农村、农民这个根本。

广：农、林、牧、蚕、渔无所不包，种、养、加、学、推样样兼顾。其它的都已经有了相应的内容可以说明了，关于“加”，《皋农》里面提供了三篇相关的文章：《树记贝灰制造厂参观记》、《怎样利用除虫菊制蚊烟香》、《本局大豫垦区轧花厂章程》。这里要特别提出来写一写的是，为解决学校农技课教材之不足，《皋农》增加一些可供学校教学参考的农业方面的内容，如农歌、农谚以及一些简易的农作物生产知识等，并在第二卷第七期头版头条刊出了《本县乡村小学应备农业书籍的目录—寄乡村小学教师们》，第五卷第五号登载《一个热心农业推广的乡村小学校长来的信》，在第六卷第十二号登载了《小学教师和农村繁荣》，对在农村学校普及农业科技知识以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寄予了厚望。同时《皋农》虽然是一份专业性较强的业务杂志，但仍然没有忘记作为一份刊物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在极尽农业科技推广之能事的同时，还借助于刊物，加强对社会的教化与引导，先后登载了《望农友们注意卫生》、《与友人论办理乡村教育书》、《戒饮酒》、《戒赌—希望大豫中乡农友们戒除恶习》、《农民道德之商榷》、《劝农友戒除不良习惯》等文章，同时为了丰富农民业余文化生活，还先后连载了《读书杂记》、《西畴闲话》、《乡村故事》、《田家乐》（农民文艺选录）、《农夫》等，寓教于读、寓教于乐。

上世纪三十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皋农》也在第一时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月第一卷第十期刊登了《告农友—提倡国货》，十二月第一卷第十二期刊首刊发了《国难声中告农友》，喊出“东三省是我国底领土，焉能给他国无理强占！”“凡我国民在这样的情形下，应当热血卫国。卫国之道是什么？就是收回失地和力图自强”的呼号。同时指出“图强是要个个人都负责地‘做人’——尤其是我们农人要：不守旧、受教育，利用科学，改进农业，以增进生产。要勤俭。”

主要编著

一般而言，创刊号关于刊物出版缘由、主管部门、编辑人员等方面的信息量最大，因没有见到《皋农》的创刊号，所以，只能从所存资料搜集。《皋农》的编著人员以本场人员为主，间有外来人员撰写的文章以及上级部门的政策资料。其中篇章较多的当为季云、王庭松、知非、孤叶、伧夫、郭明伦、王友柏、黄元祥等，为杂志撰稿的还有知非、洛夫、陈志开、冒兴汉、沈宗瀚、冯肇传、兆鱼、友声、松涛、徐绍阶等，查第五期“编完以后”知从第七期起由聘请的图书专家樊农子君担任编辑。但我总是感觉

知非似是主编或者执行编辑，同时也是主要撰稿人；王庭松应该也是场部工作人员，而且是技术指导员，同样是主要撰稿人。第一卷第七期的“编完以后”说：“本刊是由本场同人共同负责的，编者不过负收集与编排的责任而已。本刊发表的文字，似乎用不了各自署名，所以从本期起，也就不署名了。外来稿件除外，仍照投稿章程办理。”这从一方面，体现了《皋农》杂志编辑人员的高风亮节，另一方面却为如今似我一般的读者留下了遗憾。

几点质疑

一是关于如皋农业管理机构。

1995年一版一印的《如皋县志》对建国前的记载实在寥寥：“清代前，如皋无主管农业生产的机构。1930年（民国十九年），如皋县政府试办农业合作社，并设立如皋合作社指导局和如皋农业试验站。1936年建立省立棉作试验场，次年和农业试验站合并建立县棉种场，推广和提供少量新型种子。”个人觉得，这段记载不单单是不够翔实，而且与史实恐多有不符。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一月所出《皋农》第四卷第一号刊载有《本场简史》一文，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如皋农业推广所至当时的简历：“本所创始于民国五年，在磨头区八角殿，租教育公产三十四亩为场地，定名为如皋县立第一农场。旋于民国十六年，场地被教育局收回，场也停办了。民国十七年秋，又于县城东门外，先农坛地方，设立如皋县立农场，地仅六亩，隶属于建设局。是年十月，改归农矿厅，奉令改组为如皋县立棉作场。”“改组以后，以地近城市，觅地颇难，扩充无望，而原有田地少，不足展布，且又非棉作区域。惟欲得整块田地，百亩左右之田集在一处者为地址，殊非易易。几经设法，始在大豫盐垦区内向苏大农团租田一百五十亩为场地，外苗圃二十五亩（边房屋晒场在内）。同年十二月，改名为如皋县立农场，仍著重棉作改进事宜。十九年冬季，复与大豫公司当局接洽购置近场田地七十五亩，及房屋二十余间，后以经费困难，未能如愿暂将田地租种，房屋修缮，作为办公之用。至是除苗圃及屋基等外共有可耕地一百八十九亩；棉种以脱字美棉及鸡脚棉为主。二十一年冬，江苏省实业厅归并建设厅后，本所亦奉令结束保管，听候改组，及至去年八月，农业推广所始成立，并将棉作部分改为棉作种苗场。”“苗圃四十亩，附设于棉作种苗场。惟因土质过碱，较名著树苗，不易生长，二十及二十一两年，均有迁徙之议，第以人事之变迁及经济之不裕，未克有成。目下亦因经济为难，适当处所不易觅得之故，一仍旧贯，俟经费充裕以后当即实行迁移。”“十九年春季，向介社堂租到座落掘港市北秧田四十亩，办理第二主业稻作；二十年七月改组为农业改良场后，一仍其旧。二十二年八月，改组为稻作种苗场。”“十九年冬春季，考武厅分场开始筹备，于廿年二月正式成立。此间虽田地无多，惟房屋不少，足敷展布，即以第三主业之畜牧，及副业蚕桑，在该处办理。并拟建造新式合法猪场及鸡舍，因临时费未曾领到中辍。廿一年春季，复添办园艺及养蜂事业，廿二年八月，改组为畜牧蚕桑园艺种苗场；十月先建成新式鸡舍二间，本年再拟扩充增添，数年来建设新式鸡舍之计划，始得实现于去年！同时将招佃租种之先农坛场地六亩，收回整理，拟将园艺部分设于此处。”“为便利指导起见，曾拟分全县为五区，每区设一指导所。十九年秋季，开始

筹备双甸指导所,以岔河、双甸、丁堰、白蒲等区为该所活动范围,注重稻、麦、棉及蚕桑事业,二十年春季成立,并有地六亩一分六厘,为棉种示范区。郭园指导所,于二十年春季筹备,一月完成,以磨头、车马湖、镇涛、石庄等区为该所活动范围,注重杂谷畜牧及蚕桑等事业,并有地八亩九分七厘,为种植示范区,其他如李堡及江安等指导所,因经费拙而未实现。二十二年春季在保管期间,冬作结束,始将该两指导所同时退田停办。”“渔业指导所,筹备于二十年十月,在南坎租房设所,后以所址不甚适宜,欲迁未能,于二十一年秋季迁于掘市,权为办公,拟另觅所址;适因江苏实业厅归并建设厅与农场同时奉令结束保管,至二十二年八月,各项事务由渔业指导员接收办理;同年十二月组织办事处于苴镇区公所,以便指导渔民。”“各推广区,于上年八月开始筹备,各已就绪,全县设四个推广区——棉作在大豫乡,稻麦棉作在岔河或双甸,森林畜牧在石庄,稻麦杂谷在李堡——由各指导员遵照厅颁各种工作需要常驻各区指导,以利推广。”

前面已经介绍,如皋农业推广所为如皋建设局所属单位,是不是可以作为当时的农业管理机构呢?

二是关于《皋农》的记载。

查 1995 年一版一印的《如皋县志》、由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一版一印《南通市志》上均无对《皋农》的相关记载。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皋农》出版发行当时,编辑人员并不是作为一个封闭的内部资料来处理的,每期出版都主动发送基层各政府部门、学校等,并且与县外有交流,能报送一些图书管理机构交换、留存。如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南京图书馆都能及时收到并编号保存。可是,从 1930 年创刊,在如皋这片热土上,艰辛耕耘多年,而且有过下属机构的存在,也组织过多次有一定规模的活动,怎么会音讯不留的呢?

三是关于编辑人员的去留。

《皋农》的编辑人员,多是如皋县立农场(如皋农业改良场、如皋县农业推广所)的工作人员,而且多是农业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人在编辑《皋农》时,似乎多是使用的笔名,与政治不能说没有联系,但并不应该有多少是革命的对象。这些人在抗日战争中及以后的去向应该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找到了这些人,就能挖掘出更多的历史故事,就能对《皋农》日后的故事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

《皋农》,作为民国第一县的一份“农姓”刊物,用它的努力曾经为如皋农业、农村的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在一定的程度上使如皋无愧于民国第一大县,所以理应成为人们关心、关注的对象。作为世代相传的农家之后,我一直都从事粮农工作,而今仍然奋斗在农业一线,自然对《皋农》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愿得到更多与《皋农》有关的人和事的信息。

(联系地址:江苏省如皋市如城武定苑 305 幢 505 室 邮政编码:226500
电话:13962727536、0513-87199882 电子邮箱:rgacd@sina.com;372574427@qq.com)

记录一册故事 留存一方文化

——吕四民间故事的文化内涵

朱今更

江海大地上的民间故事,是江海文化宝库中历史悠久的口头文学之一,它犹如陈年之酒令人陶醉。

从启东汇龙镇乘公交向北,约一小时即到古镇吕四,若在车站周边打听吕四民间故事,碰上摩的司机,他会讲得眉飞色舞没完没了忘掉载客;碰上七旬老者,他以一口地道吕四方言讲得滔滔不绝忘掉返家;若到东北角残存半段老街走一走、看一看,那筋纹显露的木门木窗、那被脚底踩得又圆又滑的石块,还有那街边墙脚石缝里透出的小草,都珍藏着讲不完说不尽、绚丽多彩的民间故事,它也记载了吕四千年的历史、人们生活的悲欢离合与大海的惊涛拍岸,“遍地故事满江河、日产鱼盐一金牛”——这就是吕洞宾四到之地吕四。

一、反映吕四当地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吕四是千年移民之地,同时也是五湖四海故事汇集之地,“镇小故事多、滨海情趣乐”,在那个没有现代影视、收听设备的年代,故事交流是民间文化的唯一选择,人们在茶余饭后相互交流,一是怀念故乡的“移民经”;二是寓教于乐,以民间故事陶冶情操,将赌博邪风拒之门外,形成吕四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老街原住民方裕先生(1897—1980)家可称民间故事之家,他的母亲是故事大王,每日夜晚屋里总点着一盏小油灯,灯油是食用的豆油。旧时生活艰苦,烧菜宁可少放油甚至不放油,但灯不可不点。小小灯火一经点起,东邻西舍、南北街道的故事迷就围坐灯旁交流传说故事。“一杯清茶润心肺,三则故事知天下”,内容除了断指戒赌外,最多的一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将薛仁贵率领千军万马屯兵吕四,并拜当地老渔民为师,改造船只进行海战训练,选择麦收季节的西南风渡海,一举拿下高丽国的传说。这些趣谈轶事被编成《薛仁贵征东传》,并由此延伸到其儿子“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罗通扫北”等唐太宗向周边扩疆的故事;二是初唐文坛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不满武则天当政、与徐敬业从扬州兴师讨武兵败而遁迹于吕四(时称白水荡)民间,武则天连连下旨要捉骆归案,而骆宾王以他的聪明才智、惊险而又巧妙地屡屡躲过追捕,在吕四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妙文诗篇与关心民瘼的故事,也被综合成《骆宾王与武则天》;三是吕洞宾四到吕四的传说等。上述三大主题,方裕先生在解放前所记载的手稿有

二尺之厚。至于吕四人们抗日、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故事与神话传说如“神秘画商”、“洞宾显灵刺日寇”等，多得可以听到胡须雪雪白。

二、诉说着古镇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吕四古为海屿沙岛，它的来源有两个神奇的故事。

传说盘古王开天辟地时的一只坐骑叫鳄鱼，能腾云驾雾、翻江倒海，一日乘盘古王打盹休息，它从天上逃到地上钻在太湖里，不守天规经常兴风作浪，危害周边百姓，人们叫苦不迭。时间过了三千年，鳄鱼长成一条三百多里长的大龙，头在太湖，身段向北向东弯曲伸至黄海边，一日托塔天王李靖下凡侦查太湖为何年年水患，发现原来是鳄鱼作祟，立即报告玉皇大帝，玉帝大怒当即下旨务必立斩，但鳄鱼力大无比从无对手，玉皇大帝调集所有天兵天将予以惩治，这一仗整整打了八百年，最后玉帝下令众仙合力作法开出一条东西向的长江将鳄鱼拦腰斩为两段，太湖至今张家港为南段，并以虞山、惠山、镇住鳄鱼双眼；江北与张家港对应的天生港向东至海边为北段，终端即是吕四，南北各长 150 里，北段南北宽 50 里，因为高出地平面二米左右，地理学上称为通吕水脊，这是吕四之地由来。另一个说法是当年的海屿沙岛是一只仙鹤变的。故事说的是女娲补天工程完了之后，猛一回头发现西北天有一洞未补上，当即驾鹤而至，停于今吕四位置进行炼石补天，仙鹤孵于一边头东尾西地休息，这一歇就是三千年，左等右等不见女娲回来。原来西北天刚补好，女娲接旨直接上天另有任务，忘了通知仙鹤，仙鹤等得不耐烦，回首看西天，这一回首，使沙屿岛向西退了五六十里，也就是史志所述古秦潭在今向东五六十里之外的海中；后来仙鹤二腿用力向西一伸成为通吕水脊，仙鹤身段即是当今吕四。此后，南来北往的仙鹤，历经千年都要在吕四停留休息，并寻找祖先，故尔吕四又名鹤城。

至今吕四之名的由来源于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已有作家写成各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两部，此处不再赘述。

三、揭示小镇人们聪明才智——出类拔萃

“世界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自古以来争论不休而又无结果的难题，但在小镇吕四却找到了答案，也使人不得不相信小鱼小虾吃得更多的人似乎比一般人聪明。

很久以前，吕四出了个神童，任何难题都难不倒他。一日江南才子四五人来到吕四找到神童比试，说明来意，神童满口答应，但提了个条件：谁输了要请吕四镇百姓人人吃一只“插酥大饼”，江南才子也满口答应。次日，在吕四三宫殿设下“擂台”，请镇上地方长老当裁判，围观之人内三层外三层不知其数。按排妥善双方对坐，神童礼请出题，江南才子把“蛋与鸡”的难题摊了出来。神童一听，哈哈大笑说太简单了：“世上就是先有鸡后有蛋”，江南才子反问“鸡从何而来？”神童说：“蛋里孵出来的”，江南才子说“那不是先有蛋吗？”神童又说“错了，难道所有蛋都能孵出小鸡？蛋里没有鸡的孵到最后发臭还是没有鸡，能孵出小鸡的说明蛋里有鸡，这叫蛋鸡，只不过它这时躲在蛋里。”神童抓住蛋鸡这个关键点证实先有鸡后有蛋，江南才子哑口无言。裁判长老请才子再出题，其中一才子出了一道连自己也没有答案的数学题：“ $0+2=2$ ，请找一个两位数与 2 相加仍等于 2”，众人一听倒抽一口冷气，真是天方夜谭闻所未闻。才子得意地笑着，只见神童慢条斯理地说，“简单得再简单没有

了”，才子紧催即刻解题，神童问才子：“你们家里有没有台钟？”才子答“都有”，神童说“中午 12 点加午后 2 点是几点？”才子说“14 点”，神童说“14 点也就是下午 2 点”，周围一片叫好声，众人说：“12+2=2，一点不错”，才子恍然大悟连连地说“对对”，不得不佩服神童的聪明。裁判长老问江南才子还有题吗？对方摇头认输。这样全镇大饼店忙了三天三夜赶作插酥饼……

吕四镇市民李伯生祖上在明清二代先后出了 68 个读书人（其中有进士、举人各二名），成才故事多之，在小镇吕四传为美谈，并留下“进士府”遗迹；还有市民作家彭利文先生（1920—2008），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写了一本 30 多万字的《海角风暴》，说的是以潘开渠为代表的吕四各界人士团结抗日的动人故事，于文革前在上海出版；另一部 30 多万字的民间故事集，送出版社后文革开始下落不明。

又有市民姜延先生，是以理发为业的民间文学作家。他从十五岁开始 50 多年笔耕不辍，累计创作 50 余万字，上海、南京、南通不少作家到吕四采风，对他甚为敬佩，多人与他结为文友。也由于吕四受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清末状元张謇先生的影响，人们自古崇尚文学，在清乾隆咸丰年间建有东瀛、鹤城两书院，建国初曾有多多个民间文学创作小组，除此之外，吕四当今历史上还有多位非民间文学的著名作家如章品镇（1921—2013）等，都曾留下不少故事。

四、彰显人的基本道德准则——扬善镇恶

社会的物质与精神、安定与进步的建设，仅靠法律与政令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靠道德发挥作用来感染人的心灵，民间故事恰有此专长，“善可扬恶可镇”。吕四三清殿供奉的药师，脸色青紫，但人们给他烧香跪拜，为何？原在当地有一口井水恶变传疫，他夜以继日为民诊治并嘱不可再饮此水，众人不信照饮水不误，结果病疫日多，为救众生他毅然投井呛死于井中，故脸色青紫，众悟为谢将其塑身涂金供奉，药师美德世代留传（作者冯国民）。

还有一个故事，说吕洞宾在吕四卖大饼，见一小孩天天来买，问其买与何人吃，小孩说给婆婆吃，洞宾感动，另做一只大饼赠予此孩吃，从此终日不饿，故事情节虽另有变化，但使敬老之风在吕四成为风气（摘自姜延文章）。

再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明朝中叶侵吕倭寇遭至全民抗击，寇首夺命而逃时被斩掉一只耳朵，后以独耳朵出名。一日独耳朵欲想再次侵吕，派奸细到吕四打听，知吕四全民皆兵而未敢再犯（姜延《独耳朵怕吕四人》）。

吕四地处江海门户，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 1557 年为抗倭而筑吕四城，周有城墙与城河，为适应形势，南北两头街道沿城河分别向东延伸，与主街道形成 U 形，遇有日寇来犯，城中吕祖楼一声锣响，全城出动、两头包抄三面围歼痛打落水狗，每获全胜，这就是吕四“十里 U 形抗倭长街”的故事。

吕四民间故事犹如早晨普撒大地的阳光，从东街到西街、从南街到北街、从海边到城河、从高楼到小巷，遍布每个角落，真是“三步有一说，百步成一书”，胜如一颗光芒灿烂的明珠，令人刮目相看而又久久难以忘怀。